

# 镜头内外的 红色传奇

吴志菲 余玮 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COL 中文在线

## 作者介绍：



吴志菲，红色励志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出版有《李菲传奇》《百岁名流》《红舞台下的凡人邓小平》《中国高端访问》《红色之恋》等畅销图书；有作品入选“年度优秀中国传记文学作品”与“中直机关青年最喜爱的一本书”“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



余玮，红墙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新闻老照片的背后》《讲学中南海》《触摸红墙》《红墙见证》《出入中南海的高层智囊》《私家相册里的红色传奇》等，并有作品入选中学《语文》课文。曾获“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等奖项，多部作品被确定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

封面摄影：吴印咸

# 镜头内外的红色传奇

吴志菲 余玮 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 目 录

第一章 老照片记录开国元勋的点点滴滴	4
一 红色瞬间定格为永恒	5
二 中条山·枣园·中南海	14
三 开国领导人的真情见证	24
四 细述国事风云的细节	33
五 聚焦领袖与群众心连心	38
六 镜头内外的赤子情怀	44
七 传世作品与载道人生相得益彰	52
第二章 用影像铺设历史通道	60
一 建国前后的红色记录	61
二 扛摄影机就像持作战武器	69
三 历史被写进教科书的背后	88
四 “摄影大师”的淡泊人生	100
第三章 红色岁月的红色记忆	108
一 坐闷罐列车到古都北京	109
二 值勤在丰泽园后门	114

三	和警卫一中队“拉家常”	123
四	“名誉校长”的“三同”要求	137
五	《浪淘沙·北戴河》诞生的背后	152
六	伟人的平民情怀	165
七	被“罚站”的领袖	171
八	这也是“红灯记”	175
九	在意哨兵是否带武器弹药	180
十	身体状况与日俱“衰”	186
十一	难忘的最后岁月	192
十二	站好最后一班岗	199
	<b>第四章 行摄红墙的“红色新闻兵”</b>	210
一	红色摄影家早期的苦难与辉煌	212
二	菊香书屋的特殊“面试”	230
三	井冈山之行的跟拍	238
四	韶山滴水洞的生活见证	256
五	快门外的魅力长者	262
六	触及心灵的对话	291

# 第一章

## 老照片记录开国元勋的点点滴滴

一个骄阳吐火的下午，笔者如约来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宿舍区，敲响一个普通单元的门铃。“铛铛、铛铛”两声清脆的铃声过后，门开了，一个面容清秀、身材瘦削的老太太手扶着门，正待发问，笔者赶紧自报家门。“噢，你们来了，快进来吧！老头子，来客人了！”老太太笑着招呼我们进屋，虽然岁月的雕刀在她脸上刻下衰老的印迹，但我们还是很准确地判断出这个老人就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对象——共和国第一代女摄影家、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原主席侯波。

进了客厅，顿感一阵凉风扑面而来，霎时，把夏日的炎热关在了门外。侯波的老伴——著名摄影家徐肖冰站在靠近阳台的一张小桌旁，桌上堆满了书、纸，看得出来他正在写着什么。他笑着对笔者说：“侯波早就把空调开大了，怕你们一来热得受不了！”原来如此，笔者暗想：“侯老可真是个有心人啊！”

侯波的一生充满传奇：她出生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13岁即投身革命参加抗战，14岁加入共产党奔赴延安，25岁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南海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拍照12年，十年动乱饱经磨难，改革开放后重获新生，71岁时担任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创会主席……“我这一生很有福气，亲历了开国大典，也看到了祖国富强。”侯波很健谈，说到激动处，眼角溢出泪花。

发明照相技术的人是伟大的，留下珍贵历史瞬间的人更伟大。一张张活灵活现的照片背后，深藏着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侯波用光影浓缩瞬间，为我们开启了半个多世纪的时空隧道。

## 一 红色瞬间定格为永恒

坐在这对著名摄影伉俪家简朴的沙发上，笔者下意识地环顾客厅四周的摆设——出乎意料，并不见摄影作品的展示，古朴的展示柜中反倒是陈列着许多小工艺品，如泥塑小人、茶具等。唯独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照片——侯波、徐肖冰夫妇俩与毛泽东在香山的合影，这张合影顿时吸引了笔者的眼球。于是，我们的开场白就从这张合影开始了。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5月。那时，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休息、办公，并接见国内外的一些客人。一天，侯波接到组织下达的任务，去香山协助徐肖冰完成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摄影任务。“那时我的工作单位还是在北平电影制片厂，人事上还属于电影厂管。但中央有事就来电话通知，有时也直接来车接，带上摄影机就走。”侯波回忆着。这次会见结束后，客人走了，侯波他们收拾机器也准备离开。这时，毛泽东回过身来招呼他们坐下。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认识徐肖冰，得知侯波是徐肖冰的爱人且也是从延安出来的，就饶有兴致地问侯波是哪里人，侯波回答说山西夏县。“山西可是个好地方，关云长就是夏县人，武艺高强，人又忠厚。”毛泽东

的话把大家都逗得笑起来了。

本来这是侯波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见到毛泽东，心里自然有点紧张，不敢与主席坐得太近，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平易近人，而且说话这么幽默、这么随和，一下子使她轻松起来。这时，卫士李银桥送了一盘水果过来，毛泽东就请他们吃。不爱吃水果的毛泽东则大口地抽起烟来，喝茶也不剩茶叶。

“山西那个地方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可是当初不是我们的天下，被阎锡山占着，他又不抗日，我们在统战工作中费了好大的劲也没把他拉过来。他与蒋介石也有矛盾，想不理蒋介石的茬，搞一个独立王国，可惜蒋介石容不下他。陈赓也在山西打过几个漂亮仗，把个日本人打得不轻。后来国民党的那个朱怀冰还想占据这里，不抗日，反而与我们的八路军摩擦，陈赓火了，一生气把他给彻底收拾了。”毛泽东正谈着，他的女儿李敏跑过来了，叫着“爸爸”扑进毛泽东的怀里。



1949年5月，毛泽东与侯波、徐肖冰夫妇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合影。陈正青 摄

这时天已经不早了，想到不能过多占用主席的时间，侯波他们起身向毛泽东告辞，可侯波心里总感到这次与毛泽东的见面不应就这样结束。果然，毛泽东站起身，说：“来，咱们一起合个影吧。”于是，与侯波同来的新华社记者陈正青举着相机，为侯波夫妇跟主席合影。侯波、徐肖冰在毛泽东身边一左一右站好，这时主席发话了：“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不由分说，毛泽东站到了侯波的左边。陈正青按下快门，这张珍贵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采访时，侯波深情地注视着这张大照片，感慨万千：“这张照片我们珍藏好几十年了，每当抬头看见它，我就会想起那次照相的每一个细节。那时我们多年轻！毛主席多年轻！共和国多年轻啊！”侯波在记录领袖影像的日子里，每天基本上是泡在电话机旁，一有消息立即提起摄影包出发。但时常会遇到一些麻烦，“有时领袖们不爱拍照。我只能偷拍、抓拍，甚至把相机藏起来拍照。”侯波兴奋地说道。

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让她永远铭刻于心的是开国大典这天。作为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共和国开国大典拍摄的女摄影师，侯波拍下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的令人激动的瞬间，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经典画面。“当时的照相器材很落后，胶卷都是到香港用外汇买的，很紧缺，我当时用的是德国的禄莱 120 相机、阿克发胶卷，相机一次只能装 12 张底片，印象中我拍了不到 10 卷。胶卷必须节约着用，拍一张是一张，因而那天拍的照片，几乎每个角度都只有一张底片。当时我的相机只有标准镜头，没有广角，所以我想再多照一些人就照不下了。其实这张照片从光线、构图和技术上来讲，我是不满意的，但它有特殊意义。”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

举行。为了能拍好这次大典，上级从《华北画报》、《东北画报》、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选派了多名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记者和摄影师，但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只有陈正青、杨振亚和侯波。侯波记得在广场上的有吴群、林杨、孟昭瑞等，总共有 30 名摄影记者在拍开国大典。“杨振亚本来是被安排在城楼上的，但他临时下去拿东西，结果上来时典礼已经开始了。陈正青、杨振亚作为记者是要发稿的，而我当时是中南海摄影科科长，没有发稿任务，只要留资料。其实《开国大典》的照片陈正青的那张使用次数最多、流传最广，仅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镜头，他就拍了 135 整整一卷。那天，当时还在电影队的徐肖冰也在天安门城楼上忙着拍新闻电影纪录片。”

开国大典那天，上午不到 10 点侯波就先到天安门城楼上看地形，快到中午的时候，苏联专家带着彩色纪录片的拍摄设备也都纷纷就位。“因为下午 2 点在中南海勤政殿，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将宣布就职并举行第一次会议，我又急着赶回去拍照片。两点半多拍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再赶到天安门跟着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起登上城楼。等我上去一看，好位置都被他们拍纪录片的摄制组占了。那天有两个摄制组拍彩色纪录片，还有一个组是拍黑白纪录片的，加起来至少有好几十人。”

大概下午 2 点 50 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车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从天安门城楼左侧一步步走上来。当毛泽东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时，大喇叭里传来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的声音：“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军乐奏响《东方红》……侯波赶紧用相机对准了毛泽东等领导人，一边拍一边往后退，还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光圈，生怕误了每一个重要的镜头。

“当《东方红》第三遍奏完的时候，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正好到达了天



开国大典。侯波 摄

安门正中的位置。国歌声中，毛主席亲自按动了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25岁的侯波，此前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站在天安门城楼的前廊上，那时前廊的围栏不像后来那样修有齐胸高的汉白玉护栏，而只是覆着琉璃瓦的矮墙。我们都是身子紧靠着城楼的矮墙



30 万人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拍照。有时为了能拍到领导人的正面，只好冒着危险把身子探出矮墙。而且按完快门后就赶紧蹲下来，以免挡住下面群众的视线。毛主席讲话的时间很短，根本来不及选择最佳位置就得按快门，可是即使这样，选取背景的程序也是不能省略的。只能把过程缩短，甚至缩短为一瞬间，这样捕捉到的背景才会是自然的，没有任何矫饰的。”

“那天，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今日成立了’，这一刹那，我的快门同时按下。”说着，侯波取出开国大典的那张照片，照片上毛泽东正对着扩音器大声宣告，十分传神、真实。曾经多次在纪录片中听到的那熟悉的声音，此时仿佛一下子回旋在耳畔，激荡在心底。照片再现了重大的历史瞬间，摄影真不愧为一门收藏历史的艺术，而摄影师则是收藏历史的收藏家。

看到笔者的钦慕之态，侯波马上表白：“这张照片，是我最得意的

几张之一。不是因为照得好，因为它是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是新中国光辉历史的见证——不是谁想拍就能拍得到的。是历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她认为自己很幸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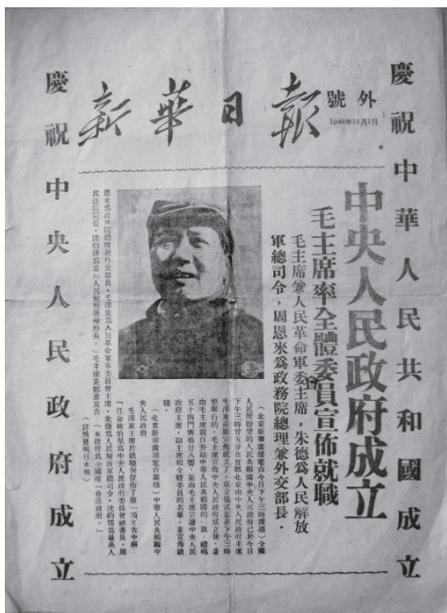
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侯波觉得主席讲话的声音与平时相比有点变调，显然是激动了。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大家都流着眼泪，侯波也激动得流了泪。“在天安门城楼上有 1000 多人，大家都眼含着热泪，庆祝有这么一天。”

城楼下 30 万欢腾的群众更是情绪高昂。人群、旗帜、彩绸、鲜花汇成了喜庆的海洋。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感人至深。侯波也激动了，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把这一气势宏伟、鼓舞人心的场面给拍下来。天安门城楼上的地方有限，再往前是不可能了，往后退也没有地方，当时侯波什么也不顾了，就在自己上半个身子探出墙外的那一瞬间，周恩来总理抓住了她的衣角，等回过身来见是周总理时，一股暖流涌上侯波的心头。

侯波透过相机镜头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双含着莫大幸福的眼睛和数十万双充满感激的手，人们朝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欢呼“万岁”的情景。看到毛主席不断地扬起双手向大家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侯波异常激动，一次次按下快门，捕捉到一个个珍贵的历史镜头。侯波拍摄主席回应广场上热烈的欢呼时，不顾一切地侧身探出墙外抓拍主席精神焕发的笑容和激动的神情。在旁边的陈云和彭德怀都多次提醒侯波：“小心！小心！”

那天，侯波完全融入到喜悦庄严的气氛中去了，端着相机，不断地变换着角度，将这些开国元勋的精神风貌和神采定格在胶片上。

据侯波回忆：“我当时在城楼上拍照时总蹲在围墙下，有人不理解。



开国大典《新华日报》外埠。

因为当天城楼上下是靠一条挂着一个篮子的绳子来联络的。下面有什么意见或有什么问题就拉那个绳子，篮子就提上来了。据说篮子里面不少是骂我们记者的纸条，写着‘你们挡着我们看不见主席，你们快离开吧’等字样。还有直接在城楼下喊叫的。所以我们摄影的同志都是尽量蹲着，只有拍照的时候才站起来。”

据说，从开国大典留下的大多数镜头中看，毛泽东是很少出现笑容的。毛泽东此刻的心情用他自己的

的话来说，就是“又愉快又不愉快”。对此，他后来解释道：“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

这一点从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就可以看出来。当日，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检阅的装备被戏称为“万国牌”武器——出自十几个国家，大多是别国淘汰的旧品。检阅途中一辆装甲车开到天安门西侧时，还因机械故障熄了火，开不动了，幸亏后面装甲车里的战士急中生智，继续向前行驶，把这辆装甲车顶到西长安街上才没扰乱秩序。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对眼前的一切看得很清楚，但他没有责怪任何人，因为他知道这已是我军手中最好的装备了。

据侯波回忆，开国大典上，当新建立的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战斗机飞

过天安门广场上空，广场和城楼上爆发出了如雷的掌声与欢呼声时，毛泽东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

开国大典当天的活动从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毛泽东一直在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到晚间已有些支撑不住，就弯腰伏在围墙上。至于一直处于极度兴奋状态的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根本不知道累，直到深夜回到家才感到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一点力气都没了。”侯波说，因为一直忙着在城楼上工作，广场上的活动虽然很热闹，自己也没顾上细看。“开国大典让我感受特别深的一点是，人民当家作主那种欢欣鼓舞的喜悦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之后的十余年间，在五一、国庆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侯波又陆续十多次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摄影师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离休后，我又多次去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参观过，也拍了不少照片，每次都能发现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你们不知道，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虽然经过了精心的装饰，但由于条件所限，看起来还是比较破旧，台阶也有的残缺不全。现在的天安门一年比一年漂亮了，看起来也特别宏伟。我们的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好。”

## 二 中条山·枣园·中南海

“侯波”其实不是本名，她出生时爷爷非常高兴，给她取名“阎千金”——按老百姓的说法，一个女孩就是一千金。后来，她上中条山参加革命队伍并在中条山工作，解放后曾做过云南省省委书记的孙雨亭给她改名“阎锋”。再后来到了延安，保安处处长周兴为了去掉侯波身上的那种女孩子气，就让她叫了“侯波”这样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没想到这一叫竟叫了一辈子，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就连我自己也觉得再叫‘阎锋’很别扭，‘侯波’反倒成了我的真正姓名。”

侯波的爷爷没有念过书，但对读书人很是尊敬，希望他的后辈不要像他那样没有文化，只要肯上学并上得成学，他都想尽一切办法供养。侯波六七岁时就跟着当教师的姑姑去离家 30 多里地的学校念书，姑姑对侯波的生活非常关心，但在学习上却非常严格。晚年，侯波还时常抱憾姑姑去世得太早。

这个家虽然贫寒，但家人和睦，日子也还过得苦中有乐——厄运始于侯波父亲的身亡。在太原一个矿上出苦力的父亲，因联合工友跟长期拖欠工人工资的资本家进行斗争，惹恼了资本家。当父亲想回家缓和一

下与资本家的矛盾时，却在回家路上遭到资本家的暗害。“得到这个凶讯，家人非常气愤，但在当时那个年代，穷人怎么斗得过资本家，全家只得在一片哭声中咽下了这口恶气。”后来，在运城教书的姑姑又不幸离世。两桩意想不到的灾难给了侯波的爷爷致命的打击，他由于过度悲伤，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侯波的家境一下子陷入穷苦的泥沼，奶奶瞎了，母亲也病倒了。临终，母亲对当时只有13岁的侯波说，要她照顾好3个弟弟。“那时，日本鬼子已经打到了太原，经常看到有逃难的人群从村子旁边经过，战争的风声越来越紧。”

一天早晨，一个女子小学的同学跑来通知侯波到村外的庙里集合，说是有事情要商量。侯波去了之后，听比自己大几岁的另一个女同学说，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咱们不能当亡国奴，中条山上的游击队正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日活动，咱们应该去找他们，为抗日出力。

回到家，侯波跟奶奶商量，奶奶二话没说，从柜子里摸索出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4块银元。“我今天还记得，当时奶奶对我说——孩子，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在奶奶的催促下，我怀揣4块银元，穿着她做的布鞋上路了。”

中条山是当时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重要活动场所，山上的游击队是同盟会领导下的一支抗敌决死队。上了中条山后，侯波她们被决死队分派到各村发动群众给抗日前线的战士做鞋袜和鞋垫。在这里，侯波学会了当时十分流行的救亡歌曲，如《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等等。“我们的工作进展得很快，不久就收集起几千双鞋子，通过抗敌决死队送到前线去。可是，后来得到通知，我被分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虽说这一去离家更远了，但不去是不行的，

当时只有投奔革命队伍才有生路。”

在经历一路乞讨式的跋涉后，侯波来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始在安吴堡西北青年战时训练班学习，表现积极、好学、上进。有一天，青训班的人事科长找侯波谈心，问了侯波家里的情况及个人的理想之后，突然发问——你想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我只有14岁，也不太明白中国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入了党以后会怎么样，但从身边的那些大人身上看到，中国共产党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里面的人都是好人。于是，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说：‘想！’”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面对着鲜红的党旗侯波高举起了右手……

“中共七大之后，才规定入党必须年满18岁。可我们那时候，还有十二三岁就入党的呢。”也正因为入党年龄太小，又无法找到入党介绍人证明，在“文革”中，侯波曾长时间被认定为假党员。“事也有凑巧，多年以后，我的大儿子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回到北京。他告诉我说他一个同学的父母认识我，后来见面一看，却正是我的两个入党介绍人——王宁娜和刘志明，只是他俩后来也改了名字，因而失去了联系。这真是历史开的玩笑！”

在青训班学习了几个月后，又经组织分配，侯波来到延安，进了保安处。因为所做的工作保密性强，组织上建议她改个名字，保安处的处长周兴就将她改叫“侯波”。“她在延安7年，就上了7年学。”徐肖冰插言补充着。侯波毫不否认，“因为我刚到延安，什么都不懂，想来想去，还是去念书学点东西才好。我先是读边区中学，后又进了延安女子大学学习。1941年9月，延安女子大学和延安的其他几所大学合并办学，这样，我又曾是延安大学的学生。”延安大学是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都很关心的学校，许多中央领导都在延安大学讲过课，侯波对在延



1942年，延安女大学生沈玉玲（左起）、曲岩、赵军、杜国芳与侯波在一起。徐肖冰 摄

安大学的那一段生活特别留恋。就是在这期间，她和徐肖冰相识相恋并决定相守终生。

徐肖冰早年在上海从事电影事业，参加过《桃李劫》、《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拍摄工作，1937年来到延安后，长期为毛泽东等领导人拍照片和纪录片，后来还曾留下了《挥手之间》等传世杰作。

侯波与徐肖冰相识在延河边，那时的侯波还不到18岁，是个很漂亮、有些爱脸红的姑娘。徐肖冰认识的一个女同志开玩笑说要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后来就把侯波她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约到延河边散步。“同学对我介绍说，这位是咱们电影团的徐肖冰同志，是个大摄影师。我就感到奇怪，我又不认识他，为什么对我说这些？”晚年侯波说这话时看着老

伴儿，两人会心地笑了。

接触了一段时间，徐肖冰觉得侯波给自己的印象非常好，而侯波也在感情上渐渐接受了徐肖冰。“我们选了一个晚上结婚，买了一点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晚上，大家就聚在他的窑洞里，一块儿吃红枣，吃馒头片。”回忆起这些，侯波心底不免激起幸福的涟漪。

侯波与身为摄影师的徐肖冰结合，也注定了她一生要与摄影结缘。抗战胜利后，侯波和徐肖冰被派往东北参加接收日本人的“伪满影”——即后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侯波被分配在摄影科当科长。侯波坦陈：“其实，当时我对摄影是一知半解，组织上让我当摄影科长，可能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老党员，政治上靠得住。”在此期间，侯波开始学习摄影。“原来只看见他摆摄影机，并没觉得怎么难弄，也没想到我应该学习这个东西。后来随着工作的需要，不仅要求会拍，而且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时候我就得回家向他请教关于取景、采光、洗印等技术问题，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东北解放后，侯波被分配进了北平电影制片厂，任照相科科长。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置身于灯光灿烂、气氛热烈的会场，侯波感到由衷的喜悦。她四处打量，只见会场前挂着人民政协的徽章，徽章中间是红色的中国，屹立于白色地球之上，徽章上面还有四面红旗，外围有蓝色齿轮和黄色谷穗，侯波知道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象征。主席台前，鲜花、翠柏环绕，正面悬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画像，插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很是庄重。

当晚7时，毛泽东等89位主席团代表步入会场，全体代表一致起立

鼓掌欢迎。大会主席团就座后，毛泽东以澎湃的激情致开幕词：“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这段开幕词后来广为流传。

这次会议代行了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等。会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使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组织上完备和固定下来。

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开始时，侯波开始到中南海摄影，“那时共产党刚进北平，主要的活动地点就在中南海，去得最多的就是勤政殿、颐年堂和紫光阁。”期间，侯波参与了一些重要大型活动的摄影，如参加政协筹备会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合影、第一届政协会议全体女委员合影等的拍摄。那么多重要的人物，又是那么重要的会议，侯波真怕拍不好。可是真接触起来，侯波感到越是这些著名人士越是好打交道，他们一点架子也没有，很为侯波他们这些摄影人着想。像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等，在照片拍完之后，总是拉着侯波的手说些亲热话，这使得侯波渐渐地克服了紧张心理。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侯波用相机记录了各党派、各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华侨代表几百人参加的会议，被邀请来的代表们纷纷在筹备会上发言，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情景被一一收入镜头。

侯波发现，对党外人士，特别是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毛泽东是十分注意礼节的。1949年进北平后，毛泽东就在周恩来的陪同下，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柳亚子等人。对他们，毛泽东不但迎送出门，而且遇有台阶还亲自搀扶他们上下，并与之携手漫步，把他们当做自己的老师来对待。

1952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毛泽东请程潜到家里做客。在侯波的印象中，这是程潜第二次到中南海做客。吃过饭，毛泽东对程潜说，出去走走吧。侯波见拍照的机会来了，也赶紧跟着。

他们边走边聊，兴致勃勃，不觉已走到中南海畔。金秋的北京，晴空万里、和风阵阵，美丽海面和水榭楼台错落有致、交相辉映，景色优美。毛泽东提议划船游览，饱览这里的迷人景色。

毛泽东触景生情，对程潜说：“前人对中南海曾有‘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波心’的赞誉，今日置身其间，不知你有何感受？”程潜会心地笑着，不住地点头称赞：“名不虚传，妙不可言。”

两人登上一条小船。毛泽东要亲自替程潜荡桨。程潜不安地说：“岂敢岂敢，你是国家元首，已年近花甲，怎能让你为我荡桨？”毛泽东说：“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爱国高级将领，又是我的老上级、家乡人，还分什么彼此呀！你已古稀高龄，总不能让你划桨呀！还是客随主便吧。”

说着，毛泽东操起桨来，小船便悠然地向前驶去。两位老人的笑声在波光粼粼的中南海海面上久久回荡。侯波按动了快门，将这珍贵的一刻永恒地记录下来。

当时，侯波不明白毛泽东为何对程潜如此敬重，后来才逐渐了解他们几十年的交情。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参加了湖南新军，成为一名普通士兵。半年后，南北议和，毛泽东就离开新军继续求学。因程潜



1950年6月20日，手持国徽图案的毛泽东不禁开怀大笑。  
侯波 摄

（字颂云）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毛泽东后来一直尊称其为“老上司”，对程潜十分尊重。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毛泽东与程潜的初识，是在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当时个子高高、目光炯炯、思想敏锐的毛泽东，引起了程潜的注意。他感到，这位叫毛泽东的小同乡绝非等闲之辈。1945年，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时

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程潜也在欢迎的人群中。谈判期间，程潜曾单独前往桂园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地接待了他，两人谈至深夜。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到程府回访，两人又一次愉快地促膝长谈，程潜对毛泽东的钦佩景仰也随之而增。交谈快结束时，毛泽东对程潜说：“颂公，您是国民党德高望重的元老了，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下届行宪国大选举时，您老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嘛！竞选成功了，可以为老百姓谋点利益；不成功，也没有什么，可以回湖南去搞和平运动！”毛泽东的话对程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8年春，国民党召开“行宪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程潜果真参加了副总统竞选。落选后，程潜回到了故乡，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解放战争期间，程潜决心起义。1949年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正式发表和平起义通电，湖南和平解放。因此，当程潜应邀于1949年9月7日晚抵达北平时，毛泽东亲自去火车站迎接。那天晚上，程潜下火车后，毛泽东就快步迎上去，握住他的双手，称他为“老上司”，程潜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因为工作的需要，组织安排我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进门不远处，左厢房的一间大约 20 平方米的屋子里，这是我的办公室兼当时四口之家的小窝。”侯波边给笔者倒饮料，边讲自己当年进中南海的情况，“其实，我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南海的摄影师，还是在一次组织谈话以后。”

那一天，时任毛泽东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找侯波谈话，表示组织决定调她进中南海，担任新成立的摄影科科长，专门负责为领导人拍照，包括领导人参加的各种活动以及一些生活照的拍摄，而且是以拍摄主席的活动为主。“名为科长，可实际人员还没配备下来，只有我一个光杆科长。杨尚昆同志有时跟我开玩笑，叫我‘侯科长’，别人也跟着叫。直到现在，在中南海工作过的老同志到一起时还叫我‘侯科长’。听起来虽然有些好笑，但我仍感到亲切。”侯波说得很慢很轻，但可以感受到她是幸福的。

丰泽园在中南海的南海北岸，从西数第一个大门就是。1949 年进城后，周恩来就住在这里，当年 6 月让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全家搬到了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毛泽东在丰泽园住了很多年，“文革”前后才搬到“游泳池”。

徐肖冰告诉笔者，解放前，毛主席并没有专职的摄影师；直到建国后，侯波才担任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一干就是 12 年。在近 30 年的时间里，他们夫妇拍摄了无数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照片。大家熟悉的毛泽东在韶山、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等都是侯波的作品。主摄中南海 12 年，是侯波一生中最充实的一段。因为拍的照片主要是为中央首长的活动留一份形象档案，这关系到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问题，所以拍照、冲洗、整理资料，侯波一个人全包了下来。“只要在北京不出差，一接到电话，人和摄影器材都保持着一声令下立即行动的状态。”这时，坐在一旁的徐肖冰插话了：“那会儿，她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要去多久？连对我都保密。”



1954年9月11日，毛泽东接见西藏宗教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前排右一）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右三）。侯波 摄

### 三 开国领导人的真情见证

谈起为领袖摄影这项工作，侯波说出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工作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道理：我在为伟人寻找背景拍摄的时候，伟人们已经做了我的‘背景’；在他们的背景之下，我才能记录下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我的劳动成果才能成为一个个令人炫目的珍宝。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对侯波来说，那段给领袖拍照的日子，可以说是人生宝贵的馈赠。

侯波刚到中南海工作不久，对情况不熟悉，拍照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失误。有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出席一个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人很多，都围着毛泽东，与毛泽东握手、交谈。因为侯波个子比较矮，又被别人挡着，根本看不见毛泽东，端了半天相机，也没能拍到一张照片。

这时，周恩来也在人群中，看到侯波一直没有拍摄，就问道：“小侯波，你怎么还不快拍照片？等一会儿这样的场面就没有了。”口气很严厉。

侯波一听更慌了，转了半天，还是找不到可以拍照的地方，最后没有办法了，就在人群中胡乱拍了几张，结果所拍的照片都不理想。

当天晚上的中南海舞会，侯波也应邀去参加。侯波到的时候周恩来已经在舞厅里了。白天他刚训过自己，侯波有点儿害怕他，一看见他就赶紧躲在一根柱子后面，不想让他看见。当时，周恩来正与别人说活，侯波以为他没有看见自己。

舞曲响起，人们开始找舞伴跳舞，侯波还躲在柱子后面，想等周恩来去跳舞了再出来。谁知道周恩来径直朝她走过来，走到她面前，向她伸出手，说道：

“小侯，我请你跳舞。”

侯波一下子更紧张了，稀里糊涂地跟周恩来滑入舞池。想与总理跳舞的女同志很多，一个原因是周恩来的舞跳得好，舞姿潇洒，风度翩翩；再一个原因是有些平时见不着总理的女同志想借此机会与总理接触一下，所以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轻易没有机会与总理跳舞。

侯波回忆说：“周总理那天请我跳舞还是由于白天的原因。他一边跳舞一边对我说：‘小侯，今天是我不对，我要向你道歉，你拍照的时候我对你态度不好，请你原谅。当时人那么多，拍照确实有困难。’”一位大国总理向一个普通的摄影记者致歉，侯波感动不已。

由于工作的关系，侯波结识了许多中国政要和一些外国领导人，与胡志明、金日成等都有来往。即使现在她已离休多年，还与一些老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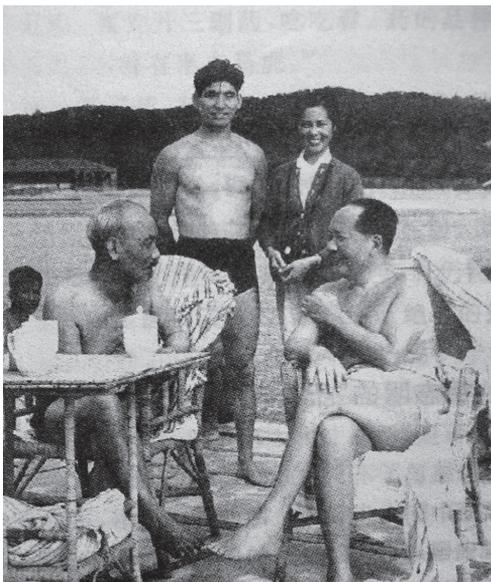
周恩来游览颐和园。侯波 摄

保持着联系。王光美在世时，侯波经常打电话向她问个好。

作为中南海的摄影师，侯波与刘少奇一家也比较熟悉。刘少奇平时不爱说话，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认为这是他长期做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

侯波起初不敢给刘少奇拍照，只等他比较高兴的时候才拍。幸好王光美有时会提醒一下刘少奇，叫他坐下来，让侯波拍照。这个时候，刘少奇就

会笑笑，摆好神态让侯波拍。对此，刘少奇常笑说又做了一次“道具”。时间长了，侯波与刘少奇就熟悉了一点，可以陪他散步、爬山。有时，刘少奇会问起侯波家里的情况，孩子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等。



1956年，胡志明与毛泽东在北戴河。后右为侯波。



1949年6月，刘少奇、王光美与侯波合影。

1951年底到1952年初，党中央决定让刘少奇去南方休养一段时间，侯波也去了，她陪刘少奇到杭州、江苏、山东孔府，还看了一些他的老朋友。

侯波说：“宋



1954年，刘少奇在北戴河好奇地看侯波所用的长焦镜头相机的取景框。侯波 摄

庆龄在各方面都是中国妇女的骄傲，你把形容一位伟大革命家和形容伟大而美丽的女性的最好的词汇合在一起，那就是宋庆龄。”侯波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是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派邓颖超从上海邀请她来北平参加庆典的那一次。那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车站迎接，侯波为了拍照也去了。

火车进站后，宋庆龄穿一件深绿色的旗袍，梳着高高的发髻，满面笑容地从车上走下来，庄重而又不失素雅。中央给宋庆龄安排的住所位于离车站不远的方巾巷，是一座建筑考究的四合院。不久，为政协筹备会的事情，周恩来、刘少奇、蔡畅等人特地登门拜访，征求宋庆龄的意见，侯波也一同去了。宋庆龄很热情地招待他们。谈话的间歇，宋庆龄让正在

换胶卷的侯波坐下来休息，还说：“这位记者我见过，上次在车站你就去了。”侯波很惊讶，当时月台上那么多人，宋庆龄竟然留意到了她——一个普通的摄影工作者。宋庆龄叫侯波坐在她的身边，还特地选了一个大苹果给她……

这次见面以后不久，侯波就调进中南海了，见宋庆龄的机会自然也就多了。宋庆龄每次见到她，如果离得近，总会用一种关切的语气嘘寒问暖，就像妈妈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时宋庆龄出访，她会主动约请侯波跟随拍摄。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途中，飞机在伊尔库茨克作短暂停靠。翻译李越然把准备好的毛泽东将在莫斯科机场发表讲话的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接过讲话稿，右手习惯性地拿起一支铅笔，目光缓缓地扫过字里行间。

随行的侯波灵感顿至。她看到毛泽东在飞机上聚精会神地审阅稿子的神情，是那么充满



1949年，何香凝、邓颖超、宋庆龄、史良、蔡畅、丁玲、许广平等参加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筹备会议的妇女代表合影。侯波 摄

个性、那么从容不迫，觉得很能突出他日理万机的工作状态，便轻轻地靠近，敏捷地选位、对焦之后，迅速按下了快门。侯波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张经典照片后来被多次发表，备受广大群众喜爱，这也成为侯波拍摄的最珍贵的照片之一。

11月6日，在列宁格勒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当赫鲁晓夫讲完话后，毛泽东即席发言，他那生动的语言，令大会气氛十分活跃，会场上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11月7日，毛泽东出席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庆典及群众游行活动。

庆典开始前，苏联保安看到侯波扛着摄影机，就粗鲁地将她拦在外面不让进去。侯波心里很着急，但无奈不会说俄语。眼看庆典就要开始了，她怕拍不着重要场面，心急如焚。就在这时，她突然发现了对面的彭德怀和邓小平，就对他们不停地招手。两人明白了她的意思，就让大使馆的人过来和保安交涉，这才让侯波如愿接近了主会场，拍摄到了毛泽东等的外交照片。

后来在开会间隙，毛泽东在询问侯波对苏联的印象时，侯波不满地说：“大国的架子摆得十足，可是会务安排得一团乱麻，我们这些客人反倒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太欺负人了！”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没想到侯波还这么大脾气。来到人家的国家就要听人家的指挥，客随主便嘛，等他们到了我们的国家，也要听我们指挥的。”

在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之后，16日至19日又召开了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会议，会议最后通过了《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

《宣言》签字仪式在一个大会议厅举行，参会人员济济一堂，各国记者也特别多。侯波个子矮小，前面的人一站起来，她连主席台上的人

脑袋都看不见了。就在她四处打量、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法国共产党代表站起来向她招手。侯波喜出望外，一下子认出他是曾经到中国列席过党的代表大会的外国朋友。法国人把椅子拉了拉，想让侯波从桌子下面钻过去。不料这时旁边也正有一个苏联记者无路可走，趁法国人刚站起来，他眼疾手快上前一步抢了侯波的先。好笑的是，他过于肥胖，在桌子底下钻了半天也没有露出头来。侯波再也等不及了，她急中生智，借助法国朋友的一臂之力，一下子跳到了桌子上，对准正在签字的毛泽东迅速按下了快门。

侯波这一跳非同小可，连主席台上的赫鲁晓夫都惊动了。他抬头看了一眼，见是位拍照片的记者，也没说什么，反而对她笑了笑，露出赞赏的神情。

当时代表团里只有毛泽东和宋庆龄两个人被安排住在克里姆林宫，其他人都住在外面的宾馆。而侯波在宋庆龄的特别关照下，很幸运地与宋庆龄一起住进了克里姆林宫的公主房。宋庆龄高兴地说，你住进来，我们就可以聊聊天了。

宋庆龄给侯波的印象始终是那么亲切，使她很放松，一点不觉得拘束。吃饭的时候，宋庆龄、侯波、秘书和翻译坐一桌。宋庆龄礼貌、优雅，很讲卫生，搞分餐制。她总是先轮流着给大家夹菜，夹完了，才放一点在自己碗里。苏联卫士曾说：“宋庆龄是我见过的最伟大、最美丽、最亲切的女性！”

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对其他任何人都不曾有过的尊重。从莫斯科回来，毛泽东和宋庆龄同坐一架飞机，毛泽东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说：“您是主席，您坐头等舱。”毛泽东说：“你是国母，应该你坐。”这样，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到底还是宋庆龄坐了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讲话。侯波 摄

头等舱。而侯波也就留在头等舱陪伴宋庆龄。

快到北京时，侯波收拾东西。宋庆龄拿起侯波的手提包问：“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侯波说：“相机。”宋庆龄用命令的口吻说：“拿出来，背在身上。”

侯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还是照办了。宋庆龄接过那个空包，把头等舱里预备让她吃的巧克力、香蕉等一股脑儿全装进去，悄悄地说：“带回家给孩子吃。”侯波这才发现原来宋庆龄晚上一点东西也没吃，都留给她了。下飞机时，宋庆龄又嘱咐侯波说：“有时间就到我家来来看看我。”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宋庆龄给她留下了非常亲切的印象。

## 四 细述国事风云的细节

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等都穿着崭新的湖蓝色元帅服，个个精神抖擞，谈笑风生。

当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周恩来等领导人登上主席台就座后，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原来是毛泽东到了。他还是穿着他平时爱穿的那身中山装，气度恢弘地走向主席台，不断向台下挥手致意。

全国人大常委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宣布典礼开始，穿着新式军衔服装的军乐队奏国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朱德、彭德怀等走上主席台站成一行，分别接受毛泽东的授衔和授勋。

第一个走上前来的是深孚众望的朱德。侯波看到朱德向毛泽东端端正正地行了一个军礼，用微微发颤的手接过勋章。然后，两位战友神情庄重地对望了一眼。在他们的目光中，侯波感受到了他们几十年并肩作战形成的默契，一切都在不言中——他们的手又握到了一起，从井冈山的第一次握手到今天，在这漫长的27年的风风雨雨中，以他们为首的优

秀中国共产党人一起缔造了人民解放军，成立新中国！此时，留下这一影像的摄影者侯波与授勋的开国元勋一样激动。

接着，毛泽东又把“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3枚勋章（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并与他们亲切握手。当时，刘伯承、林彪在青岛养病，叶剑英在辽宁紧张筹备即将开始的反登陆军事演习，都没有参加授衔仪式。

下午6时半，授衔、授勋典礼结束。周恩来发表了热烈的祝酒词后，元帅们走过来给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敬酒，刘少奇、周恩来等也纷纷向元帅们表示祝贺。现场气氛极为热烈。

在侯波眼里，朱德是一位长者，对人宽厚热情，很重感情，他与战友们经常保持联系，对每个人都很关心；而彭德怀却是最严厉、最耿直的，坦荡无私，敢于直言。彭德怀和朱德之间有一种兄弟般心灵相通的感情。

朱德喜欢到野外呼吸新鲜空气，有时候他叫上几位战友到当时还十分幽静的香山或十三陵游玩。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彭德怀归国，朱德就叫上他和邓小平等几位四川老乡，一道去十三陵野游。去野外，彭德怀是一叫就应的。

下车后，人们在野外散步，渐渐走散，而朱德和彭德怀却始终形影不离。在水库附近转了两个圈，谈了些事情后，彭德怀就搓着手说：“很长时间不交手了，不知你水平可有提高？”

他们两个是军中的战友，棋盘上的老对手，一摆起来就能杀个天昏地暗。听到彭德怀的话后，卫士们立刻支起行军床，放下马扎，摆好象棋。朱德正蹲腿欲坐，彭德怀扶了他一把，头稍一摆动表示：坐那边！朱德望了一眼彭德怀，没说什么，慢慢地走到对面，重新坐好。人们明白：那边



周恩来、彭德怀在中南海瀛台与工作人员交谈。侯波 摄

是红帅，这边是墨将。彭德怀尊敬朱德，请朱德执帅，自己执将。朱德、彭德怀“两军”对峙、专心致志，站在一边的邓小平则观棋不语，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挤到最前面，躬着身欣赏这场激烈的“鏖战”。一直跟着他们的侯波端起相机，对准他们按下快门，拍下了这幅生动的照片。照片被侯波取名为“朱总彭总相持不下，小平同志观棋不语”。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并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还越过“三八线”，威胁中国东北边境。10月，毛泽东作出派彭德怀带兵入朝的决策。

侯波没有到过朝鲜战场，但她的爱人徐肖冰当年却在朝鲜战场拍摄。对徐肖冰的工作，侯波很支持，但也日日牵挂。从徐肖冰那里，侯波了解到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情况，知道彭德怀司令员与金日成将军经常协同作战，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侯波对此也深有体会：1953年抗

美援朝胜利后，金日成常来中国访问，只要他有机会，总是要见一见彭德怀的。有时候，他们在一起回忆往事时，激动处还会掉眼泪。

1954年，在国庆五周年的招待会上，彭德怀与金日成再一次相遇了。看到他们笑容满面地共同举杯：庆祝新中国成立5周年！这是侯波第一次看到满面笑容的彭德怀。彭德怀为人严肃，很少见到他笑，但此时，在与金日成共同举杯的那一刻，彭德怀笑了，而且笑得十分亲切、灿烂。这么难得的画面，侯波自然不会放过，她眼明手快地拍了下来。过后品读这张照片，侯波体会到，彭德怀的灿烂笑容应不仅只是时逢庆典，也应是喜逢故友——那是残酷战争条件下并肩作战、携手抗击强敌的生死之交。

1959年7月1日，彭德怀上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在肯定大跃进成绩的前提下提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浮夸风”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因此，他遭到错误的批判，并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免去国防部长等职务。

侯波回忆说：“1959年庐山会议上，我去拍照片了，一些小范围的活动是不让我们参加的，只有那些大的会场才让我们记者进。我那时就感到气氛不对劲，彭老总老是皱着眉头，坐在杌几很少说话。不几天就传出他给毛主席写信的事，接着就说他犯了错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就很少见到他了，他搬出了中南海，不知道住在哪里了。”

1965年9月23日，彭德怀被毛泽东请到中南海谈话。毛泽东对他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并对在场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称：“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彭德怀）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彭德怀

最终被派往四川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一职——在另一个特殊的战场上，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高举真理之旗，进行艰苦卓绝的工作。

1966年3月22日，彭德怀坐在颠簸的汽车上到达了成昆铁路峨眉山段，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很多三线单位负责同志在此迎候，邀请他视察。这让他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3月24日，彭德怀一行来到了乌斯河隧道，如雷的掌声响彻山野。透过望远镜，彭德怀看到站在峭壁上的人们在向他欢呼，他激动地回应：“你们干得很顽强，我感谢你们，向你们致意！”接着，他踩着泥浆走进了3000米长的隧道。

彭德怀敢言的性格一点没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花果山煤矿存在的弊病，在那个报喜不报忧的年代，人们都为他捏把汗。这只是彭德怀三线视察工作的缩影，短短一年时间内，他三次长途视察，足迹遍及四川以及贵州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

期间，侯波见到过作为“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但起初没有认出来。当时侯波正拿着相机拍照，忽然听到有人喊：“小侯！”她回头一看，只见一个戴帽子的老人很和善地看着她，再仔细一看，竟是彭老总。

侯波喜出望外，马上走过去。她看到昔日的彭老总变得衰老了，留着好长的胡子，脸也晒得很黑。一时之间，侯波不知该说些什么，眼泪不由得流了出来……

侯波告诉彭德怀：“我已经离开中南海，到新华社工作了。”彭德怀点头说：“好，好！在哪里都要好好工作。”

侯波回忆说，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彭老总，再后来就听到了他挨整的一些事情——他的冤案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昭雪。

## 五 聚焦领袖与群众心连心

从 1952 年开始，毛泽东外出视察调研的时间和次数明显增加。而为被警卫和众多欢迎的群众包围的毛泽东拍照，却是很不容易的，狼狈的事时有发生。一次，毛泽东在河南农村视察棉花大丰收。现场棉农和当地官员围成了几道人墙，把毛泽东完全隔在了侯波的视线之外。没办法，侯波看见堆积成山的棉花，便踩着囤积棉花的围子往上爬，不想上去后，忽悠一下陷进了棉花堆。正同棉农们热烈交谈的毛泽东忽听得侯波的尖叫声，止不住笑了，对周围人说：“侯波掉进去了，去把她拉上来。”

1953 年，毛泽东为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很想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6 月 28 日上午，他来到北京市郊的鱼池村。在一个菜园旁，他同正在菜园里拔草的农民张振随意聊了起来。后来他又来到张振家的院子里，看到张振怀孕的妻子左右手各抱一个孩子，便笑着说：“你可真行，一边一个，中间还有一个。”逗得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很快，村里的农民们闻讯都赶来了。毛泽东问了农民们许多实际的问题，诸如冬天烧炕吗，睡得暖不暖和，小孩子上学没有，庄稼好不好，粮食够不够吃等等。老实巴交的张振如实回答：“过去吃野菜，现在有

吃的了，不过还不太好，荒年还要挖一些野菜，吃一些菜团子。”毛泽东听了，充满信心地安慰他说：“不用急，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接近中午，农民们提出要与自己敬爱的毛主席合影，毛泽东欣然同意。随同而来的侯波连续“咔嚓”几下，为笑得十分开心的农民们与自然随和的毛泽东拍下了一组合影。

在返京的路上，毛泽东一再嘱咐侯波说，照片洗出来后一定要给农民们寄去，不要辜负了他们的一片心。侯波不住地点头应是。她看得出毛泽东非常关心农民的生活，对农民的感情非常深厚，希望农村的面貌能够快一点改变。

毛泽东曾对侯波说：“你相机不要老对着我，要对着群众，我和群众在一起你照我，我不说你，不要老照我一个人。”从那时起，侯波镜头里的毛泽东，更多的时候是和群众在一起。

1958年6月28日下午，一生历经坎坷的库尔班·吐鲁木老人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库尔班虽然满脸皱纹，很消瘦，但此时此刻精神很好，眼中充满对毛主席的感激、崇敬之情，双手与毛泽东的手紧紧相握，毛泽东则亲切地报以微笑。对远道而来的库尔班，毛泽东十分感动地说：“新疆的少数民族老百姓多好啊！这么大老远的，还要骑毛驴来看我！”

库尔班是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的农民，从小就成了孤儿，童年是与地主家的牛羊一起度过的。成年后，为了摆脱被剥削、被奴役的生活，库尔班带着妻子逃到荒漠里，靠吃野果活下来。后来妻离子散，他孤身一人度过了17年贫困交加的生活。后来新疆解放了，库尔班才知道，是毛泽东主席使他翻身解放，回到人间，过上了幸福生活，便执意要到北京去见恩人毛主席。

村民们笑库尔班不知去北京的路有多艰难，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库尔班意志坚定，不为所动。他说：“北京在地上，只要我的毛驴不倒下去，一直走，就一定到北京。能让我亲眼看看毛主席，我这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不久，这件事就传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那里，为了满足库尔班的心愿，特批他随国庆观礼团乘飞机来到北京。

6月18日，新疆国庆观礼团负责人立即向中央民委递交了新疆自治区党委和田地委请求毛主席接见少数民族代表库尔班·吐鲁木的报告。由于毛泽东的工作特别忙，接见活动要等几天。在等待的时间里，库尔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别人以为他生病了，要请医生来看。他说：“我的病医生看不了。只要见了毛主席我的病就好了。”他还托人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他到邮局去寄，问邮局工作人员寄什么信最快，邮局工作人员顺口告诉他航空信最快。他真的要在北京城寄航空信给毛泽东，恳请毛主席抽空早日接见他。

6月27日下午，新疆国庆观礼团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次日毛主席接见全体成员。消息传来，大家非常高兴，不少人都跳了起来。当晚洗衣服的洗衣服，理发的理发，兴奋之情早已把白天参观的疲劳驱散了。库尔班更是处于亢奋状态，对谁都笑嘻嘻的，见谁都想说话，却不知说什么好，激动得一夜未合眼。他把带给毛泽东的礼物放在床头，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唯恐沾上一丝尘土，还细心地用外衣盖上。

28日中午12点左右，新疆国庆观礼团成员乘坐中央民委的大客车到达中南海。在一块小草坪上，他们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依次排好队等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不久，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伐走来，并向大家招手致意。在场的所有人情绪激昂，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掌声与欢呼声一片。



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侯波 摄

库尔班更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几次要走出队列都被人们拦住。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与代表团同志合影留念后，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朝库尔班走去。库尔班也快步走出队列，走到毛泽东面前，向毛泽东行了民族礼。毛泽东向库尔班伸出了温暖的大手，库尔班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毛泽东通过翻译询问了库尔班的名字、年龄和生活

情况。这位 75 岁的维吾尔族翻身农民终于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恩人毛主席。随后，库尔班来到藤条圆桌旁，送上自己准备好的礼物。

侯波回忆说：“库尔班当时来见主席，带了两包东西，一包是葡萄干，一包是织的土布。当时老百姓也很困难，但他见到主席非常激动，主席就把那两包东西先收下了，尽管主席还不知道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库尔班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两眼望着主席，双手久久不肯放开。我抓拍了这一感人的瞬间。”

接见后第二天，毛泽东还专门派人看望了库尔班，并送给他 10 米条绒布和对新疆少数民族兄弟的亲切慰问。库尔班多年来一直要到北京亲眼看看毛主席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喜讯传回家乡，万民同喜。

国画大师黄胄，画驴可称为一绝。由于“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的故事非常感人，黄胄一直想用画笔把这位善良、质朴的维族老汉对新中国的感激之情描绘出来。黄胄先后画过多稿，最后选定老人骑着毛驴，弹着冬不拉，唱着赞歌，迎着朝阳向东方走去。黄胄以流畅的线条、明快的色彩，塑造出了鲜活的人物形象，深刻地揭示了老汉朴实豪爽的人物性格和心向北京、思念毛主席的内在情感，达到了艺术形式和内涵的完美统一。此作品完成于毛泽东逝世的前一天，毛泽东逝世后两天，著名书法家赵朴初为黄胄的这幅《日夜想念毛主席》画作题款：“日夜想念毛主席，主席恩情比天地。冬不拉，弹不尽苦难的回忆；热满特，唱不完贫农的心意。边疆各族兄和弟，日夜想念毛主席。黄胄作此图，朴初为题记。谁知得意作图时，正是导师弥留际！展图谛视泪沾臆，把笔几度不成字。库尔班·吐鲁木啊，咱们的心在一起，日夜想念毛主席！”

当时的《人民日报》不但刊登了“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的长篇通讯，同时还配发了侯波所拍摄的大幅照片。“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的通讯和照片被选进了1960年的小学语文课本，库尔班热爱毛主席的故事还被改编成了话剧和电影。王洛宾还为库尔班的故事谱曲，成为脍炙人口的民歌——《萨拉姆毛主席》，直到今天仍广为传唱。2002年，电影《库尔班大叔上北京》，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点献礼片。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库尔班把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化作坚定不移跟党走，争做劳动模范、民族团结模范的坚强动力。在他当选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后，更是身先士卒、兢兢业业、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庄重承诺。在平凡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不愧为全国

各族人民的杰出代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敬仰。

库尔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历史的潮流推上了政治舞台，他最后的职务是于田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退休在家，1975年5月因病去世，终年92岁。

1985年，侯波到南疆叶城，“看到他们把这张照片印成纸品，家家都挂着，主席在他们眼里威信非常高。在少数民族心里，你讲主席也有错误他就打你，你讲主席不好他就打你。”

当地群众听说库尔班与毛主席的合影就是侯波拍的，就一定要与她握手。他们对侯波说，你给毛主席照相，一定握过毛主席的手，我们握着你的手就像握着毛主席的手一样。这样，和侯波握手的人蜂拥而至，侯波招架不住，有关人员只好把她藏在医院里，才避开了那些热情的群众。

后来，侯波还得知，新疆人民又在于田做了个巨型雕塑，再现了她拍摄的这一瞬间。她明白，新疆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情太深厚了，库尔班老人的举动事实上也是他们的愿望。

## 六 镜头内外的赤子情怀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湖南湘潭有一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与毛泽东的思想很接近，受到这位当代巨人的一贯敬重。他，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第一高级中学读书时的老师和校长——符定一。符定一比毛泽东年长16岁，两人的交往是从毛泽东考入湖南全省第一高级中学开始的。当毛泽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后，符定一看了他粗壮的身材和土里土气的装束，不相信毛泽东这个生长在边远山村、只读过半年小学堂、进中学几个月又退学入伍的青年能考得出那样的好成绩，于是加演了一场面试新生的插曲——要求毛泽东限时作文，符定一校长亲自监考、面试。写文章本是毛泽东的“拿手戏”，但见他略一思忖，便顷刻文思泉涌，一篇文章洋洋洒洒，一挥而就。复试的结果证明，毛泽东这次所写的文章，比入学考试的作文还要好。符定一阅卷时禁不住拍案叫绝：“了不得，了不得！我们省一中可取了个栋梁之材呀！”说完，他朱笔一挥，将毛泽东这个退伍的列兵正式录取了……

1915年，符定一定居北平。1918年，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平。他经常到符定一家中做客，两人时常在一起研究



1950年6月，毛泽东和青年时代的教师符定一交谈。侯波 摄

学问，纵谈国家大事。符定一经常鼓励毛泽东，而且，在毛泽东经济拮据的时候，符师母还每月资助他5块大洋。

1925年，毛泽东因领导罢工，触怒了湖南军阀兼省长赵恒惕，受到追捕。回乡探亲的符定一得知后，心中很是着急，凭其时为国会议员的身份和关系，竭力疏通，力陈他与毛泽东的师生之谊，称毛泽东是难得的人才，保护毛泽东。直到毛泽东脱险，他才算放心。

对于符定一所做的这一切，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忘记过。1946年6月，毛泽东就邀请符定一到延安叙旧，并安排他与自己同吃同住，还亲自主持会议，欢迎符定一的到来。建国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文史馆，需要一位饱学之士出任馆长，毛泽东首先就想到符定一。盛情难却的符

定一便答应了。

毛泽东十分关心符定一的生活，经常派人去看他，还特批符定一可以随时到中南海来访。毛泽东在家中宴请乡老时，也常请符定一作陪。可以说，毛泽东对他这位老师，一直敬重有加，时有关照。

这些情况，侯波时常耳闻目睹。因此，当1950年毛泽东再次见到符定一时，侯波就抓住机会，给符定一和毛泽东拍了一张极为传神的合影。照片中，面带柔和笑容的毛泽东做着手势，在向符定一说着什么，很是亲近自然，毛泽东对这位老师的赤子情怀清晰可见；而符定一对他的这位学生、人民领袖的推崇之情、满怀敬意在照片中也一览无余。

1951年夏日的一天，李敏、李讷和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这3个年纪



1951年，毛泽东和李讷一起在香山翻看影集。侯波 摄



1954年7月，毛泽东与刘松林（右一）、李敏（右二）、毛远新（右四）在北戴河浴场。侯波 摄相仿的孩子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工作了许久的毛泽东终于休息了，坐在躺椅上，靠着椅背，手里拿着把扇子，肥肥的裤腿挽得高高的，一派惬意自得之态。孩子们都围了过来，坐在他旁边，七嘴八舌地同他聊天。很显然，毛泽东很喜爱孩子们的陪伴，显得十分愉快。孩子们在他面前也无拘无束，畅所欲言。

毛泽东平时忙于国事，难得有暇享受天伦之乐。侯波看到这其乐融融的场景，喜出望外，凭着一个摄影师的敏感抓拍了这生动的一幕。

侯波知道，毛泽东是严父，他爱孩子，然而并不娇惯，而是严格要求，绝不允许他们有特殊。每次在北戴河游泳，侯波就注意到毛泽东带孩子下海时从不让孩子套上救生圈，要以此来锻炼孩子独立生存的能力，即使有时孩子游得筋疲力尽，毛泽东也要鼓励她们坚持下来。在中南海拍



1959年，毛泽东在韶山老家游泳。侯波 摄

照多年，侯波与李敏、李讷平时接触较多，相处很好。她们对侯波都很尊重，叫侯波“阿姨”，侯波知道这是毛泽东对子女们的要求。

一次，毛泽东到长沙后执意去湘江游泳。据侯波回忆，当时自己因为拍摄而发生一件尴尬的事情。“南方的粪坑都在河边上，在外边，不像我们的厕所，粪坑上面有块板。水正好把粪坑都淹住了，我往后退，没有看见，一下就掉到粪坑里面去了，还好很浅，边上人扶了我一下，我把相机举起来便赶快跳了出来，然后上去洗一洗，抓紧接着拍照。”

从湘江游泳上岸后，毛泽东赤裸的双腿沾满了湘江的淤泥，一件有条纹的浴衣松散地裹着他微微发福的身体。侯波回忆说：“岸边出现一条小路，主席上了路，顺路走到一户人家门前。娃娃们围着主席看热闹。主席逗一个小娃娃。小娃娃不知道拿了个什么东西，主席问：‘给爷爷

看看好吗？’那孩子鬼机灵，双手捂得紧紧的，调皮地说：‘你猜，你猜着了我就给你吃。’‘我猜测不着，你给我跳个舞吧。’小孩子很大方，就跳了起来。主席用慈爱的目光饶有兴趣地观赏着，笑得很开心。多好的画面啊，我‘咔嚓’按下了快门。虽然主席腿上糊满泥，浴衣下摆上也全是泥，但他和娃娃的神态都是那么自然、朴实。”

照片画面上，双脚与浴衣上沾有泥浆的毛泽东惬意地抽着香烟，像普通人家在儿孙面前露出笑容的祖父，与一个顽童逗乐。

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视察正在建设中的武汉长江大桥，并听取了有关汇报。下午2点左右，在蛇山脚下、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处，他首次畅游长江，一口气游了两个多小时。毛泽东在长江里如鱼得水，怡然自得。

侯波曾回忆：“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的时候，我就在一条小船上面，我拍的那张照片中的那个水（看起来）很平，其实（水流）速度很快，等我上了小船以后，主席已经游得很远了。我跟划船的老头说



毛泽东在湘江游泳后在农家门口休息。侯波 摄

你快划、快划。别人都知道我不会水，不会游泳。赶上主席以后，我的衣服全是湿的。主席就问：‘你为什么不下水呀？’我说：‘我不会（游泳），我要下水的话就沉底了。’主席跟我讲：‘多喝几口长江的水你就会了。’”

坐在船上的侯波追随毛泽东的身影不停地选取拍摄角度，很快就拍了一卷胶卷。正当她熟练地更换新胶卷时，船身突然一晃，她手一抖，装胶卷的盒子一下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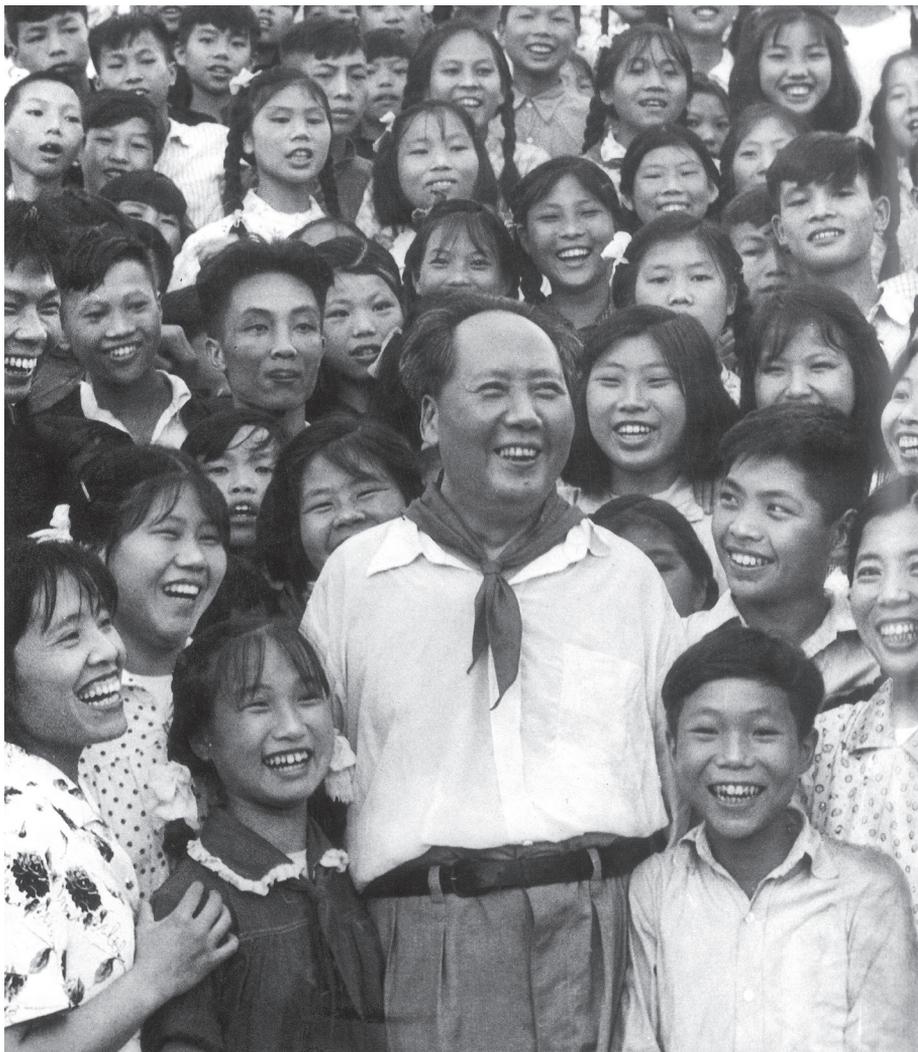


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深情探望堂弟毛泽连一家。  
侯波 摄并签名

到了水里。侯波惊慌地大叫一声。船调过头去，想帮她捞取盒子。

这时，毛泽东游了过来，一把抓住了水中的盒子，还好奇地出声念着盒子上的英文说明书。毛泽东长年坚持学习英语，但会的单词不算多，可是这会儿居然念起了柯达胶卷的英文说明书！这令侯波极其震惊和钦佩，令她遗憾的是，毛泽东念说明书的情景没有能够及时拍下来，错过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据悉，毛泽东水性极好，有时能很长时间在水中一动不动，有时还在水面上抽烟。

“在主席身边工作，主席要求我们在政治上要好好学习，要提高。在生活上要俭朴，主席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主席吃什么、做什么我们都看在眼里，他的生活非常俭朴。”侯波回忆说，1959年，毛泽东回到了湖南韶山冲这块曾经生他养他的土地。“头天到韶山已经是黄昏了，第二天清早5点钟，主席就起来往外走，我们赶快跟上。主席去爬山，他父母的坟



1959年，毛泽东和韶山中学的师生们在一起。侯波 摄

在山上，谁也不知道。上山以后，再往前面走看到有一个碑，是他父母的碑，大家这才恍然大悟。但什么都没有准备，有一个同志便折了两个松树枝递给主席，主席就放在他父母的坟上，在这儿默哀。”

## 七 传世作品与载道人生相得益彰

1961年3月，为了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脱离社会、脱离群众，一向恋旧的毛泽东忍痛作出了让他们到地方工作的决定。于是，侯波也依依惜别中南海，走进新华社。

临走之前，当时在武汉的侯波向毛泽东辞行：“主席，我要走了，在您身边工作了12年，您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工作，可是我总觉得自己不称职，没做好工作。”说着，侯波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也有些伤感，对她说：“你在我这里工作了十多年，给我拍了许多很好的照片，也给中央领导同志拍下很多照片，你做了很多工作，很辛苦。这就是成绩嘛。这次，不少在我身边工作了多年的同志都调到别的地方，我是想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你们在我身边工作，熟悉了，这有好处，但与社会、群众有了距离，就是局限性、坏处。”

毛泽东问：“什么时候走？”侯波说：“今天有送信的飞机来，我就搭飞机走……”毛泽东说：“你到别的单位去还是要好好工作，你今后还可以来看我，也可以给我写信。你不要难过，以后有什么困难随时都可以找我。”侯波走到门口，给毛泽东敬了个礼，毛泽东的眼圈红了……

1962年侯波生过一场病，此事不知怎么让毛泽东知道了。他让一个卫士来看望侯波，还亲手将自己早年的诗词《清平乐·六盘山》抄了带给侯波。

毛泽东逝世后，侯波看到党中央在报纸上发布的有关通知后，便把自己珍藏的这首毛泽东的珍贵手迹原件送给了中央办公厅。

晚年，侯波经常与老伴相互搀扶着到天安门广场看看，看看那个给他们留下最灿烂记忆的城楼。身体还好的时候，每年12月26日，他们还会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领袖遗容，深情缅怀一代伟人。

“摄影双璧”侯波与徐肖冰当年相识、相恋在延河边，终成眷属。初涉爱河之时是令人憧憬的，但经受风雨洗礼的爱更加深沉。“文革”期间，侯波被江青点名为“坏分子”，并被造反派认定为混在党内的“假党员”，后被下放到山西中条山区劳动改造。侯波是从中条山参加革命走出来的，后来又回到中条山劳动改造，是历史的巧合也好，是命运的安排也罢，反正侯波常常觉得是中条山给了她革命的机会，是中条山给了她革命的精神，于是她从绝望中看到了新生的曙光。

“他那时稍微自由一点，不用再挨批斗。在中条山，造反派把我看得很紧，通信也受限制。”侯波回忆说，徐肖冰曾给侯波寄过几次粮票，有一次，他还在粮票里夹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首短诗，大致意思是要她相信历史、相信人民，一切问题终能得到解决。可造反派以为是徐肖冰怂恿她什么事情，狠狠地告诫以后不准再写这种诗，并将诗斥为“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

天气冷了，徐肖冰及时给侯波寄去棉鞋，细心的他还在鞋里装上了几块糖果。那年月糖果很稀罕，造反派不仅把糖果没收，还训了侯波一顿。侯波虽没吃上糖果，但徐肖冰的情意她分明感受到了。“他给我寄糖果

的意思就是要我好好地生活，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个年代不兴说什么爱不爱的，可这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

说起中条山，侯波又想起了那令她难以忘怀的乡情。当时下放到中条山区，侯波住在村里一户姓钱的人家里。村里的人不知从哪里听说侯波曾给主席拍过照，都在背后嘀咕，说侯波老老实实的，不像是坏人，可能是搞错了。房东家有一个老叔看侯波身体单薄，怕她累病了，就偷偷帮侯波干造反派规定的活儿，还帮她磨割麦子的镰刀，处处替她着想。



1958年底，毛泽东与侯波在武汉东湖宾馆梅园合影。

“我是中条山的女儿，是从中条山走向延安的。中条山的人民给予了我生活的力量和勇气，是那种无私神圣的乡情把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侯波心底蕴藏着特有的乡土情结。

说到这里，电话响起来，一向心细的侯波为避开打扰，起身去隔壁接电话。出来后，她对老伴说：“小焱来电话了，要我们注意休息。”她又向笔者解释：“是我的大儿子打来的电话，今天打来了两个电话。”笔者问及她有几个子女时，她平静地说：“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前几年因车祸遇难。”正当笔者懊恼不该提及这件令她伤心的事时，侯波又恢

复到儿子来电话问候的喜悦中，她像天下所有的慈母一样，对孩子的嘘寒问暖感怀不已。“大儿子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在延安时曾出过一次事故，让他吃尽了苦头！”

那是1945年除夕，夫妇二人有事外出，不得已将儿子托付给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却把孩子锁在屋子里，自己去隔壁打扑克。孩子一个人在火炭盆边烤火，把身上的棉衣给烤着了，很快就烧着了肉。隔壁的人听到孩子哭，都以为是孩子淘气，并不以为然。直到这个同事来家取手纸上厕所，却只见满屋子的浓烟，小孩子已经有气无力。侯波看到自己的孩子烧成这样，差一点晕了过去。“那时，孩子还不到两岁，胳膊上有的肉都已被烧焦、烧烂。那年大年三十晚上，我们一家子是在痛苦折磨中过的年。”第二天，侯波赶紧带孩子到当时延安有名的中央医院，请苏联治烧伤的专家医治。过了3个多月，孩子的烧伤才治好。

“文革”期间，侯波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先是在新华社机关挨斗，后被下放到山西永济新华社干校改造。临走前，她被允许回家一次。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作为一名摄影师，自己只是在真实地记录历史，怎么突然就成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分子。在家中，徐肖冰在监管人员监视下为侯波做了一顿午餐，一遍遍地鼓励妻子要学会坚强，要照顾好自己。侯波后来回忆说：“在那样的情景下，徐肖冰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安慰，使我感受到了丈夫和家的温暖。”

1973年干校被解散，侯波回到北京新华社印刷厂车间继续劳动改造，在车间做了8年胶片漂水工。凭着一个女人的坚韧与刚强，她咬牙坚持了下来。直到1977年春天，组织上取消了对侯波的不公正待遇，安排她到新华社图书馆工作。这一时期，徐肖冰同样失去了从事摄影的权力，被下放到北京大兴的一个干校劳动，后来在周恩来的关注下才被解放。

晚年的徐肖冰和侯波，时常会回忆起“文革”这段非同寻常的人生岁月。

1986年9月25日，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侯波徐肖冰摄影展《伟大的历史纪录》开幕。侯波说，在这次展出的照片中，三分之一是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侯波告诉笔者，他们夫妇拍摄的照片，大都在中央档案馆珍藏。“我们总以为这些都是历史了，究竟有多少人会感兴趣，心里没有多大把握。可是事实上，人们对那段历史一直抱着浓厚的兴趣。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有来看影展的，一些国际友人也来观看。”这次影展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应许多外地观众要求，侯波夫妇带着那些摄影作品分别到上海、杭州、桐乡、广州、汕头等地进行巡回展出，反响之强烈连侯波他们自己都没有预料到。

当年，秦基伟看了展览后感慨不已：“像这样的照片，应当出本画册，让更多的人都能看到。”其实，侯波、徐肖冰也动过这样的念头，可是苦于没有经济能力。在杭州展览时，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同志看了展览后当即跟侯波、徐肖冰谈了画册出版的事宜。

1989年，大型历史文献画册《路》终于得以出版，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新闻发布会。邓小平同志看了画册，连说“好极了，好极了”，并在画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时，聂荣臻、杨尚昆派人送来了他们的贺信。“江泽民同志那时已是总书记了，他也给画册出版问世写了贺信。”说到这些，老人很开心，也很得意。

他们用镜头真实地记录了中国革命的风雨历程，作品既反映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展示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面，留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音容笑貌和工作生活的动人瞬间，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影象资料。1999年，举国庆祝建国50周年。这年4月9日，侯波、徐肖冰摄影回顾



钱嗣杰和毛小青、侯波、舒世俊、谢静宜在一起。

展《从延安到中南海》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隆重开幕。开幕式一结束，两位老人就被众多观众围了起来，老朋友向二老表示问候、祝贺，摄影爱好者纷纷拿出此次影展的纪念封请二老签名留念。“人们真是太热情了！听说还有一个观看影展的女同志，她拿来了40多年前我为他父亲照的一张照片，可惜我没有见到她！”侯波不无惋惜地说着。据悉，徐肖冰的家乡浙江桐乡已建起了侯波徐肖冰摄影艺术馆。采访时，他们说，我们多年的作品总算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

笔者进门时就发现客厅的小桌子上摆放着许多书、纸，还有一个大盒子。问起他们是不是又在准备出画册，问答是肯定的。侯波告诉笔者，最近有一家出版社有意出版一本他们的作品集，跟他们进行了电话联系，并跑到他们家来过两次。“准备做一本照片加文字形式的书，跟上回那本有些差别，每一张照片下都附有拍摄背景及相关故事等，档案性更强，

收藏价值更高。”徐肖冰补充说。为了赶这个集子，两位老人这段时间都在忙着找资料、写说明文字。

当问及她最后拍摄的新闻图片是哪一张时，徐肖冰抱出一本彭真画册，“1991年3月在杭州为彭真同志拍的一组图片，是她最后拍的新闻图片。”翻开一看，第一张就是侯波拍的，图为彭真坐在窗前捧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整幅跨页画面凸显出了老一辈革命家活到老、学到老的形象。笔者顺手翻到最后一页，竟也是侯波的作品——画面上，彭真推着夫人坐的轮椅缓缓而行，前方是一大片树林，一条整洁小道，这幅图片向我们真实再现了革命伉俪情深义笃的一面。出版者无意间将这两幅由侯波拍摄的图片列为首尾两个跨页，足以显示其摄影艺术之精湛。“当时她已经67岁，离休了，是彭真同志打来电话请她一块去杭州，赶去拍照的。”看来侯波同彭真似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徐肖冰的一席话让笔者终于释疑。原来，彭真与她同为山西老乡，平时就联系较多，“彭真同志在北京住的时候，有时他家里来了些其他方面的专家，他就打电话给她，请她去拍照，有时还派车子来接。”

岁月不饶人，接受采访时两位老人都是高龄之年了，他们都已经明显感到力不从心。就在采访前不久，受国家外交部、广电部、文化部、中国文联的联合约请，侯波、徐肖冰不顾年事已高，协助法国一家电视台在中国拍摄有关毛泽东的一个电视纪录片。片中以侯波夫妇为采访对象，回顾并引出建国前后毛泽东的革命与建设活动，展示一代伟人风采。于是，两位老人离家半个多月，辗转南北，配合摄制组拍摄。“我的身体还能勉强应付，他可不行了；医院来过几回通知，要他去检查身体，他自己也准备住院去。”侯波一边招呼老伴不要坐到空调跟前，一边回答笔者的提问。从那言语、神态中，笔者阅读到这对老夫妻相濡以沫的



徐肖冰与侯波夫妇。

情感。

晚年，侯波夫妇已是四世同堂，每天钟点工上门打扫卫生、买菜洗衣、做一顿中午饭，他们早餐就冲一杯牛奶就饼干，晚上熬一些稀饭就咸菜，生活非常简单。“没离休前忙拍摄任务，以为离休了会清闲。谁知退下来以后，各种群众组织找上门来，不好不参加，反倒比以前似乎更忙。这两年身体不行了，守在家的日子稍微多起来。”侯波讲到

离休的生活时，徐肖冰指着小桌上的一堆资料抢白：“守在家也不得闲，整理这些资料，这项工程很庞大。不过，我们乐意发挥余热，做点实事。昨天固然珍贵，但明天更美好。”

## 第二章

# 用影像铺设历史通道

倘若不是生于战乱纷飞的年代，徐肖冰的一生可能厮守在浙江桐乡那个虽已没落却也不失温馨的家庭，挑起长子对家庭的责任；抑或在上海滩做个有名的摄影师，执着于拍摄民众喜闻乐见的电影故事。可是，从旧中国黑暗的背景下走出来，走向红色之都——延安，徐肖冰的命运从此与“红色摄影”相连。由此，他成为当时延安极少从事专职摄影工作的摄影师之一。他的作品客观地记录了中国革命的风风雨雨，真实地再现了中华儿女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争，也展现了炎黄子孙建设新中国的火热情景，展示了开国领袖的举手投足和动人风采，不失为中国革命史上难得的影像资料。

徐肖冰生前曾接受过笔者的专访。坐在徐肖冰家的沙发上，听他回忆自己影像生涯中的故事，欣赏那些记录动人瞬间的珍贵照片，简直就像置身于时空隧道，思绪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摇曳，对摄影大师的敬慕之情也从心底油然而生。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无声地追忆着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向我们展示出一个虽显陌生却并不久远的过去。

## 一 建国前后的红色记录

翻开新中国的历史，就能发现一段真实记录新中国成长的黑白纪实片段。在片段中，再现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今日成立了！”这一气势宏伟、激动人心的场面。

当时，夫人侯波在天安门城楼上按下了快门，徐肖冰却扛着我党第一批购买的摄影机，记录下这一段光辉的时刻。他们双双成为历史永久的见证人。

在浙江省桐乡县“侯波徐肖冰摄影艺术馆”里，就珍藏有当年记录这一瞬间的摄影机——一台型号为KC505、编号为N2529，重十多公斤的德国产摄影机。抗战胜利后，徐肖冰夫妇随八路军总政宣传部到东北，成立东北电影制片厂。从此，开始了他们艰苦创业的过程。这台摄影机，就是在徐肖冰的积极倡导下，从德国购进近10台摄影机中的一台。

1949年9月，北平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利用日理万机的空隙，特地邀请出席这次会议的程潜、张元济、陈明仁、李明扬，并约请刘伯承、陈毅、粟

裕同游天坛公园。

天坛，座落在永定门内东侧，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和祈祷丰年的地方，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处坛庙建筑。徐肖冰曾回忆说：“我和侯波提前来到天坛公园。只见一辆辆小轿车从古柏丛中向回音壁开来。毛主席下车后，又转身把程潜扶下车。毛主席高兴地说：‘这几天，大家一面商量开好这次大会的事情，一面访亲会友。你们辛苦了。后天，大会开幕，就更紧张了，所以今天我钻个空子，请大家来这个地方，无非是调剂一下生活，喘一口气嘛。’”

接着，天坛公园负责人带领大家走进回音壁的大门。刚一站定，陈毅就凑近回音壁，放开嗓门接连喊了两遍：“欢迎各位光临！”声波从回音壁反射回来，清楚、逼真，不知是谁说道：“我觉得有意思的，倒是陈老总的川腔够味儿。”这个开场插曲，引起人们的一阵欢笑。

从回音壁出来，朝祈年殿走去，大家的情绪更加欢快，边走边谈，无拘无束。来到天坛祈年殿，听完向导讲解后，毛泽东以幽默的口吻说：“对于建筑物，我可不敢班门弄斧。看来，这个漂亮的殿堂，一是皇上在这里向老天爷讨好，二是用天命来欺负老百姓。后来，老百姓觉悟了，王朝也就散了。要不然，我们今天能大摇大摆地进这个大门吗？在这里说句真心话，我们应当脱帽向庶民三鞠躬。”说得大家哈哈大笑。然后，大家聚集在一起，以祈年殿为背景，徐肖冰拍下了毛泽东等和民主人士同游天坛公园的珍贵照片。

当拍摄完毕，大家准备自由结合游天坛之际，毛泽东一把拉住陈明仁，主动地说：“子良将军，来，来，咱们俩单独照个相吧！”

这太出乎陈明仁的预料了！当年，像他这样一级的军官，是不可能跟着他的蒋校长参加这样的活动的。即使有机会参加，他也不可能独享



1949年，毛泽东和民主人士同游北京天坛公园。徐肖冰 摄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开国大典游行队伍（左一持摄影机者为徐肖冰）。

殊荣——与蒋介石单独照相。因此，他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时，深知毛泽东用意的陈毅一边把陈明仁推到毛泽东的身边，一边说：“陈将军，你和主席都是湖南老乡，主席请你，你装啥子斯文哟！”

于是，他们在祈年殿西侧一二百米的地方停下来，毛泽东和陈明仁合影。尔后，毛泽东笑呵呵地向陈明仁说：“最近，在外面的谣言很多，多得出奇。说什么共产党惨无人道，把被俘的杜聿明、王耀武等都杀掉了。还说你也被我们杀了。你可以把刚才的这张照片寄给你的黄埔故旧看看，请他们不要轻信谣言，不要上当受骗，不要继续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害人害己。劝劝他们及早归来。当然，爱国不分先后，什么时候想来就来，我们欢迎；什么时候想走就走，我们欢送。这叫来去自由嘛。”

陈明仁回答：“好，我一定送。我打算洗 10 打，120 张。”毛泽东连连摆手：“不够，不够，至少要洗 50 打。”徐肖冰看到陈明仁的军人风格很突出，回答得坚定而简洁，他感到毛泽东在给自己一项重要的任务：“好！我照办！”

1949 年开国大典前夕，徐肖冰和侯波同时接到上天安门城楼拍摄的通知：徐肖冰负责电影拍摄，侯波负责照片拍摄。为了预防万一，作为拍摄队长的徐肖冰与电影厂里的其他同志作了充分的拍摄准备，多次去天安门踩点找拍摄角度，并事先准备了多台摄影机，架好机器，多角度地拍下这一重大历史瞬间。

摄影机比起没有广角的照相机方便得多，不仅可以捕捉到所有领导人的近景、特写，还能俯拍城楼下群众欢庆的热烈场面。徐肖冰生前对开国大典的拍摄有着清晰的记忆：“开国大典那天我和侯波都在城楼上，她还是唯一的女摄影师。我在城楼上主要是拍摄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知名人士活动的镜头。那天虽然有许多中外记者，但可以上天安门城楼的并不多。当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整个北京城沸腾了。我握摄影机的手都有点哆嗦，但拍摄效果还是很好的。当时我很自豪，因为我能有幸记录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这是我作为一名摄影工作者的莫大荣幸。”

在 1949 年下半年，北平电影制片厂与苏联一摄制组首次联合拍摄《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两部大型纪录片。

为拍好片子，中国方面专门组建了摄制班子，苏联来了一位国际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他担任《解放了的中国》的导演，徐肖冰任摄影组总领队，著名作家周立波为文学顾问。从开国大典到内蒙古大草原，通过不同的角度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用他们引以为豪

的方式，欢庆祖国胜利的场面。

《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两部纪录片是新中国第一次拍摄彩色纪录片，技术要求非常高，但当时中国还没有能力搞后期制作，徐肖冰远赴苏联，与苏联友人一起完成了后期制作。彩色纪录片的创作历时近两年，在国内第一次放映时就引起了轰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后，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1951年，这两部片子选送到苏联，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一等奖。1951年3月14日，苏联文化艺术部长会议第981号决议，授予徐肖冰一级斯大林奖金。参加摄制的每个人都得到了一笔奖金，徐肖冰也得到3000多卢布。这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徐肖冰只拿回了奖状与证书，把这笔奖金捐给了抗美援朝部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并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还越过“三八线”，威胁中国东北边境。10月5日，毛泽东作出派彭德怀带兵入朝的决策。

10月20日，北京电影制片厂（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新闻摄影师们在西四牌楼电影院听朝鲜形势报告。一散会，徐肖冰等首批抗美援朝摄影队的人员就接到了厂领导的秘密通知，



1950年，徐肖冰入朝时留影。

要他们立即回厂领黑口袋（暗袋）、摄影机和片包，做好开赴朝鲜前线的一切准备。

10月25日，由徐肖冰为领队，摄影师刘德源、石益民、牟森，摄影助理苏中义、赵化、孙树相、李刚等13名同志组成的摄影队，悄然离开北京，到达沈阳后，按当时进朝要求换上朝鲜人民军式的军装。11月3日晚上，他们从集安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满浦，踏上寻找主力部队的征程。

入朝后，这些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随军摄影师们，顿感这场战争的残酷和形势的严峻。美丽的朝鲜江山被战火烧成焦土，到处是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千架敌机24小时不间断地轮番扫射轰炸。在向前开拔的路上，迎面匆匆而过的都是从前面退下来的朝鲜人民军和群众，有人就问他们，你们有飞机吗？一听说没有，他们便很失望，表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很难抵挡住敌人的攻势……

在朝鲜战场上，徐肖冰顾不上彭德怀司令员注意安全的一再叮嘱，依然往最前线跑，往最能拍摄激烈战斗的危险处跑。“我们就扛着那台KC505型德国产摄影机，跟在志愿军战士身后，把他们战斗的场面全都拍下来，甚至他们怎样为国献身的，在我们的胶片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有很多镜头，看了以后非常振奋人心。片子在全国放映后，引起了很大反响，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徐肖冰与同事的名字不该被历史的烟尘所淹没，他们是一批用鲜血和生命记录朝鲜战争的人。

在朝鲜战场上，徐肖冰和同事们冒着枪林弹雨，拍摄完成了纪录片《抗美援朝》第一部与第二部以及《英雄赞》、《最可爱的人回来了》等影片。很快，一批反映朝鲜战场的影像素材被传回国内。

当年，《抗美援朝》第一部在全国44个城市的部队、工厂、农村同时上映，徐肖冰等战地摄影师还在放映时向群众报告前线战况，受到极

大欢迎。此片成为当时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活教材。《人民日报》在短评中称它“在人民电影的历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这部影片在1952年捷克第七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荣获“劳动人民争取自由和平斗争奖”。其中，徐肖冰、刘德源获得朝鲜政府颁发的三级国旗勋章。《抗美援朝》第一部还获得了文化部一等奖。

经过5次战役，我军先后歼敌23万人，敌人被迫坐下来谈判，但敌人又毫无诚意，打打谈谈，不知耍了多少花招和阴谋。在那些日子里，徐肖冰等摄影师几乎天天都能在板门店谈判中拍到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期间，徐肖冰担任板门店中方新闻团副团长，后荣获朝鲜政府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

值得一提的是，北影在抗美援朝期间先后有五十多人奔赴前线，其中摄影师杨序忠在炮火中英勇牺牲。

## 二 扛摄影机就像持作战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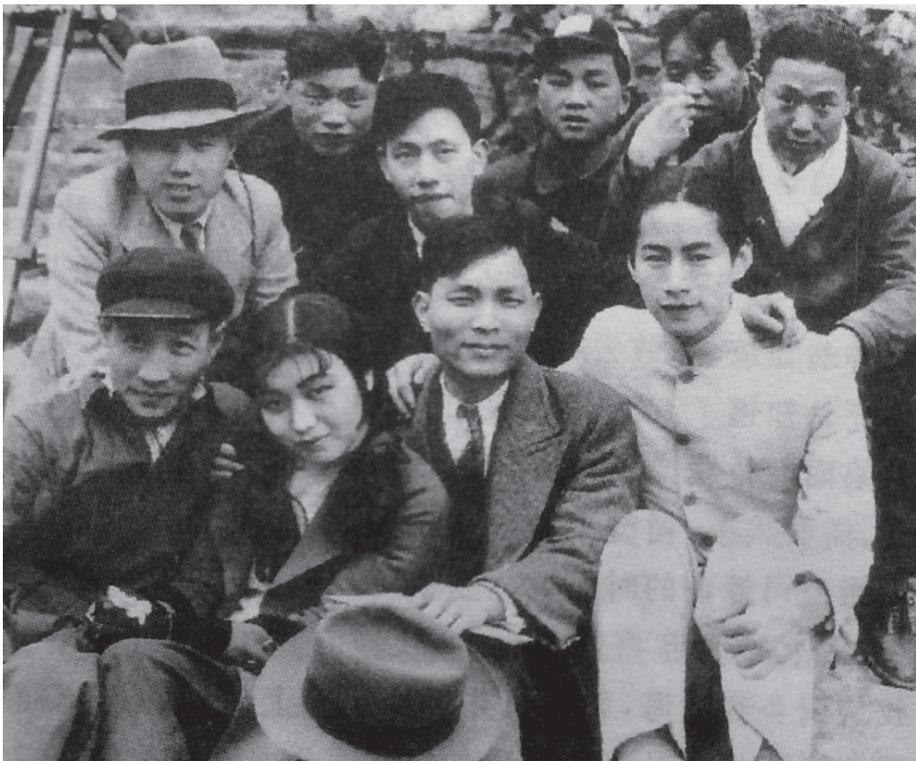
徐肖冰是浙江桐乡人。他回忆说：“6岁的时候，家人送我进私塾启蒙。我的外婆家在乌镇，小时候最令我兴奋的是去外婆家，不仅能喝上一碗放上白糖的银耳汤，晚上还可以在乌镇空地上看无声电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这年冬天，年仅15岁的徐肖冰为维持生计而离开了故乡，追随在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做发行员的舅父来到上海，在天一影片公司照相科当了一名学徒工，在这里学会了配药水、洗照片、放大、修花点、修底版等暗房技术。

尽管年纪小，当时社会各界的抗日热情还是深深地影响了徐肖冰。他曾回忆说，当时有很多青年人走上街头抵制日货，宣传抗日。他虽然没有参加，但从心里还是支持这些人的。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发生，当时驻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以及全上海对十九路军的支持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年少贪玩，徐肖冰有一次在上班时间被同事拉出去捉蚰蚰，公司老板发现后就将他开除了。“这看起来是一件坏事，但实际上也是一件好事。”徐肖冰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曾禁不住笑着如是说。经过“天一”

公司的同事、共产党人司徒慧敏的介绍，徐肖冰进入了“电通影片公司”。这家公司和当时的“左联”联系非常紧密。在这里，徐肖冰逐渐受到左翼文艺思想的影响，逐渐接触到袁牧之、陈波儿等进步电影人士，也逐渐了解了夏衍、阳翰笙、阿英、聂耳、田汉等左翼文化名人。从这时开始，他一直担任摄影助理，协助吴蔚云、吴印咸等摄影师拍摄了《桃李劫》、《自由神》、《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等一系列著名的进步影片。这些影片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从那时起，徐肖冰开始正式接触电影拍摄工作。



1935年3月，徐肖冰（后左四）在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与王莹（前左二）、司徒慧敏（前左三）和施超（前右一）等合影。

“电通”公司于1935年被国民党当局强行关闭。恰好此时，武汉国民党军队系统的政训处电影股（后成为中国电影制片厂）到上海招人。迫于生活压力，徐肖冰于同年5月跟随吴蔚云奔赴武汉。在那里，徐肖冰满眼见到的都是国民党不断宣扬自己的“剿共”成绩，到处张贴反共标语与宣传画，肆意丑化中共领导人。他深感这里不是他要呆的地方，想尽快离开。但当时电影股管制很严，不许员工随意离开。他就给远在上海的吴印咸去了一封信，希望吴印咸以自己家人的身份发一份假电报，说自己的祖父去世了，要他回家奔丧。吴印咸按照他的意思发来了电报。于是，徐肖冰以回家奔丧为名，请假离开武汉到了上海，这一离开就再也没有回去。这时大约是9月份，距离他刚去武汉不足4个月。

到了上海后，徐肖冰经过熟人介绍，进入当时的“明星影片二厂”继续从事电影拍摄工作。一个多月后，徐肖冰接到一个来自武汉的朋友的秘密消息，说武汉那边的电影股已经在其内部刊物上将他列入了通缉名单，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咨询了律师后，徐肖冰就只好在上海的租界区活动，因为在那里国民党是不能随便抓人的。“一个中国人，却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地行走，这算怎么回事呢？”徐肖冰在晚年回忆起来，仍不无感慨。但无论如何，也算是化险为夷了。

“明星二厂”里的大部分员工还是原来“电通影片公司”的人，像司徒慧敏、袁牧之、陈波儿、吴印咸等，都在那里。这让徐肖冰欣喜不已。



1934年，徐肖冰在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任影片《桃李劫》摄影助理。



朱德、左权和时任西北电影公司摄影师的徐肖冰（左一）等合影。俞创硕 摄

他继续协助这些人拍摄了《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进步影片。可惜好景不长，到1936年底，“明星二厂”也被迫关闭了。

1937年初，山西太原的“西北电影公司”来上海招人，于是，徐肖冰又跟随吴印咸来到太原，进入“西北电影公司”工作。从5月至7月中下旬，他们在五台山地区拍摄影片《塞北风云》，住在五台山的寺庙中。由于消息闭塞，他们根本不知道当时的“七七事变”。直到有一天，一批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进入寺院，将他们赶了出来，他们才知道日军已经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剧组只好回到太原。此时，太原已经遭到日军的轰炸。徐肖冰决定到前线去拍摄一部反映抗战的片子。于是，他带上一架小型摄影机和厂里开的介绍信，前往山西北部进行采访拍摄。一路上，他不断见到从前线溃败下

来的国民党军队，那些军官也根本不理他，只顾自己逃命，这让徐肖冰非常失望。甚至有一次他在老乡家休息时，一伙散兵闯了进来，将他身上值钱的东西搜刮一空，末了还朝着他开了几枪。幸亏打偏了，不过也着实将徐肖冰吓得不轻。本来想去拍摄军队英勇抗战杀敌的片子，结果不仅没拍到，还差点丢了性命，无奈之下徐肖冰只好往回走。在回去的路上，他碰到了一支正在开赴前线的八路军部队。他们热情地招待了他，并主动向他介绍了八路军的抗敌政策，最后还通过沿路的八路军兵站一路护送他安全到达了太原。这让徐肖冰感动不已，并由此萌生了参加八路军的想法。

此时，“西北电影公司”正打算撤往成都，徐肖冰坚决不去大后方，要积极参加抗战，于是就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参加八路军。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听说徐肖冰是拍电影的，就表示八路军部队的条件非常艰苦，连最基本的电影拍摄设备都没有，劝徐肖冰再慎重考虑一下。但徐肖冰参加八路军的决心很大，连着往办事处跑了好几次。办事处秘书赵品三接待了他，在询问了一些情况后，让他耐心等待。

终于有一天，赵品三对他说：周副主席要见你。当时，徐肖冰并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周恩来，但猜想这可能是八路军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跟着赵品三刚走进一个院子，一个英俊潇洒的中年人便走过来握住了他的手，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亲切地问他：你就是徐肖冰吧？从上海来到北方生活习惯吗？听说你是搞电影的，你要参加革命队伍，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周恩来还说，我知道电影的作用很大，但现在我们还不具备拍电影的条件，等以后物质生活改善了，我们会有自己的电影队伍。他鼓励徐肖冰先到前线看看，不急于拍什么片子，就是先感受一下战场的枪炮声



1938年，一名八路军战士在太行山上骑马而立，吹响号角。  
徐肖冰 摄

和战士的生活也好。

对于这位虽然当时并不十分了解，但实则是他革命引路人的周恩来，徐肖冰有一种知遇之恩，他马上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吴印咸，吴印咸也很为他高兴，并把一台德国名牌相机“雷丁那”赠送给他，算是对他参加八路军的祝贺。徐肖冰又从“西北电影公司”借了一架小型摄影机和一盒胶卷，匆匆准备了一下行李，没过多久，就遵照周恩来的指示，

向山西五台山地区的抗敌前线出发了。

到了五台山地区以后，他先被带到了前线的八路军指挥总部，刚好碰上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八路军领导人在院子里商量事情。出于职业习惯，他举起手中的相机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这也是他印象中第一次给党和八路军的高级领导人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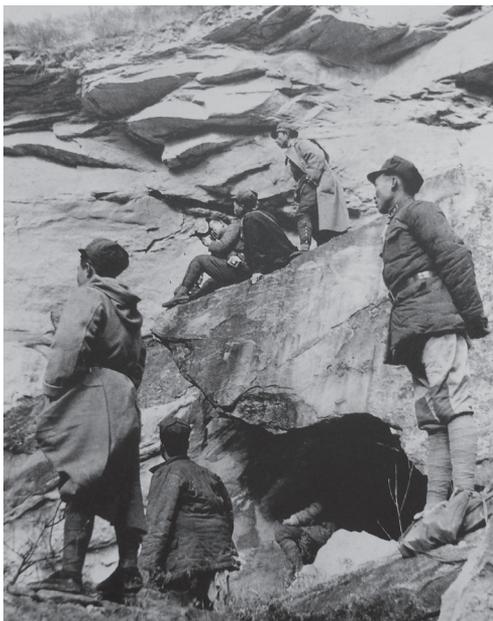
令徐肖冰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中自己被关进牛棚，罪状之一竟是在太原参加革命这一段历史没有人证明。但事情就是那么巧，周恩来总理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文化系统工宣队、军宣队开会时，问到了一些同志的情况。当谈到徐肖冰时，他问新影厂工宣队代表：“徐肖冰有什么问题？”听说找不到徐肖冰参加八路军的证明人，周恩来笑了：“我就是他的证明人。他是1937年秋天在山西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参加革命的。

我找他谈的话。”结果第二天新影厂就宣布他被解放。

1938年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成立。“电影团初创时，政治部主任谭政兼任电影团团长的，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李肃负责政治与组织工作，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吴印咸和我担任摄影，另外又从抗大的学生中调来叶全林和魏起。全团中只有袁牧之、吴印咸和我是搞过电影的。”徐肖冰如是说。

在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筹备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准备拍摄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该片邀请了袁牧之、吴印咸等人专程从国统区赶到延安来进行拍摄，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徐肖冰也被调了出来参与拍摄工作。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约见了他们。徐肖冰生前回忆说：“主席知道我们是搞电影工作的，他问我们生活怎么样？学习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问得像家人谈话似的，非常随意，非常亲切。主席讲，以后我们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要解放全中国，到那个时候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任务就很重要了，你们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这是徐肖冰和毛泽东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当时的徐肖冰怎么也没有想到，10年后自己的妻子侯波会成为建国后毛泽东的首任摄影师。



1938年10月八路军电影团成立，在延安采访时拍摄电影。图中袁牧之、叶全林、吴印咸等在清凉山的岩石高处，左一是电影团领队李莆。徐肖冰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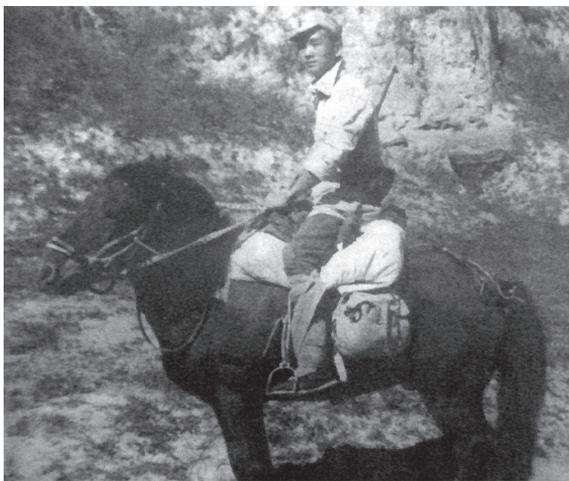
1939年，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全体成员离开延安去华北抗日根据地时合影（左四为徐肖冰）。

当时的摄影条件非常简陋，环境异常艰苦，摄影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据徐肖冰回忆，有一次，日军轰炸延安，他当时生病，躺在床上休息，吴印咸正在屋子里修相机。忽然，屋顶被炸塌了，他和吴印咸都被压住了，幸运的是，两人都只是受了点轻伤。当时周恩来在百忙之中还抽空亲自来看望他们，这让他们非常感动。

1939年1月下旬，影片《延安与八路军》完成在延安的拍摄部分。此时，毛泽东接见了摄制组的代表，其中就包括徐肖冰。之后，摄制组兵分几路，开始了前线部分的拍摄任务。

“1939年9月，我随电影团来到冀中平原，先后在雄县、霸县等地区的游击队中活动了两个月。因为他们对当地的地形很熟悉，我们就靠着民兵的引导沿着合适的路线前进，或者把敌人引入我们的包围圈，或者摆

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如果没有老百姓的带领下，我们恐怕早就牺牲了。电影团到达晋西北根据地后，时任一二〇师师长的贺龙，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贺龙从有限的战马中拨出几匹送给了电影团，并派队伍保护我们穿越日军设在晋西北与晋察冀两个根据地之间的封锁线。”据徐肖冰回忆，过封锁线时，他的心情非常紧张。“在部队的掩护下，我们傍晚出发，天黑后进入敌占区。夜行军中，会有狗叫，这本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日军往往会根据狗叫声，判断出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动向，迅速出动发起攻击。那时每个村子都养狗，虽说不是家家户户都有，但也不少。那些狗的反应非常灵敏，一有风吹草动，它们就‘汪汪’地叫个不停，要是听到有人进村了，更是狂吠不止。加上村子里还有极少数被日寇收买潜伏的汉奸，一旦获知八路军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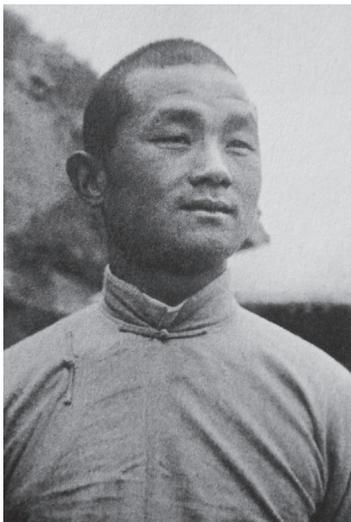


徐肖冰在从延安去晋西北拍电影的途中。



延安电影团部分同志在张家口与晋察冀文艺界名流合影。后排右起：钱筱璋、徐肖冰、汪洋、石少华、高天辉，中排左起：侯波、张建珍、田华，前边两个小孩是刚从延安来的沙飞的儿子大力和女儿小力。

队的有关情况，就给敌人通风报信、打信号弹，引来敌人的疯狂围攻。所以一听见狗叫声或看到信号弹，我就紧张得心怦怦乱跳。过了晋西北，我们来到冀中平原。本以为在这里可以少走些山路，哪知道又赶上百年不遇的水灾，形势更加严峻。从安全角度出发，大家只能在晚上趟水行军。为防止人员失散和发生意外情况，大家都用捆扎裤腿的绑带一个个地串连起来，队伍从第一个起，一直串连到最后一个。”



1939年，乔装打扮后的徐肖冰。

在拍摄《延安与八路军》期间，有关敌占区井陘煤矿的场景故事需拍摄一些镜头。替八路军办事的维持会长想出一个法子，他让徐肖冰换上长衫，并在胸前补上一个良民证，把摄影机装在一个钱褡子里，背在背上。“到了据点前的岗上，一个新来的哨兵硬是要看我的钱褡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这可把我吓坏了。幸亏维持会长连忙过来挡了过去，说里面装的是给他们队长送的一点心意，而且还塞给那个哨兵一包自家产的大烟。”这样，徐肖冰才混过敌人的哨兵，钻进日本兵夜间打信号灯的一个堡垒里面，将摄影机的镜头伸进敌人往外打枪的枪眼，这时事先安排好的八路军便衣正好在铁路线上行动。这样，鲜活的镜头就被永久地留存在影片中，成为弥足珍贵的史料。

“我们八路军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敌人的情况也摸得一清二楚。对战场熟悉后，我就不紧张了。胆子大了，我就用日本兵当‘群众演员’，把日本的火车当拍摄道具。有一回，我们侦察兵获得一个情况：太原有一列装载着武器、弹药的火车，要到井陘煤矿。得知部队决定要打掉这

列军用列车时，我就让一部分战士带一些柴草，嘱咐他们在打火车时，把柴草点着照亮，我就可以拍电影了。虽然战士们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拍摄计划，但只要是为了打鬼子的事，他们绝无二话。大家就在铁道上埋下地雷，备好柴草。准备妥当后，我和战士们埋伏在铁道旁，敌人的军火列车呼啸而至，驶到预定位置，一声巨响，地雷爆炸了，列车瘫在铁道上。没想到司机拉响了汽笛，长



1940年百团大战中，活跃在正太路战场上的延安电影团摄影师徐肖冰。

鸣的汽笛引来敌人的进攻。战士们为了回击日军，无暇点燃准备好的柴草。由于光线昏暗，电影也就没有拍成，我的拍摄计划没能实现。”徐肖冰说，“因当时条件艰苦，自己一个人一台机器，没有像现在这么齐全的设备，甚至连灯光、反光板都没有。每次拍人物时，得靠窗户定位，既要考虑到光线，又要表现出指挥作战的场面：诸如打电话、看地图等。为了真实地体现出那种特定气氛，我还得做些导演工作，因为只有一台机器，所以摆在什么位置，用什么角度拍，都要事先考虑清楚，做到胸有成竹。



1940年，民兵担架队头上是敌机，前面是敌人的炮火，他们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徐肖冰 摄



1940年，我军骑兵乘胜追击。徐肖冰 摄

即使是这样，有些时候，拍一次不能成功，还要重复再拍。”

因拍摄需要而“导演”、“指挥”领导人的事儿，徐肖冰说有过不少。“为了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中拍摄一些关于八路军高级将领指挥作战的场面，我来到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在那里，我见到了许多威名赫赫的大人物，比如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杨尚昆、陆定一、李雪峰等人，其实他们都非常平易近人。由于当时的拍摄条件比较差，只有一



1940年，我军攻打榆社。徐肖冰 摄

台摄影机，我一个人拍，有时拍一次还不一定能成功；有时一个动作拍一个角度不够，还要从别的角度再来一次。那些领导人被我‘指挥’得一会儿坐着，一会儿又站起；一会儿让他们在军用地图前表演作战部署，一会儿让他们换换位置。总之，同样的动作，让他们做好几遍。”这样的事，就是专业演员也有为反复折腾而厌烦的时候，更何况所摄对象是当时身负重任的高级领导人，可想当时拍摄中的徐肖冰真可谓是“胆大妄为”了。

“终于，有人抗议了，就是邓小平同志。我开始给他拍的时候，他很拘谨，拍着拍着他就烦了。他大声说，把我们平常工作的场面拍下来不是很自然吗？现在，重复的东西太多，表演的东西太多，很不自然，你们这

是搞什么嘛？拍一点不就行了吗？”晚年，徐肖冰也似乎悟到那时对那些大人物们“指手划脚”而有失他们的“身份”。幸亏当时有刘伯承圆场，要不，徐肖冰可能就下不了台了。“刘伯承的话说得非常有意思。他说，不拍不知道，一拍吓一跳。原来拍个电影这么麻烦，看来我们这些人是做不了演员了。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说完这段“趣闻”，徐肖冰也孩子气地一乐……



1940年，我军在华北地区敌后发动百团大战，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前线指挥。徐肖冰 摄

新闻摄影的崇高使命就是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世界，为了更好地拍摄八路军歼敌的实战镜头，徐肖冰背着摄影机和照相机奔赴太行山抗日最前线。“在拍摄攻打敌人盘踞的榆社县城时，陈赓对我说，这仗易守难攻，一定会很残酷、很危险。但我一心想拍到更生动、更精彩的场面，甚至还想过把枪瘾，结果几次差点撞上了日本鬼子的子弹。”被安排躲在巷道里偷拍战斗场面的徐肖冰，实在按捺不住拍摄宏大场景的激情，跳出去扛起摄影机，像战士挥枪作战一般。

可是刚拍了几个镜头，敌人的机枪就扫过来了，子弹不断掠过眼前到土地，硝烟滚滚。几个战士刚把他拽回来，又一梭子更猛烈的子弹打过来。“真险，再晚一会儿，我就光荣了！战士当时对我吼道：‘你不要命了！敌人会把你脑袋打碎的！’我就只好在后面找缝隙拍敌人的惨相。”回忆当年在激战中拍摄电影的情景，徐肖冰十分动情：“有些镜头是我爬过战士的尸体拍的，现在想起来心里还发颤。”战争是无情的，人却是有情的。战地摄影师用摄影机记录下战争场面及参与战争的人，让后世永远看清战争的残酷无情，只有远离战争才有人们的幸福生活。

“百团大战”关帝庙战场上，彭德怀举起望远镜在掩体坑遥望前方。徐肖冰给彭德怀拍的这张照片，将战场气氛与人物气质、动态、神态，真实、艺术地完美展示出来。“的确，这张照片是把彭老总的英勇、豪爽之气表现出来了。彭老总是个非常严肃、认真的人，他的形象一出现，就让人感到非常大气，有气魄。”这张战地实拍的照片，背后同样有一个“传奇”。当时敌人就驻扎在对面的山上，距我军关帝庙指挥部不远，不到一颗子弹的射程。“敌人的炮弹不时打过来，但很有意思——这些炮弹似乎长了眼睛，只要彭老总一出现，敌人的子弹、炮弹就远远地落到别处，好像也怕彭老总。”在这种环境里，根本没有可能让彭老总做个动作，摆个姿势，徐肖冰紧跟彭老总，瞅准机会就忙按快门。“还好，照片拍得还行。要不，哪有机会去重拍！”在战火中把握了机会，成就了一个个史诗性的画面，徐肖冰承认自己这一生没有因此而留下遗憾。

“陈赓是八路军里面一个特别能打仗、又非常有个性的指挥员。他与别的指挥员相比有非常明显的特点——幽默，好开玩笑，就连主席都经常与他说笑。但他的军事才能也是非常出色的，蒋介石曾挖空心思把他拉拢过去。”徐肖冰在陈赓的三八六旅呆的时间较长，对陈赓的印



1940年，攻打榆社战斗胜利后，前线指挥员陈赓、周希汉等在阵地上。徐肖冰 摄

象尤其深刻。“百团大战后期，陈赓接下了打榆社的任务，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打起仗来，陈赓异常严肃，老是绷着脸，一点笑模样也没有，直到最后把城攻下来，他才露出笑容。”战事告捷，徐肖冰给陈赓和他的搭档周希汉照了一张特殊的照片——两人站在一座碉堡前，周希汉微微一笑，陈赓双手插腰，笑容满面，滑稽的是他还穿着日本兵的军装。透过这张照片

片，可以想见打了胜仗的将军心情是何等愉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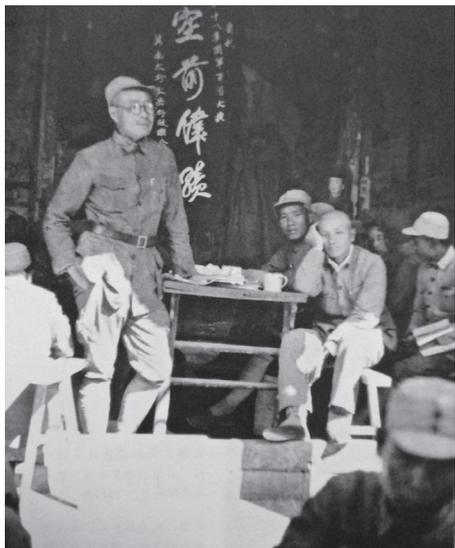
战场上，徐肖冰给朱德总司令拍过一张骑马的照片，解放后曾被印在邮票上，广为流传。“其实，当时在战场上，朱总司令非常忙，我这样一个普通的摄影工作者并不能经常见到他，更别提什么拍照片。”这张照片的问世也有其不为人知的一面：那一次，徐肖冰在八路军总指挥部，看到朱德正与一些官兵说笑，旁边的一匹马长嘶不已。这匹马是聂荣臻从战场缴获的日本马，便作为战利品送给了朱德。日本马个儿高，上下马很不方便，所以朱德没有骑驾。徐肖冰心想，这回可得给朱总司令拍张照片，弥

补缺憾。于是，他对朱德的警卫员说，能不能让首长骑在马上照张相。没想到警卫员过去报告后，朱德竟满口答应。照片洗出来后，徐肖冰拿去给朱德看，他非常满意，连连说徐肖冰把他拍漂亮了，“好是好，但是你看我哪有照片上那么漂亮？”晚年，徐肖冰还觉得朱德一口四川话仿佛萦绕在耳畔，而那些场景也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延安与八路军》这部片子的胶片后来送到苏联去洗印，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莫斯科的电影机构被撤到大后方，最后也没能做成一部片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但令人欣慰的是，在拍摄这部片子的时候，由于我自己对拍照片的挚爱，便通过照片的方式记录下了那一段历史。不过，绝大部分底片在战火中散失了。我拍了八路军的战士，



1940年，朱德在太行山。徐肖冰 摄



1940年，百团大战胜利后刘伯承在总结会上讲话，右侧是邓小平。徐肖冰 摄



1941年，有八路军的保卫，敌后的孩子可以安心学习。图为孩子放学回来向妈妈汇报学习情况。徐肖冰 摄



1940年，百团大战后，民兵在太行山拆除日军防御工事。徐肖冰 摄

拍了民兵支援抗战的场面，拍了战场的硝烟，拍了战场上的指挥员，更拍了那些‘运筹于帷幄之间，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将军们，并与他们结下了战斗的友谊。”徐肖冰这一时期拍摄的照片大部分被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1940年，妇救会主任在村前村后一边敲锣一边高喊“鬼子来了”。徐肖冰 摄

### 三 历史被写进教科书的背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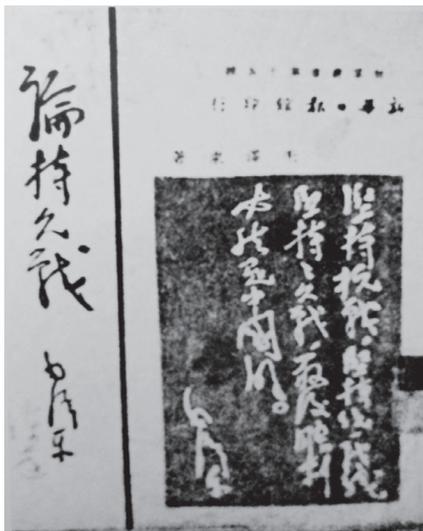
当年，17岁的徐肖冰在国民党政训处电影股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中国有个毛泽东。“这个政训处也画宣传画，画毛泽东，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共产党有个毛泽东。他们把毛泽东画得龇牙咧嘴，像个魔鬼。”令徐肖冰意想不到的，他在延安亲眼见到了宣传画中描述的那个毛泽东。1937年冬，他一到延安就被分配到后方政治部宣传科做摄影干事，从此他用普通相机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影像，利用方寸之间承载了无数重大历史事件。

徐肖冰在晚期年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奉命拍摄照片的情景。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等人从苏联回国，毛泽东、林伯渠等领导人去延安机场迎接。在拍摄了一个大场景后，他想寻找其他合适的角度继续拍摄。忽然，他被一个外国人拽住了，那个外国人操着一口不大流利的汉语严厉地问他：“你是干什么的？谁让你来这里拍照的？”徐肖冰赶紧解释说：“是组织上派我来的拍摄的。”旁边也有人出面作证。那个外国人才将信将疑地松了手，但还是一直用怀疑的眼光不停地扫视他。原来，那个外国人叫马海德，是和斯诺一起来中国的国际友人。

后来，他就在中国定居了。直到“文革”后，徐肖冰在大街上见到马海德，还开玩笑说，你是一个医生，当年那么盘问我，是不是有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呀？这时马海德总是不好意思地笑笑。徐肖冰说，通过这个故事，也可见当时延安的摄影者是很少的，摄影工作开展起来很不容易。

徐肖冰生前谈起他在延安的拍摄活动，印象最深的当属第一次给毛泽东主席拍照。“那是1938年冬天，主席在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讲演《论持久战》。那时我也在抗大学习，是抗大四大队第三期的学员。他讲得非常吸引人，会场不断爆发出笑声和掌声。那天的会场被挤得水泄不通，我举着相机，想从正面给主席拍几张照片，可是镜头里满是攒动的人头，就是看不见主席。没办法，我只好绕到旁边拍主席的侧面，选择的角度刚好可以带上一些听众。”

说到这里，徐肖冰找出那张名为《毛主席在抗大讲“论持久战”》的著名照片，摆在笔者面前。穿军装，戴军帽，双手插腰，气宇轩昂——



毛泽东《论持久战》。

画面上，主席的侧面与听众的正面叠在一起，毛泽东的形象几乎占满整幅画面。这张照片第一次与观众见面是在1968年，摄影界认为这幅作品拍摄领袖人物敢于从侧面取景，而且把听众的反衬也带上了，瞬间抓得好，表现的动作也很生动，是一幅不可多得的珍品。这张照片已成为我党我军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而被各大媒体或出版物普遍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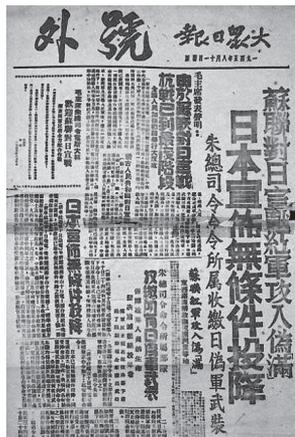
在延安，徐肖冰从自己的镜头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报告。徐肖冰 摄

里真正认识了毛泽东。“那时主席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主席办公时，任何人，包括卫士都不敢惊动他。那么用什么办法让他休息呢？于是让李讷、让叶子龙的孩子进去把主席拽出来，要他出去玩玩。小孩就是小孩，主席让小孩这么一哄，一弄，就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了。主席看见小孩就逗小孩，小孩也逗他。”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结束。8月14日、8月20日、8月23日，蒋介石三次发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讨论国内局势以及和平、民主、建



刊发“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的《大众日报》套红号外。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登机后向大家挥手作别。徐肖冰 摄



油画《重庆谈判》。

国等问题。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通过和平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应避免内战或使全面内战尽可能地推迟爆发。于是，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

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4日，毛泽东电复蒋介石，表示愿意赴重庆谈判，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8月28日，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赶赴重庆。

中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挥手之间》，写的是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延安群众机场送别主席，文中配了一幅毛泽东站在机舱口挥动帽子向送别人群作别的图片。图片中的毛泽东目光坚定，面带微笑，挥动帽子的手高举着，似乎高举起革命必胜的信念。这幅经典图片的拍摄者，就是这一历史场面的见证人徐肖冰。

徐肖冰对这张老照片的回忆，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那一历史瞬间。“这是毛主席生平第一次坐飞机。那个时候，在延安的机关干部、人民群众，成千成万，几乎都到机场送主席去了。那天，我和吴印咸、郑景康等几个人早早来到机场，选择拍摄角度。主席是坐着美军所提供的吉普车到机场的。他穿着灰色中山装，头上戴着周恩来同志送他的一顶盔式帽——



中共七大会议现场。徐肖冰 摄

这种帽子当时并不多见，戴上去便显得主席更加高大伟岸。他一边登飞机，一边挥动帽子向群众作别。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一去吉凶未卜，都替主席担心。可主席神态安祥，就像是走个亲戚串个门，去做一件很一般的事，马上就能回来，一点都没有紧张。就在他走到机舱口，回过身向群众挥手致意的瞬间，我被这种镇定自若的气度深深震撼了，意识到什么，当即抓拍下来。”徐肖冰怎么也没想到，这张照片后来竟无数次被转发或展览。也因为这张图片，徐肖冰和以后创作出《挥手之间》这篇文章、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方纪成了要好的朋友。

1946年5月，徐肖冰夫妇随八路军总政宣传部向东北开拔。到东北鹤岗后，徐肖冰夫妇都被分配在新组建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

制片厂)。徐肖冰任技术厂长，22岁的侯波被任命为摄影科长——摄影科由侯波和6个日本技术人员组成，聪慧的侯波在单位虚心向日本技术人员系统学习冲洗胶片和摄影技巧，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丈夫请教，为成就一代摄影大家奠定了基础。

“我随解放军剿匪部队进入深山老林，拍摄了《活捉谢文东》的纪录片，后来就下乡拍土改，亲历了东北的解放。”徐肖冰曾这样回忆有关细节：“活捉谢文东特别有意思，谢文东是东北的土匪，我就随着我们的剿匪部队拍摄。我们部队逮捕谢文东时，他正在一座庙里跪拜，祈求神灵保佑。看到我们，一下子就躲了起来，并且掏出手枪准备还击。我那时忘了什么叫危险，举起摄影机就拍，一下子把谢文东搞愣住了，举起双手乖乖投降了。等我们将他捆好了，他还在问：‘那是什么武器？’原来，他把摄影机当武器了。”



1949年春，毛泽东走进香山双清别墅。  
徐肖冰 摄

“新中国就要成立了，要我参与一些拍摄。1949年年初，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中央的办公地点迁往北平。会后，中央五大书记到达北平，在西苑机场举行了简短的阅兵式，我都拍摄了。”在这里，徐肖冰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他没想到时隔4年，毛泽东居然还认识自己。“当时我拍照的时候，在人群里被挤来挤去，三脚架不时给挤歪，这时候就听到毛主席说：‘这不是徐肖冰吗？’我还没来得及说

话，毛主席就对身边的民主党派人士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摄影师，是吃着延安的小米稀饭长大的。’”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在北京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横渡长江天险的百万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猛追敌寇。

北平香山的4月，草绿了，树绿了，漫山遍野山花欲放，双清别墅春意盎然。接到陈毅进驻南京“总统府”的电话，通宵未眠的毛泽东兴奋得仍无睡意，在院子里踱着步，嘴里喃喃地吟哦着即兴创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时，秘书兴冲冲地走来，递给他一张报纸的号外，



1949年，毛泽东细阅“南京解放”号外。徐肖冰 摄

说——主席，南京解放捷报出来了。“主席接过报纸，坐在椅子上，从头到尾认真阅读起来。报纸上‘南京解放’的大字标题赫然醒目。我正好在场，为了不惊动主席，悄声连续地拍了三四张主席审视、阅读有关‘南京解放’的报道，留下了这历史的瞬间。”照片上，毛泽东神情非常认真，手中的报纸报头赫然可见“号外”等几个大字。“‘咔嚓’的快门声，还是惊动了主席，他抬起头来，朝大家微笑。”

之后，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接着吟诵那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七律诗。此情此景，一直铭记在徐肖冰心中：“我在香山为主席拍了好些照片，其中自己感到最有意义的就是他仔细阅读‘南京解放’号外的这个历史镜头。”当笔者提及曾经有议论说这张照片是拍摄者“导演”出来的，徐肖冰听后仰头哈哈大笑。“说这张照片是我导演的，怎么可能呢？当时



1949年4月，毛泽东和毛岸英、刘思齐、李讷在香山。徐肖冰 摄

我们拍领导们活动的照片，都是瞅准机会抢拍、抓拍，甚至得偷拍，领导人日常工作都安排得满满的，哪有时间专门让我们拍来拍去？”

徐肖冰笑言：“在毛主席刚到双清别墅的时候，江青与女儿李讷经常陪伴他。后来江青带李讷去苏联养病，儿子毛岸青与女儿李敏又来到了他的身旁。李敏刚来的时候满口俄语，几乎不会讲中国话，还得要毛岸青为她和父亲当‘翻译’。但是，她那叽里呱啦的童声稚语为双清别墅增添了不少乐趣。此外，大儿子毛岸英和他的未婚妻刘思齐也经常前来看望父亲。对毛主席来说，与孩子们相聚所获得的快乐是十分珍贵的。”在这一时期，徐肖冰曾经几次去香山，拍摄了毛主席难得的家庭生活场景。



1949年4月，毛泽东与毛岸英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谈笑风生。徐肖冰 摄



## 四 “摄影大师”的淡泊人生



1942年，侯波、徐肖冰结婚合影。

1937年，侯波还是一个14岁的小姑娘时，就从老家山西夏县辗转到了延安，先是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后又进入中央医院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医护工作。1942年春天，她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经组织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大8岁的徐肖冰，并确立了恋爱关系。当时，曾有人劝告侯波，说徐肖冰是从上海来的知识分子，两个人的成长经历不一样，劝她

慎重考虑自己的终生大事。那时，侯波虽然年龄不大，却很有主见。

令侯波心动的是一个关于徐肖冰的故事。在百团大战的一次战斗中，徐肖冰手持相机，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一次又一次地冲到阵地最前沿拍摄八路军冲锋杀敌的身影，全然不顾个人生死。突然，一阵密集的炮火从天而降，徐肖冰和冲在第一线的战士倒在炮火中，不见了踪影。敌



1940年，徐肖冰被震晕苏醒后拍下的照片。徐肖冰 摄

人被打退后，战士们在打扫战场时，看到一个新隆起的土堆在颤动，几个战士马上上前挖掘，想不到一个人从里面突然蹿起来——原来是徐肖冰，刚才被巨大的冲击波震昏过去了，醒来后他以为战斗还在进行，怀抱相机对着战士们又要进行拍摄……一颗少女的心被他舍生忘死的工作精神深深打动了。

1942年2月，侯波嫁给了徐肖冰。组织上给他们找了一间几平米的窑洞，战友们找来一张单人木板床支起来，又在床边支上一块木板，勉强为他们搭了个双人床。两人把各自的铺盖和生活用品搬到一起，老乡们送来的一篮延安小枣，两人的同事、战友过来庆祝热闹一番，就算是举办婚礼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徐肖冰辗转各个战场，拍摄那些在硝烟中前行的士兵将勇，拍摄那些声名显赫的领袖。早期的中共领袖人物不曾专门配备摄影师，徐肖冰当年也没有想到自己早期拍摄的一些照片日后会成为经典。



1949年9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颐和园。徐肖冰 摄

徐肖冰是个一心扑在摄影事业上的人，即使是回到家中，也总是在



1940年，延安哨兵。徐肖冰 摄

埋头研究他的摄影。侯波对丈夫的这股痴迷劲非但不反感，反而在耳濡目染中，渐渐也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两人成为中国摄影界著名的“红色摄影伉俪”。

为了民族解放与独立，无数仁人志士殚精竭虑，付出了自己的智慧与血汗，甚至是生命。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中，徐肖冰这位曾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朝鲜政府二级国旗勋章、文化部优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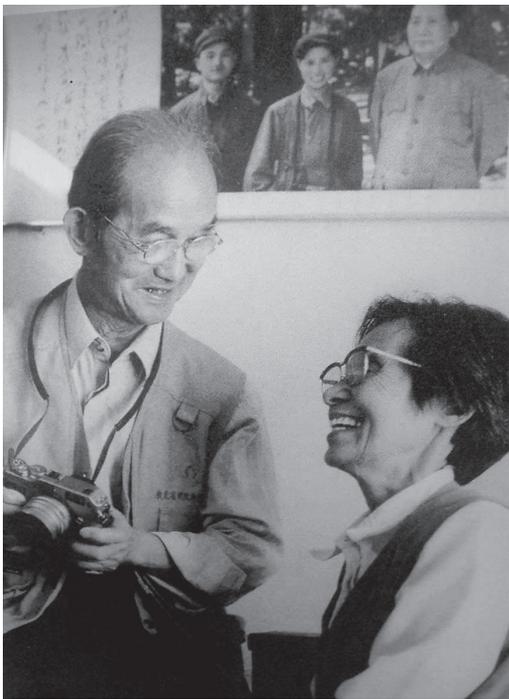
1943年，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三旅的骑兵团在沙漠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徐肖冰 摄



1949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等在北平火车站迎候宋庆龄。徐肖冰 摄

影片一等奖的老人，用手中的镜头凝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个令人难忘的瞬间。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历史长河也不可能倒流，感谢摄影家用一张张鲜活的照片，串起昨天与今天，让人们感受到和平是如此美好。

2005年，徐肖冰被人事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2006年获“摄影大师”称号；2007年获“造型艺术成就奖”；2009年获“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徐肖冰和侯波都是知恩图报的人，他们把自己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国家和人民的培养。离休之后，他们将一生创作的珍贵电影作品、摄影作品以及收藏品2700多件捐献给了徐肖冰的故乡，由当地政府建造了全国首家以摄影家名字命名的摄影艺术馆。



红色摄影伉俪徐肖冰与侯波。

对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益活动，徐肖冰和侯波更是乐此不疲，只要身体允许，他们总会积极参加。2008年5月12日，我国汶川等地发生强烈地震时，徐肖冰正因病住在北京中医医院的病房里，他不顾病体，和228名摄影家一起发出“紧急行动，抗震救灾”的倡议，在全国摄影人中引起强烈反响。5月17日下午，他和夫人侯波通过中国摄影家协会向地震灾区捐赠善款2万元。这是中

国摄影家协会开通专用账号后收到的第一份个人捐款。徐肖冰幽默地说：“如果我年轻5岁，还会上一线去拍照片的。”

晚年的徐肖冰、侯波总是相依相伴，

形影不离。对此，徐肖冰曾感慨地说：“年轻的时候，都在忙事业，现在老了，才体会到两人是个伴儿，彼此生活上照应，情感上沟通，谁也离不开谁。”徐肖冰和侯波的晚年生活是平静而有规律的，每天就是读书、看报、看电视，每当有客人来访，他们中的一位同客人谈话的时候，另一位总是很仔细地倾听着，有时也会插话，说一说自己知道的情况或是自己的观点。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召开期间，无论是开闭幕式还是体育比赛，这对老夫妇都要坐在电视机前兴致勃勃地观看。徐肖冰为之振奋，同时又陷入沉思。“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体育事业，在延安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然经常举办各种体育活动。”徐肖冰回忆起延安时期的群众体育生活时感慨万千，“那时候太艰苦了，哪里有什么体育设施，篮球专门从西安运过来，篮球架是自己做的，全都是最简陋的。可就是这样的条件，



1943年，延安女大的排球队在比赛。发球的是胡明（后来成为薄一波的夫人）。徐肖冰 摄

我们的一二〇师仍培养出了一支赫赫有名的‘战斗篮球队’。与现在的条件相比，那可是天壤之别啊，但这种喜爱和平、奋发向上的体育精神却是永恒的。”

“1942年，延安召开了‘九一’运动会，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一次大型运动会，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半个月。”徐肖冰兴致勃勃地指着一张张老照片回忆，“看人群黑压压地坐满了整整半面山坡，当地的老百姓都赶过来了，比过节还热闹。没有体育场，跑步比赛就在延安的飞机场跑道上进行；没有游泳池，游泳比赛就在延河上搭块木板当小跳台；尽管条件简陋，可是运动员们全力以赴，拉拉队热情呐喊，大家都为体育精神而欢呼。现在中国已繁荣昌盛，奥运会让中国人民和全人类都看到了中国的富强和乐观向上的体育精神。我感到十分自豪。”

谈及战争时代的运动会，徐肖冰笑言那是运动练兵两不误：“延安时期的体育运动很大一部分是体育和军事相结合的。马术、刺杀、投弹、爬山，这些战争必备的技术都在当时的体育运动中体现出来，那时一个很重要的比赛就是比马匹卧倒时间，战时马匹需要埋伏隐蔽，所以，我们把马匹卧倒时间长短也当做体育比赛的内容，这也是由延安时期体育生活的历史特殊性决定的。”

追忆历史，感叹今朝。徐肖冰感言：“因为历史原因，延安时期着重推广和普及军事体育项目，但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传递和平的纽带，奥运圣火的传递也是人类追求体育精神的延伸。”

2009年10月27日，徐肖冰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平静去逝，享年93岁。笔者注意到，徐肖冰去世前后，社会在以各种方式纪念“航天之父”钱学森与我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贝时璋及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这三位大家。相比较以上三位泰斗级人物，“徐肖冰”的名字似乎令很多人感到陌

生，不然，为什么当时很少有媒体报道这位在同一时间离世的摄影界大师级人物？当时，笔者还注意到，有一位因《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而唱红的歌手跳楼自杀的消息也曾传得沸沸扬扬。

淡泊一生的徐肖冰老人，不会计较后人的无知。生前，徐肖冰执意将公证处的同志找到家里，庄严立下了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的遗嘱。他曾多次说，我们国家富裕了，但依然有很多困难，不要为我花人民的钱。如此淡泊的老人平淡地走了，无声无息，他的离去或许真的没有必要更多地关注与打扰……



摄影大师徐肖冰。

## 第三章

# 红色岁月的红色记忆

在非常岁月，他一次次跟随毛泽东南巡。

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他见证了主席专列一次次改变行程的内情。

一代伟人的临终时刻及其遗体的转移，他或目睹、或亲历。

他就是让毛泽东只要十多天不见就要亲自过问的红色警卫队长陈长江。

“毛主席每次外出巡视，我都随同前往。每次随行的警卫人员，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外出的时间、路线及到达地点等有关情况，制定出周密细致的方案和计划。”陈长江说，每次他都精心安排警卫人员带多少、需要准备多少物资和装备，警卫部队按什么样的顺序编成怎样的队形，如何组织中途停留、驻地布置的兵力。“这些工作，有的非我参与不可，有的就由我布置安排、督促检查、组织落实。我每次总是全力以赴，不敢有任何懈怠。”

1950年，陈长江被选调入北京中央警卫师，次年开始进入中南海直接做毛泽东主席的警卫，是建国后在毛泽东身边时间最长的警卫队长。此外，他还负责为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做过警卫。陈长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6年，但是他却说为毛主席做了27年警卫，为什么？

接受专访时，陈长江边翻阅家藏的老照片，边说感谢一些摄影师当年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留下了历史的真实印记。

## 一 坐闷罐列车到古都北京

1950年10月，陈长江所在部队得到消息，上级将从苏北军区挑选五六个人到北京警卫部队。挑选的条件十分严格，一共12项标准，陈长江在晚年还记得其中有这么几条：一是苦大仇深；二是历史清楚，社会关系不复杂，忠于革命，积极要求上进；三是打过仗，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四是能吃苦、不怕死，服从命令听指挥；五是在党内担任党小组或支部委员以上的职务，等等。按照这些条件，部队进行了严格的挑选，陈长江有幸被选上了。

10月底，被选上的6个人来到素有“竹西佳处，淮左名都”之称的苏北军区所在地扬州集中。这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对于陈长江无疑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令他目不暇接的古遗址似乎在静静地诉说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与文化。3天后，他们又被送到南京军区集训。当时，从苏北军区和山东军区各挑选了一个连，从野战军挑选了两个连，组成了华东营。他们在南京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

这是陈长江第一次接受比较正式的学习锻炼，集训留给陈长江最深的印象是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结合得非常紧，期间有军区首长讲话、部队领

导发言、专家授课；没有客套话，该讲啥讲啥，有啥说啥，直击要害；军事训练扎实，学习了使用冷兵器进行格斗和演练。直身前进、屈身前进、跃进、匍匐前进、滚进……每一个军事动作要领都是在无数次血与泪的考验中总结出来的，在特殊情况下是最为实用的。陈长江深深认识到这些，训练起来格外认真，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军事本领。

12月中旬，集训结束后，他们乘坐北上的闷罐列车来到古都北京。

就在这年6月底，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唆使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且不顾中国人民的一再警告，把战火引向中国边境，轰炸我国安东（今辽宁丹东）等地。10月8日，毛泽东签署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至此，党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请求以及中国人民的意志，正式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组建，各部队相继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侵略者。

坐在闷罐车里的陈长江和战友以为要到安东，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十分激动。出发前，上级要求不让回家探亲，组织上让各位战士和亲人在泰州见了一面。当时，陈长江与父亲见面时还说，自己可能到朝鲜前线去打美国鬼子。父亲很是不放心，陈长江安慰父亲说：“没什么，到哪里都一样，当兵嘛，人到哪里，哪里就是家，您与妈妈在家保重身体，我在外面就难以关照到您二位了，不用为我牵挂，毕竟我也是快20岁的人了。”

一下火车，只见大雪纷飞，寒风劲吹，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大雪漫天飞舞，落在陈长江身上的雪花随即弹落在地上，瞬间便

融入美丽洁白的世界。伫立在雪中，随风飘舞的雪花轻抚着岁月的脸，陈长江感到自己的心灵在净化。透过洁白的雪花，陈长江似乎感到姹紫嫣红的春天正在悄悄地走来，于是心中多了一份希望、几许期盼。

随后，一问才知这里不是安东，而是首都北京。一听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所在地，陈长江和战友们同样激动，毕竟这里曾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服役之地。

很快，他们被接到北京西郊“新北京”（现万寿路）——中央警卫师三团驻地，并被编入中央警卫师三团十二连当警卫战士。全师官兵在左臂佩戴“公安、军徽”盾形臂章，执勤时佩戴“执勤”臂箍（套在臂章下方或臂章外面）。

换上警卫师的制服，陈长江看到上面的胸章，显得有些激动。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标志，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他们面对军旗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央警卫师，成为一名光荣的警卫战士。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我都将保持冷静，挺身而出，灵活处置。如果需要，我将为国献身！”

中央警卫师隶属于公安部队建制领导。很快，陈长江了解到：中央警卫师的前身是1928年5月在井冈山组建的工农红军第四军特务连。1930年8月改称总前委特务连，10月扩编为特务队，12月改称特务大队。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2月改称国家政治保卫大队，隶属国家政治保卫处（后改为政治保卫局）领导。1934年7月，扩编为政治保卫团。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贵州遵义，缩编为政治保卫大队。12月中旬，长征到陕北后改称总前委特务营。1936年5月，特务营改编为独立特务团一营。1937年4月，改编为中央军委警卫营，隶属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担负保卫中央、中央军委、主席等任务。1942年10月，中央军委警卫营与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备团（对



早年的陈长江。

外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隶属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中央社会部领导。1947年3月，中央警备团分三路保卫中央领导与机关安全转移。1948年四五月间，中央警备团在河北平山县整编，刘辉山任团长、张廷桢任政委。1949年2月，中央警备团第三、四营的7个连进入北平，暂改称北平市公安总队，担负接收、警卫、训俘、肃特和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3月，中央警备团护送中央领导自西柏坡迁移至北平。6月，以北平市公安总队名称执行

任务的部队归建。9月，以中央警备团为基础，扩编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1950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改编为警卫师。

作为警卫部队，不仅要负责首长的警卫工作，同时还是指挥官直属的作战单位。战时如果有需要，警卫部队会投入战斗。在这期间，陈长江深深认识到警卫工作既是安全工作，也是政治工作，对自己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在军事学习与军事训练中更为刻苦、勤奋，在负重越野跑、挂勾梯穿越高墙、搏击擒拿等系列训练中勇于攻关。

1951年1月，上级从陈长江他们这批人中挑选了七八个人调到警卫师一团一营（也叫内卫营），进入中南海担负党中央书记处警卫的任务。在这七八个人中，又挑了三个人到一连，陈长江被编入一连二排五班。陈长江回忆说：“一连直接为毛主席担任警卫，二连管刘少奇、朱德，三连管周总理。”

团领导在调陈长江和另外两个战士到一连时，告诉他们：“一连的任务很明确，就是直接保卫毛主席驻地和外出的安全。”听首长这么一讲，陈长江内心又紧张又激动，暗下决心，一定要尽职尽责站好岗、放好哨、值好勤，完成好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任务。

当时，警卫师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吃的是窝窝头，或是带沙子的小米，一个班住在一个通铺上。任务也重，三个人一个哨。一天一人八九个小时。”陈长江回忆说，当年有的人吃不了这苦，也想不通在北京还吃这苦，于是中途离开，或要求调回。“为什么我能吃苦？我出身农民，打过长工，解放了有报恩的心理，从小就对毛主席、共产党感恩。再苦，也苦不过我小时候的生活，当兵的那些年，我从没有叫过一声苦。”

## 二 值勤在丰泽园后门

在北京的西单到天安门城楼之间，沿着长安街的路北，有堵数百米长、6米多高的红墙，在一排绿树和大红灯笼的映衬下，红墙愈发显得具有历史的厚重感。红墙内就是著名的中南海，即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办公地点，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

中南海这片始建于辽宋时代、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宫廷建筑群，见证过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政协一届全体会议，见证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确立，见证过《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见证过五星红旗的诞生。从那以后，从中南海传出的声音，整个中国都在倾听，整个世界都在关注。

中南海的南门是新华门，从此门进入中南海，隔水相望，首先看到的是丰泽园大门。丰泽园在瀛台之北，康熙年间建造，曾为养蚕之处。雍正年间，皇帝在举行亲耕礼之前在此演礼。丰泽园内主体建筑为惇叙殿，光绪年间改名为颐年殿，民国时改名颐年堂，袁世凯曾在此办公。1949年后改为会议场所。颐年堂东为菊香书屋，为毛泽东居住和办公的地方，门框两侧有楹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静香”。走近菊香书屋所在的院子，向北便可看到5间正房，中间的一间有过厅，大门上有一

块横着的木质匾额“紫云轩”。进入紫云轩，东侧的两间北房通间便是毛泽东的起居室了，西侧的两间有墙相隔，近过厅的一间曾是江青的卧室（她更多的时间住在本院的南房里），西侧的里间与西厢房的两间相通，是毛泽东的藏书室。东厢房靠北侧的两间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南院的东房则是毛泽东的孩子或亲友的孩子或亲友的宿舍。丰泽园西有荷风蕙露亭、崇雅殿、静憩轩、怀远斋和纯一斋，荷风蕙露亭北为静谷，为一座幽静的小园林。静谷再北为春耦斋，民国时为总统办公处，1949年后改为会议及娱乐场所。

由于菊香书屋院内的柏树阴影，加上古式建筑瓦房的飞椽，使得毛泽东的寝室和办公室内射进去的阳光很少，光线很差。一到秋末、冬、春季节，即使在白天，也需要借助灯光照明。毛泽东要外出开会或接待外宾，都必须步行到丰泽园的门外，或走出紫云轩东侧夹道北头的便门，才能上车，这给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因此负责行政管理的人曾想将这套古老的房屋加以改建，或进行重新修建，但都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他再三表示不要修建，也不同意搬家。

在毛泽东的床头系着一个电铃的按钮，通过电线一直延伸到卫士的值班室。毛泽东常按动它，告诉值班的卫士自己醒了、新的工作日开始了，或者有什么吩咐、给卫士下达指示、给身边工作人员交代任务等。在紧靠床头的西侧放着一张小床头桌。桌上有一盏台灯，戴着一顶大灯罩，以避免灯光直接刺激眼睛。在台灯的东侧，放着一个茶色的玻璃烟灰缸，烟灰缸旁一般放着一盒火柴和打开封口的一盒香烟。宿舍和办公室之间没有走廊相通，不管是刮风、下雨或下雪，毛泽东去办公室时，都得穿过露天的院落。当年，“一组”既指丰泽园这所院落，也指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基层人员。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卫士，可以

用“影子”来比喻。毛泽东走到哪里便跟到哪里，国家的任何级别的会议，甚至是政治局会议也离不开卫士。即便在中南海散步或走出丰泽园，也有卫士或医护人员陪同。为此，毛泽东曾感到不自由，多次表示过：“我是国家主席，你们是革命战士，如果说不同的，我也能说几条：第一，我不如你们自由、随便……”也曾发牢骚说：“我都成了笼子里的老虎了，扫墓的自由也没有。不能随便外出，不能随便看戏，不能随便干我想干的事情，整天是这个警卫、那个警卫，我干什么非得你们那么多人同意？”

中南海大院内，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室和居住的地方离得很近，来往方便，其他工作人员也穿插其间居住。从丰泽园的门前经过，向东走百十米便是勤政殿。这勤政殿的外观是清代建筑样式，宽而高的红漆大门向南开着，直对着瀛台，门前有较宽敞的地方，可作为停车场用。从勤政殿再往东是政事堂，当时警卫处住在那里。过了政事堂再往东，一南一北有两座小石桥，桥下南海与中海相通。经过南侧的桥东去便是“流水音”和“东八所”，后者是中央办公厅所属的行政处和警卫处的一些科室驻地。经过北侧的桥向东北方向的马路走去，便可出中南海的东门，即西苑门了。勤政殿大门直对着瀛台的道路上有一座石桥，晚清时中间是吊桥，桥的北头两侧有厢房，瀛台便形成了四面环水的小岛。

当年，陈长江他们值勤主要在丰泽园后门，3个人1个岗，1班站2个小时，1昼夜值4次班，警卫任务很繁重。平时，毛泽东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建国之初，百事待举，加上抗美援朝，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日理万机，有时忙起来几十个小时都不休息。稍有空闲或临睡前，毛泽东总是习惯到丰泽园前后门去散散步。

1952年4月，春光明媚，芳草凄凄，鸟语花香。一天上午10点左右，毛泽东在工作了一个通宵之后出来散步。这时，陈长江正在丰泽园后门

站岗，看到主席走过来，他立刻敬了个礼。毛泽东见到他，主动上前微笑与他打招呼：“你是哪里人？”

“我是江……”陈长江刚出口，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就立刻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下去，说：“听口音，你是苏北如皋、海安一带的人？”

陈长江马上回答：“不错，主席，我是江苏海安人。”毛泽东笑了笑，说：“你们那地方，是革命老区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打仗很多。抗日战争时期，那里曾经是苏北抗战的指挥中心，陈老总打顽固派的黄桥战斗打得很好，有打，有拉，搞统一战线，搞得很好。黄桥烧饼很出名哟。解放战争刚开始时，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消灭敌人5万多，有两战就是在海安地区打的，挫败了敌人的进攻。”

说到这里，毛泽东稍微停顿了一下，又问起陈长江和他家的情况。接受采访时，陈长江幸福地回忆道：“当时，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陈长江，他说‘你这个名字，中国的第一大江，你说了以后我就能经常记住了’。在最后20多年当中，一直到主席去世，如果有那么10多天看不到我，毛主席就会问‘长江，他到哪儿去了？’他喊我就是‘长江’两个字。”

海安位于南通、盐城、泰州交界处，东临黄海，南望长江，靠江靠海靠上海，是苏中水陆交通要道，在汉代就有“三十六盐场咽喉，数十州县要道”之称，也是学界确认的江海文明起源地。尽管这里气候宜人、雨水充沛、河道成网、物产丰富，是著名的丝绸之乡、河豚之乡、纺织之乡、紫菜之乡，但是由于天灾和战乱，海安百姓当年过着贫苦的生活。

1931年9月12日（农历八月初一），陈长江出生在江苏省海安县章郭乡东闸沟村，乳名为“碗头”是父母寄予他长大成人能混一口饭吃。他出生一个星期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是日本帝国主

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从此，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埋下了导火索。“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海安百姓与全国人民一样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积极配合全国抗战。

同年，持续1个月左右的大面积梅雨加暴雨，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一时间，海安一片汪洋，田禾尽没，百姓死伤不计其数，四处是逃荒者，饿死者也随处可见，惨不忍睹。这年9月1日，江苏水灾义赈会在《申报》第3版载《万急启事》中称：“滔天大祸，从古罕闻”，呼吁“火速救命”。

陈长江兄弟姐妹7个，他是老大，后面有5个弟弟和1个妹妹，其中男孩的名字都与水有关：长湖、长河、长海、长淦、长汉。因为家里一贫如洗，陈长江没有正式上过一天学，只上过两三个月的私塾，自11岁起就给地主做长工，下地干活、给地主养猪或推磨压碾。他住在地主家里，起早贪黑，吃的是猪狗食，睡在牛棚里，牛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在这艰难的岁月里，陈长江随家人经常搬家，四处流浪，长时间没有相对固定的住所。直至1942年底，全家搬至邓庄乡邓舍村（现南莫镇邓舍村）。陈长江总算没有被饿死、累死，先后在3个地主家苦熬硬撑了4个年头，小小年纪就品味到了世间的酸甜苦辣。

1945年8月，不屈不挠的海安人民与全国人民一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国民党当局又忙着为内战作准备。此时，南通城成为南通地区国民党的军事政治中心和制造内战的大本营，阴云笼罩南通地区的上空。饱受兵燹之祸的海安人民，渴望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

1946年8月，陈长江参加新四军，到海安县独立团特务连担任侦察员，

后在独立团直属情报站担任情报员。陈长江在晚年接受专访时回忆说：

“那个时候，我的家乡还没有完全解放，城镇被国民党占领，农村是新四军、游击队活动的区域。新四军是为人民打天下的，老百姓长年受富农、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我认为当兵才是出路，于是和同村的另一个小伙伴报名入伍。我的个子矮，比较适合搞情报工作，于是被分配到情报站，主要工作就是收集情报、传递情报。当年，从东台到青龙，有30多公里是国民党经常活动的区域，我们情报人员事先摸清有关敌人的人数、武器、攻势等情报，海安独立团几分钟就能解决战斗。类似的仗，我们打了几十次。”

当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逐渐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1947年，陈长江家像广大贫苦农民一样得到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取得了几千年来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伟大成果。一时间，当地出现了“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前方打仗，后方分田”、“白天打仗，夜晚分田”的壮观场面。陈家分到了14亩土地、3间青砖小瓦房和半条“水牛”，陈长江从得到的切身利益中深切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穷人谋利的；而穷人要翻身，要保护胜利果实，只有跟着共产党走。

1948年底，陈长江返回独立团特务连继续当侦察员。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全面发展，国民党反动派眼看败局已定，但他们仍不甘灭亡，企图作最后的挣扎，计划将江北沿江地带建成其退守防线。南通之敌实施所谓“总体战”的方针，妄图重占沿江、通吕、丁掘、李木并四线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此时，我人民军队越战越强，已可将兵力高度集中，分区进行团以上部队的大规模作战。在3年解放战争期间，陈长江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作战勇敢。由于表现突出，他于1949年3月光荣入党。

1949年4月21日参加渡江战役之后，陈长江又回到泰州军分区司令部特务连担任警卫员，是连队唯一的战士出身的支部委员。

这年10月1日，全国军民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第二天上午，陈长江在泰州军分区特务连与当地群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同年冬，陈长江参加长江大堤泰州南段的修筑。1950年二三月，陈长江参加大生产，带领七八个人开垦荒地，因为成绩突出而被评为泰州军分区劳动模范，同年7月出席了苏北军区劳动英模大会。当年底，被选调到北京任中央警卫师战士。

当时，毛泽东接着又详细地问起陈长江家的情况。陈长江对毛泽东说：“解放前，家里房没一间、地没一垄，祖祖辈辈靠种地交租来维持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困苦生活，遇到灾荒年就更没法生活了。我从11岁起就给地主做长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受尽了苦。我们那个地区不仅是我们一家，不少人都这样子。”

毛泽东问：“现在怎么样？”陈长江高兴地说：“我们家自1947年土改后，分到了14亩地，3间瓦房，还有牲口、农具等，我们现在生活比较好了，我弟弟妹妹都上学了。”毛泽东听了很满意，并说：“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又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

长期关注朝鲜战争的陈长江知道，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决策的大事之一——他要对世界大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地了解，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

志愿军入朝后，乘夜色沿着崎岖的山路行进，前面看不见队伍的头，后面看不见队伍的尾。很少人知晓在这长长的队伍中有毛泽东的长子、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入朝的毛岸英。毛岸英时年28岁，曾在苏联参加过卫

国战争，1946年回国后在延安当过农民，建国后担任北京机器总厂党委副书记。毛岸英有无数条理由不用去朝鲜战场，可他偏偏选择了血与火。毛岸英得知要派志愿军出国的消息后，跟彭德怀提出了要求。彭德怀不敢答应，要等毛泽东表态。毛泽东支持儿子的选择，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就这样，毛岸英成为彭德怀被任命为司令员后的第一个志愿军战士。

毛岸英到朝鲜仅一个月就在美机轰炸中壮烈牺牲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怕对毛泽东打击太大，过了一个多月后才向主席报告。毛泽东听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平静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为了反对侵略、为了世界和平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牺牲了许多优秀的战士，岸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是党的主席的儿子，但他首先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战士。”

美国政府由于军事失败和国内国际压力，不得不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同朝中方面在开城进行停战谈判。陈长江十分佩服毛泽东当初决策出兵朝鲜那非凡的胆略和卓越的洞察力，同时深为毛岸英的牺牲感到惋惜。陈长江说：“主席，朝鲜战争您亲自送岸英到朝鲜前线打美国鬼子，他的事迹很感人。您怎么舍得把儿子送到前线去？”毛泽东听后沉闷了一会儿，说：“如果我不带头，那怎么号召广大农民、广大工人去抗美援朝，我当主席的一定要起表率作用！为抗美援朝我们牺牲了很多英雄儿女，不只是岸英一个。”

“我们一定要打败美国侵略者，为牺牲的烈士们报仇！”陈长江说。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是呀，要提高警惕，防止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势力，把我们国家建设好。”

时间不知不觉过了近20分钟，陈长江由开始时的拘谨变得很自然了。

毛泽东笑着对他说：“我该回去休息了。你是哨兵，也是在为人民服务。”说完，摆摆手转身往回走。望着主席离去的身影，陈长江内心充满了无比的幸福。在晚年，陈长江每每回忆起这一切，还是激动不已。

## 三 和警卫一中队“拉家常”

1953年6月15日，中央警卫师一团（前身是延安中央警备团）开始整编，分别调出一、二营部分人员，同时又往一、二营调一部分新战士进去。此前，一、二营营长分别就所在营的干部及战士情况向中央警卫师保卫科长史宏斌作了汇报，整编进行时没有做动员，迅速到指定地点作了调整，随后出城进行军事训练。

中央警卫师一团一营主要是负责中共常委和其他10位中央首长在中海的警卫和外出时的随身警卫工作，每年的“五一”、“十一”负责天安门城楼、天安门至中南海东门的整个路线以及端门楼、午门楼上的警卫工作。当时，有400多人，担任着84个哨位的任务。经过整编后，一营调出了不少战士，也补充不少，陈长江依旧在一营一连。

在中央警卫师一团的基础上调整充实组成新的中共中央警卫团，番号全称是“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警卫团”。中央警卫团的建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按编制序列，总参谋部下达给中央警卫团的代号为“总字〇〇一”。通过整编，中央警卫机构的编制结构更为合理，人员也更加充实。中央警卫团名义上是警卫团，实际上是按师的架子配备，设

有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处下设有科。

6月19日上午，经过整编后的中央警卫团正式成立。排以上干部集中在春藕斋开会，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和张耀祠、罗道让、王敬先等副局长到会讲话。张耀祠为团长、杨德中为政委，张耀祠宣布了各部、处、科、连的负责人。张耀祠要求，各级干部在下午3时到职到位。“大家不能分彼此，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因此，要搞好团结，发挥党、团员的带头作用。新老同志要互相交流经验，要很快熟悉中南海的各项规章和制度，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汪东兴在讲话中指出，这次警卫团的整编工作做得很细致，各级干部都很负责，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基本做到了走者愉快、留者满意。“今后要抓紧工作，熟悉警卫业务，力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绝对安全。经过整编后，这支队伍素质会有很大变化，短小精干，指挥灵便，我想你们会胜任的。中央领导很关心这支队伍的成立，我们大家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同做好工作，不要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的期望。”

1953年6月22日下午，中央警卫团全团军人大会在中南海东八所召开。陈长江在晚年还记得，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等分别讲了话，对保卫好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作了重要指示，强调中央警卫团担负的任务是艰巨的，责任是重大的，也是光荣的。并指出中央警卫团的任务有所增加：人民大会堂、天安门、钓鱼台国宾馆、毛家湾、北戴河和中央领导同志及外宾行车路线的安全，都由中央警卫团负责。警卫工作在城市环境中，主要以公开的武装形式同隐蔽的阶级敌人作斗争，特别要防范两种敌人：一是职业特务，他们专门搞暗害活动，收集情报；利用金钱美女，引诱和收买我党内部立场



1954年9月28日《长江日报》刊发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消息。

不坚定的分子为他们服务。二是亡命之徒，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怀有极大不满，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高级领导干部有刻骨仇恨；还有敌对分子，他们对现实社会某事件怀有极大不满而进行发泄报复。

部队组建不久，几次轮训就开始了。陈长江记得，在形势和任务教育中，张耀祠特别讲了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残酷性和尖锐性——无论国际的、国内的反动阶级和反革命分子都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灭亡，他们仇恨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和

高级干部，仇恨工人、农民、劳动群众翻身得解放；他们拼命挣扎，训练特务分子，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暗杀革命领袖和高级干部……轮训中，还特别调强了武装保卫工作的特点，教育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性，还要警惕和预防自然灾害，在做好人身安全保卫的同时也要注重政治保卫，维护政治影响。加强保密教育，教育每个哨兵要熟悉业务，记住首长的汽车牌号、姓名、特征及其他记号，尽力熟悉机关工作人员，便于他们出入营门。

1954年1月29日，中央警卫局又成立了干部大队，下设多个区队。警卫团副团长张宏任大队长，张随枝任参谋长。

经过一段时间后，由于中央常委和中央其他首长外出巡视、开会、调研工作的增多，中央警卫团随身警卫的任务也随之增加。干部区队走后，

哨位又不能减少。这样，就出现了一些矛盾，而且发现各连直接归团指挥，有不大适应的问题。于是，1955年3月，中央警卫团又进行了第二次编制调整，整编后的全团编为两个营、一个干部大队——张耀祠为大队长，王连龙为大队政委，孙振起为大队参谋长。大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区队，区队下设分队。此时，陈长江被编入中央警卫团一中队。

20世纪60年代末，中央警卫团的番号变为“三七四七”。1964年左右，首次使用“八三四一”这一代号。

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逝世于1976年，享年83岁。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其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前后主政41年。

“八三四一”的番号与这两个时间恰好吻合，于是有人说这是解放初毛泽东征求算命先生的意见而决定的。社会上另有一种说法：毛泽东年轻时从韶山到长沙后，参加了湘军，被编入湖南新军混成旅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下士，发了一支汉阳造的旧步枪。那支枪破旧不堪，但毛泽东仍很喜爱它，特别是看了它的编号“八三四一”后，更是爱不释手。他每天看它，擦拭它。半年后，毛泽东离开新军，交出了那支枪，但他终生没有忘记它……解放初在建立中央警卫团考虑如何取番号时，毛泽东情不自禁想起了那个“八三四一”的编号，于是决定就用那个编号作为中央警卫团的番号，暗指“党指挥枪”的意思。

陈长江接受采访时，强调这些传说都不是事实，部队的番号其实都与毛泽东没有关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每一支部队，为了简便或保密都有一个代替正式名称的代号，而作为番号的代号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对全军统一下达的，而且代号用过一个时期后是要更换的。1975年时，部队代号曾一度改为“五七〇〇一”，但不久后又改回“八三四一”。



1955年5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同中央警卫团一中队队员（三排右十四为陈长江）及中央警卫团有关负责人合影。侯波 摄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共中央警卫团又恢复中央警卫师的番号，总参下达的代号是“五七〇〇三”。1982年，又缩编为中央警卫团。2000年10月，其名称更改为“六一八八九部队”。

“这支部队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成长壮大。这些年来，这支部队誓死保卫党中央，做到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职守，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政治事故。”

1955年5月14日，风和日丽。这天上午，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接到通

知：下午3点到颐年堂院内，毛主席将接见大家。原来，最近刚从各地调来一批同志，虽然都工作在中南海，但由于哨位不同，有不少警卫人员至今还没有见过毛主席，于是特地安排毛泽东接见一中队。

一中队的同志接到通知，个个兴高采烈，都纷纷议论，高兴地说：“毛主席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工作十分繁忙，能抽时间接见我们，真是难得！”“领袖想见我们，我们更想见领袖。”……大家不知有多么激动，人在营区，心早已飞到颐年堂了。

为使每个警卫战士都能参加接见，团首长特地让机关参谋、干事接替了全部哨位。一中队全体同志像迎接隆重的节日一样，穿上了崭新的军装，个个精神抖擞，笑逐颜开。陈长江和大家一样，异常激动，期待那一刻的到来。

下午2时，大家列队来到中南海颐年堂院里，等待毛主席的接见。颐年堂里的太平花开得正浓，花色洁白如雪，并翠成朵，幽香四溢。金色的阳光洒向参天翠柏，显得格外碧绿和庄重。陈长江注意到，大队部的同志也到了，汪东兴、叶子龙和警卫团的领导也到了。一中队队长韩庆余见队伍有些乱，想把队伍整理一下，刚要下口令，汪东兴说：“不用了，让大家坐整齐就行了。主席来后，大家起立鼓掌欢迎就行了。”

不一会儿，身着灰色制服的毛泽东从颐年堂东北角的走廊里走出来，边走边招手致意。顿时，院子里的气氛活跃起来，大家起立鼓掌。掌声打破了这座古老院落的宁静。

毛泽东带着慈祥的笑容走在队列前面，询问最前一列有些队员的名字，随后回到前面的一张茶几前。茶几上放有一杯水和一只烟灰缸。前面放有一把椅子，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坐下。他拿出一支香烟，用火点着，抽了一口说：“很久没有和大家讲话了，汪东兴同志说让我给大家讲一讲，

你们要我给你们讲什么呢？”他满脸笑容地看着大家，随后说：“那好吧，就讲讲工作和学习吧！”

“我们工作是为什么目的呢？”毛泽东闪着和悦的目光，从排头向排尾扫了一遍。陈长江在第3排中间偏南边一点儿，离主席很近，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队列里立刻有人答道：“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招呼大家坐下，然后自己坐在藤椅上，就像拉家常一样讲开了。

“我们党除了为人民服务没有别的任何利益。过去打日本，再早打皇帝。”讲到这里，毛泽东停顿了一下，目光似乎在寻找什么。看着面前这些年轻的队员们，又看看那边年纪稍大的部队领导干部，然后问：“你们中间有没有打过皇帝的？一个也没有吧！”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会场活跃起来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毛泽东接着说：“我曾经是皇帝的老百姓。那时是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现在宣统皇帝在东北学习马列主义，是个战犯，吃饱了饭没事坐班房。他是3岁做皇帝，做了3年。我那时在革命军当过兵。现在国防委员会任副主席的程潜，那时在湖南当师长，我和他不在一个师。”

“毛主席也当过兵呢？”有人交头接耳地小声议论着。那是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来到湖南演讲，号召学生参军，毛泽东当即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列兵。直到1912年春，南北和谈，“统一”实现，方才退出新军，继续去求学。

“中间，毛主席讲到他在湖南当过兵，辛亥革命的时候也当过兵，只参加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并没有打什么仗就离开了。他还给我们比划了拿的那个枪，过去的枪是独子，扣一下只能响一次，还要再拉一次枪栓。他这么一说一拉，我们都哈哈大笑。他说那时候当了6个月的兵，很艰苦，

扛着枪，那种枪简单得就像套筒枪似的，不像现在你们的枪这么好。”陈长江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

“那时革命叫打皇帝，以后就打军阀。军阀很多，有袁世凯这些人。后来又出了蒋介石这个人，我们和他一起办过事的。原先我们和孙中山合作，推翻皇帝，算来有44年了，共产党有34年了。”毛泽东说：“共产党开头人很少，只有几十个人。那时志向很大，闹革命，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命。34年前，中国还没有共产党，只在几个省有几十人的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召开第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只有12人。其中有董必武同志一个，我一个，还有两名同志。其他人有的后来当了汉奸，如陈公博、周佛海，有的叛变了，有的死了。抗日战争时期，陈公博是汪精卫敌伪政权的总理。此外还有个张国焘，这个人后来表现不好，现在香港帮助帝国主义。人都不一样，各走各的路。”陈长江聚精会神地听着，真想把毛主席的话一字不漏地在本子上全记下来，可是有时手中的笔不听使唤，有些字不知怎么写，抬头望着这位党的主要创始人，心中不由升起一股崇高的敬意。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意义重大，为中国革命开创了新局面。1925年我们党员只有1000人左右，到1927年就发展到5万多党员。国共合作时，北伐军从广州打到长江。在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的时候，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开始屠杀共产党员。我们就拿起枪杆子搞武装斗争。这一打，就打了22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国共又合作了。开始我们是合作的，后来起了变化。我们一方面打日本，一方面还要同国民党斗。一方面合作，一方面斗，两只手，一手打日本，一手同蒋介石斗。”毛泽东伸出两个拳头打了个手势。

毛主席风趣地用两只手比划着，引起大家一阵笑声。他接着说道：“在

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我们壮大了军队。土地革命时，红军有 30 万。后来我们党内有人办错了事，红军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减少到 2 万多人。我们进行了艰苦的长征。长征的路不好走，等于走地球的直径到了美国。”

陈长江回忆道：“毛主席还说，长征不是从中南海走到北海，你们坐着车子转一圈这么远一点儿，长征啊，我们不情愿走，是逼出来的，没有办法，上面有敌人的飞机，前面堵，后边追，我们不到偏远地区去、没有人的地方去，我们就不能生存，所以长征是很艰苦的。他说，这个两万五千里长征走了 11 个省市，我们十几万人走到最后成了两万多人。你们不要忘掉长征是很艰苦的，我们保存力量，到了延安以后，逐渐地发展起来了，后来逐渐壮大，壮大到新四军、八路军。”

毛泽东在接见一中队时还讲道：“抗战时期，我们又发展到 90 万军队。我们过去干的革命工作，就叫反帝反封建，也叫为人民服务。现在的革命工作是革资本主义的命，革小农经济的命。过去也有总路线，过去的总路线就叫反帝反封建。反帝反封建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道路，把那些王八蛋赶走了，好走社会主义道路。过去这个地方我们不能来，来就要掉脑袋。但是，这里有我们的地下工作同志，北京的刘仁同志就是，此人就钻在地下。过去这个地方还杀过共产党员。可是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毛泽东说完后面这句话，大家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的讲话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回顾了党的历史之后，他讲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毛泽东慢慢喝了口水，放下杯子，说：“你们看过‘三国’没有？”他指的是《三国演义》。有人回答：“看过。”

“‘三国’可以看。”毛泽东说，“‘三国’孙、刘破曹操，采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也缺东风，缺什么东风呢？缺工业，缺

现代工业。有工业才有汽车、拖拉机、火车头、飞机、坦克、重机器和各种机器。现在我们只能造不大不小的工业产品，要3个五年计划之后，就差不多都能造啦。搞工业化，目的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现在搞‘三个改造’，是两个性质。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劳动人民，不是剥削者，但他们是个体，要用合作社的办法进行改造，用机器耕种；资本家是剥削者，以后就不让他们剥削啦，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工业化，一个改造，搞它15年，基本上达到目的。15年以后还要继续干。”

“你们现在多大年纪？”毛泽东一边环顾大家，一边说：“平均年龄最多22、23岁。搞10个五年计划，就是50年。孔夫子是73岁死的。这个人读了不少书，孔夫子搬家净是书嘛。”全场又是一片爽朗的笑声。

毛泽东也笑了起来。他手指队员们，幽默地说：“到50年后，也许我们就赶上美国啦！现在我们的好处就是人多，大家努力干，用1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你们都还年轻，你们还行，那时我就去‘开会’啦，马克思、恩格斯召集国际会议请我去参加啦！”

毛泽东讲话时的兴致很高，这是与当时的形势分不开的。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5年春，“一五”计划已顺利实施了两年多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农业合作化发展得也很快，全国建立了67万个合作社。毛泽东一方面对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兴奋，另一方面还是比较谨慎地预计未来的建设目标。

毛泽东向大家走近一步，声音稍微加大一些，说：“我们各人工作不同，有站哨的，有做别的工作的，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你们都是做警卫工作的，我现在想给你们加一条任务，不知同意不同意？”大家齐声响亮地回答：“同意！”

陈长江只见毛泽东扳起手指数起来：“一个是保卫工作；一个是搞好学习，学文化；再加一项任务是搞调查工作。共3项。”

毛泽东风趣地说：“光站哨，工作很单纯，和吃菜一样，不能光吃青菜，还要吃点辣椒。搞调查这项工作，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你们回老家，一方面可以探亲，一方面可以搞调查，以探亲为名做调查工作。但是可不要说：‘我是给毛主席作警卫的，是毛主席派来的。’这样做，就不可能把调查工作搞好。国务院就有这样一位同志，回家以后召开干部会，说他是总理派来的。他还没有回机关，国务院就知道了。我们拟了一个做好调查工作的章程，要求对人要谦虚，对父母、对乡村老百姓要尊重。要尊重家里面的人，尊重老百姓，尊重区乡干部，别摆架子。我给你们摆架子，你们会不高兴；团长给你们摆架子，你们也不高兴。态度谦虚，乡亲们就敢向你讲真话，就可能调查出东西来。我的学问不高，也要向群众学习。”

毛泽东又取出一支香烟，点上火，吸了一口，接着说：“调查什么？要设法了解生产情况，包括生产的粮食、农副产品，如花生、芝麻、烟叶等等。要了解小米、大麦等生产情况怎么样，群众口粮够不够吃。现在叫缺粮的地方不少，有真的，也有假的。粮食部有5个干部下去了解，连老婆都骗丈夫。家里存着2000斤粮食，还说没有粮食吃。赵虎城的姐夫向他诉苦，也说没有粮食。他在他家住了两天后，发现有粮食。他问：为什么叫穷呢？姐夫回答说，第一叫穷可以不露富；第二明年可以少卖粮；第三人家都叫，我不叫也不好，怕受孤立。所以，不能相信那些叫苦的都是没有粮食吃，顶多有百分之十是真叫的。去年购粮，是政府向他们‘进攻’，现在他们在家向政府‘进攻’。”

两个“进攻”是毛泽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打的比方，说的是统购

粮食和农民瞒粮这两件事。新中国成立以后，粮食供需矛盾就比较突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1953年起党中央决定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农民接受统购统销，尽管比起自由购销要困难些，但它毕竟起到了稳定人心、稳定全局的重要作用，确实是“粮食定，天下定”。当然，在实行统购统销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强迫命令和买“过头粮”等现象。特别是1954年一些地区遭遇水灾造成减产，但全国范围内反倒多购了23亿斤粮食，引起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不满，以至不少农民隐瞒产量不报。毛泽东在讲话中一方面讲清统购统销的好处，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缺粮的国家仍需要实行统购统销；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要对农民瞒粮大惊小怪，还肯定存粮于民是件好事。

毛泽东掰着手指说，统购统销有5项好处：第一，对贫农有利。贫农是缺粮的，粮食不涨价，有粮食救济和供应，才能保证他们不被饿死。第二，对灾民有利。去年水灾，全国有5000万灾民，重灾占六分之一，其中有4000万人缺粮食。不统购统销的话就要饿死百十万人。老百姓说：去年是百年不遇的洪水，五百年不遇的好政府。我看五万年也没有这样的好政府。第三，对发展经济作物有利。种棉花、甘蔗、烟叶的地区，可以保证买到粮食。第四，对城市人口有利。我们有8000万城市人口，有产业工人、手工业者、政府工作人员和军队，还有资本家。过去要吃饭，现在也要吃饭，现在吃饭是吃统一供应的粮食，这比粮食私有好，能保证城市工业化的实现。第五，对外贸有利，粮食出口，买机器。比如，我们可以多拿些豆子出卖。如果没有统购统销，国家掌握粮食就少一些，统购统销，我们就能多出口一点粮食。当然也不能出口太多。我们是一个缺粮的国家，宣传粮食出口这一条不要讲得太多。出口主要是大豆，不出口也就吃掉啦，吃豆腐、豆芽菜等。卖点给苏联，我们可以买回机器，

这对发展生产有好处。出口的粮食不会很多，国家收购的 900 亿斤粮食中只 30 亿斤出口，而且主要是豆子。现在全国总共收购 870 亿斤粮食，而不是 900 亿斤。今年希望增加收购 30 亿斤。就是 870 亿斤也可以。按 800 亿斤分配，城市 450 亿，农村 350 亿。乡村供应，第一是缺粮户；第二是 4000 万灾民的困难户；第三是经济作物地区；第四是“四民”，即盐、渔、林、牧民。

“渔民这个词懂不懂，你们会打鱼吗？鱼可好吃呢，长江、沿海鱼才多呢！牧民是养牲口的。为什么要供应他们 350 亿斤粮食呢？因为他们不是主要搞粮食的，而是搞农副产品的。灾民也不都是一年四季缺粮，顶多缺 6 个月。缺粮户也不是一年到头都缺粮，顶多缺 4 个月。现在有的地方粮食销多啦！还大喊大叫，不给卖就要打人。有些干部吓坏了，就发粮票。要注意是真叫还是假叫。河北省内丘县有个老百姓说：‘真不真三百三，够不够三百六。’有些地方只要 280 斤粮食就够了，有的只要 220 斤粮食，加上吃些番薯、薯叶填补。叫三百三、三百六的过得去，南方 500 斤稻子口粮也够啦。老百姓知道就行。瞒是有的啊！实行‘三定’政策（即定产、订购、定销）就好啦，不这样做，我这个主席也没法多弄出粮食来。‘三定’实行后，多吃、多喂、多卖、多存都有自由，心里面舒服，变非法为合法。现在有些人装穷、存点粮，我对他们那些发现存粮的同志说，你们抓住了不要骂，心里高兴，但不要提倡，也不要说毛主席讲的存粮好。但是也要看到，有的地方口粮确实不够，卖了过头粮，牲口不够吃。有的把母猪杀了，把牛杀了的也有，逃荒的也有。不过老牛不杀不行，老牛杀了可吃肉，又可买小牛，还可以投资农业。河南省出牛，去年杀了 60 万头，但是还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陈长江快速地记下了毛泽东的讲话。

关于调查研究，毛泽东讲了很长一段话，最后还是归结到警卫战士的责任。他说：“我们这些代表6亿人民在这里工作的同志，来自乡村、城市，东西南北方的都有。当6亿人民的代表非常光荣，不要轻视自己。你们工作态度要好，要团结，要互相关照，不要打架，即使打了架也不要打出了血，打掉了牙。”

一片欢笑打断了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也跟大家一同笑起来，陈长江看毛主席笑得那样开心、和大家那样融洽。

毛泽东还没有收住笑容，又讲开来：“为什么要团结呢？为了实现工业化，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要搞好中国的工业化。等到你们72岁做寿时，完成10个五年计划，我们可能赶过美国，那时全国都可以做寿。赶过美国是好事，目标很远大，可以达到。”

毛泽东谈笑风生，从他的早年讲到党的历史，从建设远景讲到当前形势，内容丰富，语言生动，会场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

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快一个小时，毛泽东最后说：“刚才讲了有50多分钟，讲了几十年的历史。现在我们是拥有705万党员的大党，青年团员有1000多万，解放军有三四百万，全国人口有6万万。在座的是6万万人的代表，尤其是你们青年，二十几岁，大有希望的。我们老头子也很重要，你们团长就是老头子。我打拳走路不如你们，但我也有点好处，有点经验。为了总的目标，我们分工合作。我希望你们团结互助，学习、调查，把工作做好。很对不起你们，进北京5年多啦，今天是头一次同你们讲话，为你们服务。你们为人民服务，我也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讲完后，会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毛泽东笑着从藤椅上站起来，和大家一起照相留念。随后，毛泽东连连挥手告别：“同志们！再见！”

## 四 “名誉校长”的“三同”要求

1955年，毛泽东在颐年堂讲话后不久，亲笔为警卫一中队写成“出差守则”：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

以什么身份回乡调查，毛泽东特别明确规定：不能说是毛泽东或上级领导机关派遣的，下去以后也不要通过地方党政机关和干部，只是个人回家探亲，同自己的家人、亲戚、同学、朋友，从随意聊天中了解情况。他认为这样才具有真实性。回来以后，不管是书面调查报告，或者口头汇报，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对于农民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反馈，都要全部如实地讲出来。“你们写的报告，文字好坏没关系，不要找人修改，也不必请别人代抄，我要看你们自己写的材料。”

大凡初次和毛泽东谈话的人，都不免有些拘束。毛泽东对此也有所察觉。因此，大家每次去他那里，一开场，他总是先从拉家常开始。问问你的年龄、籍贯、婚姻情况，以及各地民情风俗等等，直到人们情绪

比较放松了，才言归正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中队组织过6次调查，派出200余人次，调查了23个省的部分农村和8个城市的部分人士。所写的调查报告均直接送给毛泽东。另外，毛泽东还5次召集回乡调查的队员们到他的住处，听取口头汇报。毛泽东曾多次向在丰泽园值班的卫士们说过：你们每年轮流回家，一方面探亲，一方面帮助我了解农村的征购、合作社、农民群众的生活等情况。并说：“你们回家的路费，由我负责，你们谁回来了，要来我这里一下，谈一谈情况……”以后，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进行农村调查便成了陈长江等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差不多每年都要进行那么一两次。

为了节省时间，毛泽东还把汇报的警卫留在家里一起吃饭，边吃边谈。在汇报中，他仔细地询问每个警卫自己家里的人，能不能吃饱，还有多少余粮，家里有几个劳力，收入有多少，有没有生病受灾的，进而问到村里乡里的生产、生活等情况。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时而沉思，时而做笔记，时而插话，时而长长地叹气。

毛泽东一字一句地看警卫们写的调查报告，遇有错别字和用错了的标点符号，都一一改正过来。陈长江记得，有一次毛泽东一手拿着材料，一手拿着红笔，对警卫人员讲道：“你过来，你们都过来。你们看，这是‘报酬’的‘酬’字，这是‘仇恨’的‘仇’字。”“这是‘总’字，这是‘怎’字。”见到文字畅通、内容又比较好的报告，毛泽东就马上肯定。

毛泽东常把北京比喻为“加工厂”。他实在不甘于深居红墙内，光靠听汇报发文件左右中国大局。他曾说过：“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来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民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

还曾说过：“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不好就会犯错误。”

毛泽东从多名警卫队员的汇报中，发现他们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为完成好当前的任务，并为这些年轻人的长远考虑，急需采取切实措施提高这些同志的文化程度。毛泽东在同他们交谈时，不断提到要加强文化学习的问题。

1955年7月26日，警卫一中队队长韩庆余带领第三批队员汇报探家调查情况。韩庆余把6个队员写的材料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先看了曾文的材料，说：“写得好，写得好，你调查得很好。”毛泽东拿着材料，指点着问：“这个材料是你自己写的？”曾文说：“别人帮我抄了一下。”毛泽东把头往后一靠，笑道：“我不是看表面文章的，字再漂亮，内容空空，虚有一手好字。你们是给我提供真实情况的，通过你们进行社会调查，要学的是社会学，解决的也是社会问题。以后不要叫别人抄了，别人抄的就不新鲜了，你们自己调查的东西自己写，就给人一种很原始的感觉。”

毛泽东进而问道：“你们学不学文化？”大家回答：“一周一天。”毛泽东问：“学什么？”警卫回答：“星期六党的活动和整理卫生，其余5天除一天文化课外，军政各一半。”随即，毛泽东对张耀祠和韩庆余说：“不能让他们当一辈子兵，要多学一些文化知识，地理、历史、数学、物理和化学也要学。”

1956年9月15日，是中共八大的开幕日。警卫一中队参与了中共八大的警卫工作，陈长江注意到毛泽东在会前的近半个月内就一直很繁忙，不是讨论中共八大会议有关预备事项就是修改相关政治报告、党章等。

当天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遇到正在值勤的警卫曾文，便和他谈起一中队的文化学习。期间，毛泽东说：“以后你们就不要叫什么队了，就叫文化学校吧，你们就叫学员。我当你们的校长好吗？”曾文高兴地连声说：“好！好！”毛泽东笑了笑，说：“我当名誉校长，再请一个副校长，你们在这里学习七八年，达到高中毕业或者大学毕业程度，你说成不成？”曾文信心十足地回答说：“成！”

由于当时人民大会堂尚未筹建，作为新中国较早的重要建筑之一，于1956年竣工的全国政协礼堂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八大的主会场。当天下午，陈长江在全国政协礼堂南门口迎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开幕式。当毛泽东的汽车到达大门外停下，陈长江小跑过去，打开车门，毛泽东精神饱满地走出来，笑着问：“长江，我给你们当名誉校长，好不好？”毛泽东补充说：“早上，我给曾文说过了。”陈长江说：“这太好了！主席您工作这么忙，还时刻关心我们的学习，我们一定好好学习。”

八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召开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据陈长江回忆，出席正式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候补代表86人（另有21人未到会），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应邀列席大会。当时，公务组考虑座位不够，在一楼增加了两排可移动的桌椅，为解决270人上主席台的问题，对主席台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造。

下午2时，中共八大正式开幕。陈长江看到毛泽东站起来，向讲台走去。他屏住呼吸，清晰地听到：“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毛泽东的声音刚落，代表们全体起立，长时间热烈地鼓掌。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 11 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毛泽东的话音一落，全体起立默哀。

默哀完毕，全国政协礼堂里又传出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会场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接着在讲话中分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国内和国际条件。陈长江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就是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谈到今后任务时讲的。

毛泽东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据统计，不到 3000 字的开幕词，鼓掌次数竟达 34 次之多，其中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共有 6 次。陈长江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虽然不是代表，而是在现场担任着警卫任务，但也不由得兴奋起来。

历史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之际，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堪称中共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设计的第一个蓝图。八大闭幕后，中共中央为贯彻执行八大路线做了很大努力。遗憾的是，在“左”倾思想影响下，从 1957 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八大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被改变了。

遵照毛泽东的教导，警卫部队的党委很快为一中队制订了一个初中阶段的教育计划，送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及时批准了这个计划。位处清河的一个公安速成学校因某种原因停办，警卫一中队接收了整个学校的桌椅和全部的教学仪器。不多久，又从全军调来了 11 个教员和一个副



1958年，毛泽东在南方视察途中和陈长江于停靠在安徽蚌埠火车站的专列前合影。

校长。经过一番充分的准备工作，警卫一中队文化学校于1957年1月21日正式开学。

开学之后，毛泽东经常关心一中队警卫的学习，曾问陈长江：“你们工作累不累？你们学习进展如何？”并说：“代数一定要学好。物理、化学很多的计算都是用代数计算的，要是学不好代数，物理、化学也学不好，不要怕呀！”

据陈长江回忆，那时候，我们队员都普遍养成了学习的好习惯，经常写日记和读一些书。“有了文化，我们对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更用功了，《毛泽东选集》我们人手一册，对于有关‘矛盾论’、‘实践论’、‘为人民服务’等文章，多次反复阅读，集中讨论，我还写了不少学习心得。”

随着他们思想上、文化上不断地进步和提高，毛泽东对他们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58年7月，毛泽东参观某工业展览馆回来，问他们：“今天你们参观那些机器觉得怎么样？”一名队员回答说：“很好！可是不懂得它们的构造原理。”

毛泽东说：“是啊，一般农民出身的干部都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看你们可以办一个工厂……你们每天应该增加两小时工作，除站岗外，4小时学习、4小时当工人，你们是干部，是学生，也是工人。4年以后，成为文武双全的干部。你看怎么样？”

有人说：“很好！我们这次讨论总路线的时候，有位教员提出了个建议，要办工厂和种试验田。”

毛泽东说：“这个教员有远见，今后的干部没有一点生产知识是不行的。参加劳动好！这也是一种学习，这是劳动课。你们现在只上文化课，没有劳动课不行。”

不多久，警卫一中队抽出陈长江和高碧岑白手办起一座盐酸厂。大家利用业余时间捡废砖，在两间小平房一头的地上挖坑、砌炉子、架锅，又去土产公司买盐卤回来。忙了好几天，盐酸把他俩的衣服都烧了，手上也烧起了好些泡，好在盐酸终于烧制出来了，他们十分高兴，毛泽东曾视察过他们所办的盐酸厂，表示祝贺。

1959年9月，一中队的警卫们学完了初中课程。毕业后，大部分在部队当了指导员、参谋、干事和教员，陈长江则被派到石家庄步校深造，当年10月特地回京参加国庆10周年庆典，在新华门前观看阅兵式。1960年5月，自石家庄步校学成归来。这时，陈长江已由原来的一中队分队长提为区队长。

当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陈长江等警卫在丰泽园种过丝瓜、苦瓜、空心菜、生姜等。毛泽东散步每每经过时，都会表扬陈长江他们“菜种得好，种菜比种花好”。3年困难时期，陈长江等经常在几个簸箕里放上一些饭粒，加上石头，放进湖里，等一会儿取出簸箕，能捞上一些小鱼小虾，以给毛泽东改善生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人们习惯地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

毛泽东根据“七千人大会”精神，要求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带头到农



毛主席头戴便帽，身穿蓝色大衣，背着手站立在海边，背景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主席大衣衣角被迎面吹过的风微微掀动。这一经典形象成为一种虔诚的符号被张贴在当时的千家万户，更被烙印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侯波 摄

村去，直接参加一线劳动，帮助党中央做些细致的调查工作。1962年1月底，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居住，当时作为随身警卫的警卫一中队副中队长陈长江等也在这里。一天上午，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召集陈长江、警卫处副处长孙勇、主席机要秘书罗光禄、主席卫士张仙朋、主席理发员钱水桃传达主席指示。

汪东兴讲：“主席要安排你们下基层，到湖南常德地区农村劳动锻炼一年。他说，不准当干部，要当社员，同社员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了解人民群众对贯彻中央下达人民公社六十条方针政策的反映，了解农村生产和社员生活的真实情况。主席还说，你们几个人在他身边多年，虽然出身农民，从小就参加劳动，现在进城十多年了，不要忘了劳动，不要忘了广大农民，更不要忘本。主席说，你们中除小钱外，都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很需要下农村劳动锻炼，多接触人民群众，体验农村生活，向农民学习农业知识，提高思想和工作能力。”

陈长江等表示坚决按主席的指示办。他们清楚，毛泽东生于农村，自幼与农民有较多接触，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学生时代，毛泽东就多次深入农村，调查农村和农民情况。投身革命后，毛泽东长期从事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因此，毛泽东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始终关注农民。现在，自己能参与到农村一线的调研、实践中，大家当然感受到了信任与压力。

汪东兴高兴地说：“我将你们的表态报告主席。下农村去要保密，统称是中央机关下放劳动锻炼干部。你们抓紧准备下农村用的东西。我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典桃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商定好了，你们到常德地区古门县农村劳动锻炼，今后你们有什么事就直接跟邓副主任联系。”

过几天就是春节了，按中国的习俗，这是全家团圆的日子。有个别

同志建议春节后下去，但毛泽东希望他们春节前下去，看看社员怎样过春节。为此，陈长江等决定当天下午就去湖南石门。可是春节前夕，各地回家过年的人早已将北京站的火车票一卷而光，陈长江等只好请中央办公厅帮助联系买了几张站票。

第二天一早，陈长江一行5人启程，登上南去的列车，肩负主席的重托，向目的地进发。临走前，他们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关心地询问了他们家庭是否有困难，并提出了希望。

清早，北京站茫茫的大雾还未散去，冬日的寒意依然侵袭着人们。然而此时，火车站的广场上、候客大厅内已经坐满了等待上车的旅客。售票大厅内，更是人头攒动，队伍排到了大厅外面。陈长江一行好不容易上了火车，车厢里人、行李挤得满满的。这时候，似乎人与人之间变得宽容了许多，要是你不小心碰了谁一下，踩着谁脚了，在平时如果不道歉两人就可能掐起来，而现在大家都忙着挤车，谁还在乎这些小事。因为人多，陈长江是被人流裹挟着推上车的，火车终于开动了，他在车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能倚靠的地方……

陈长江一行始终没有座位，一直站到湖南长沙，双腿都站得麻木了。下了火车，即转乘汽车到石门县城关公社新厂大队，开始了他们一生难忘的社员生活。

石门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处湘鄂边陲，属于山区，多丘陵，是个比较贫困的农业县。刚开始，社员们看到陈长江他们的穿着打扮和农村生活环境不协调、也不相称，都私下窃笑。时间一长，大家与社员们接触多了，便开始熟悉，关系也逐渐密切起来。据陈长江回忆，他起初挑几十斤的担子走起路来就东倒西歪不像样子，经过不长时间的锻炼就能挑百斤以上的担子了。“有一次，我就和孙勇挑上一百四五十斤的担

子走了二十多里的山路，中间只休息过一次。”

陈长江几人住在一起相互勉励，经常开会检查自己的思想上、行动上、生活上与主席的要求有什么差距，努力争取短时间内在这些方面更贴近社员。陈长江回忆道：“我们5个人住在一间7平方米多的小房子里，屋内潮湿，透气性差，显得也拥挤。山区没有电，用的是小煤油灯。起初不太习惯地方的生活，后来慢慢适应了。我们是义务劳动，不参加分配，但每天劳动的数量和质量都计算工分，一般一天以10分计，好的加、差的减。我们几个人分别在两户社员家吃饭。由于劳动强度大，我们的饭量眼见着增加。每天交粮票和伙食费，不要地方负担，可能队里对在吃饭的社员家里多少有点补偿。”

每天的劳动从清晨四五点就开始。同社员们在一起劳动时，陈长江脏活累活抢着干，掏大粪、拔草、施肥、收割样样都行。天热时，只能穿短裤、背心，皮肤时常被火辣辣的太阳烤掉一层又一层。社员和队里的干部经常竖起大拇指，啧啧称道：“没有想到你真能吃苦，比我们社员的意志还坚强！”

在一年的劳动中，陈长江等每个月都要向毛泽东和中央办公厅写一份有关当地的情况和自己劳动情况的汇报，包括中央对农村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社员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反映等多方面的内容。

1962年，我国经济结构初步得到调整，开始初步克服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陈长江所在的生产大队分10个生产小队，30户左右一个小队，便于管理和核算。陈长江看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自己心里也甜滋滋的，与社员共同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深切感到只要政策对了，生产就会越搞越好，百姓的生活也会一天比一天好。

湖南人性格豪爽，春节十分热闹，陈长江也受到当地社员的热情款待。家家户户杀猪宰羊，鞭炮震耳，阖家欢乐，陈长江深深被眼前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感染了，心里默默为农民们祝福。

1963年1月15日，陈长江等5人结束了在农村的劳动锻炼，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生活、劳动整一年的湖南农村。乡亲们一直送他们到村口，挥泪告别。带着乡亲们的嘱托，他们于次日下午回到北京。

在中南海，陈长江一行见到了阔别整一年的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回来啦！晒黑了，健壮啦！汪东兴常向我汇报你们下农村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情况。你们经受了考验，增长了知识，锻炼了思想，这些对你们今后工作很有好处。”

陈长江笑着说：“只是那里的辣椒太辣。感谢主席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锻炼机会，我们将发扬好的作风、努力工作。”毛泽东笑开了：“湖南人、四川人没有辣椒受不了，要顿顿吃。爱吃辣椒，革命性强啊！”

随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经常回农村看看，不要忘记广大农民，要学会农事耕作，要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克服官气，磨炼意志。”陈长江等频频点头。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开始认识到，要在中国进行革命斗争，就必须把握中国的国情。新中国成立后，怎样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全党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是一个尚未认识的必然王国。因此，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要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尽快熟悉情况，了解新问题，探索和挖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获得领导工作的主动权。

毛泽东曾指出：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

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长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陈长江注意到毛泽东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他看到毛泽东日理万机，即使工作极其繁忙，仍然巡视大江南北，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调查了解情况，收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制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提供客观依据和理论指导。

1967年5月底，陈长江回老家江苏海安探亲并进行调查研究。回京后，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时，陈长江没有写成材料，甚至连个本子也没有拿，便把沿途所见所闻和在农村了解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向毛主席说开了，谈及途经扬州时发现两派斗争很激烈，有些地方还发生了真枪实弹的武斗，从而影响生产和社会秩序等事。毛泽东听后，沉重地说：“原来设想，这‘文化大革命’今年就差不多要结束了，现在看来很难收场啊！”

陈长江说到回家之后，当地正在收小麦，农民群众都很忙，那里社员们生产搞得很好，对“文革”他们认为“那是城里人的事情”，“不搞生产就会挨饿的”时，毛泽东笑着说：“农民是很讲实际的，农业生产一天也不能停。8亿农民把生产搞好了，我们就有希望，国家就不会乱的。”

陈长江还向毛泽东介绍了家乡有关公共食堂的情况：“我们那个地区呀，实行食堂确实有困难，一是粮食不够，再一个一家一户住得比较分散，有老有小，人家还想靠这个洗锅水来喂养猪、喂养牲口。”

继而，陈长江告诉毛泽东：“沿途到处是大字报，有的大字报上还说邓小平自杀了，有的大字报上说您找到了一个失散多年的儿子——说他现在在某个生产队当会计，讲得有鼻子有眼的，可玄乎呢。”

陈长江清楚，毛泽东一生共有过10个孩子，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里，生下来夭折两个，后来战场牺牲一个，他先后丢失了4个亲骨肉。



陈长江（后右一）探亲时与家人合影。

革命胜利了，毛泽东思念失散的孩子，组织上曾派人四处寻找，但最终下落不明。

毛泽东说：“小道消息不可靠，你辟谣了没有？”陈长江说：“我当然不相信这些，邓小平院子里那个哨兵就是我们大队担任的，你们家的事我也知道，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儿子。人家到处写的大字报，我怎么给您去辟谣？”毛泽东对外面的所谓宣传显得很无奈……

## 五 《浪淘沙·北戴河》诞生的背后

位于河北秦皇岛西南隅的北戴河风光秀丽，苍翠的青山和浩瀚的大海相映，精致的别墅与葱郁的林海交融，是渤海湾金项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里滩面平缓，海水清澈。

北戴河本名叫北家河，明代为海运积储之地，海滨命名远载辽史。早在 1898 年，经北洋大臣委派津海关道李岷琛、候选道王修植、开平矿物局总办周学熙等勘测，清政府正式划定北戴河以东至鸽子窝沿海向内 3 华里为避暑区。

北京的夏天异常闷热，解放之初的中央机关办公条件并不算好，就连毛泽东的住处也没有空调设备。尽管中南海碧波生凉，绿荫遍地，可是难耐的盛夏酷热还是让人汗流浹背。1954 年，中共中央开始设立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直至 2003 年取消。于是，这里曾有中国“夏都”之誉。

生在湖南湘潭水乡的毛泽东，在很小的时候，就常在他家房前的池塘里游泳，而且泳技在小伙伴中出类拔萃。儿时的水中嬉戏，使毛泽东与游泳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一生不改其乐。游泳，不仅给毛泽东的少年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同时也使毛泽东瘦弱的身体逐渐变得结实起来。

毛泽东一生钟情于水，最让他神往的畅游之地不是风平浪静、空间狭小的游泳池，而是浩淼宽阔、洪波滚滚的江河湖海。

解放初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中央领导人忙碌万分，只要身体能够支持，绝不休养。毛泽东虽久闻北戴河之名，也非常爱好游泳，却在解放后的四年多都没有去过离北京很近的北戴河。

1954年4月，毛泽东带上两大箱子书和他那用惯了的旧行李，第一次来到北戴河，住的是“章家楼”。出于一种习惯，毛泽东不爱住洋楼别墅，愿意住平房，喜欢高大宽敞的房间。正因如此，中直疗养院建造了一号楼，实际上是一排平房，这就成了毛泽东每年夏天过来避暑办公的地方。

毛泽东来到北戴河后，仍然日理万机，除召开各种会议之外，还要审阅各地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报告，批阅堆积如山的文件，为《人民日报》修改社论等，每天工作到晨光破晓，偶有空闲，便读读史书，陈长江知道这是毛氏特色的一种休息。

在毛泽东到北戴河之前，组织上派擅长游泳的陈长江带领10多名警卫队员先期到达，组织他们学习划船、游泳、海上救护等技术，以保证毛泽东来这里游泳时的安全。经过几个月的练习，警卫队基本掌握了多项水上技术，也摸清了海水的一般规律。

毛泽东自1954年4月首次到北戴河办公后，这一年夏天又到此住了很长时间，其他中央首长都走了，他没有走，直到9月天凉。每天工作之余，毛泽东一定要去游一次泳。

毛泽东游泳喜欢热闹，尤其喜欢和年轻小伙子、姑娘们成群结伙地游。这时他便会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他侧泳、仰泳，自然轻松，一边游一边和年轻人聊天，兴致极高。名义上警卫是保护毛泽东，事实上毛泽东的游泳技术比一般警卫高得多。毛泽东常对陈长江等讲：“游泳时，

由于水的压力、阻力、浮力和较低水温的作用，使人体的各部分器官都得到了锻炼。肌肉活动中消耗热量，促进了人体内代谢的加强。游泳不仅强身健体，而且可锻炼意志品质，培养勇敢顽强、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精神。当然，还可以消暑纳凉，使肌肉得到放松，心情因此舒畅，身心健康。”在陈长江眼里，毛泽东爱好游泳，不只在能够锻炼身体、作为一种休息方式，还在于这是他接触方方面面的、了解情况的一种渠道。

在水中，毛泽东一边自由自在地游泳，一边海阔天空地同身边的工作人员交谈。这时候，毛泽东和大家一样，情绪极高，谈兴很浓。毛泽东什么都问，大家七嘴八舌什么都说，无拘无束。

陈长江说，毛泽东的摄影师侯波不习水性，每次毛泽东游泳，她都



1960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小憩。侯波 摄

坐船跟拍。一次，在北戴河，侯波照旧坐在船上，拍下了毛泽东跟孩子们在大海中畅游的镜头。照片中，毛泽东在前面游着，还回过头看看孩子们，笑着，似是在鼓励他们要不怕风浪，奋勇向前；孩子们也都兴高采烈地在大海中游着，跟随着父亲。还有一次，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带领女儿下海游泳，李讷刚套上救生圈，毛泽东就让她拿掉。那天，游的时间比较长，李讷游得筋疲力尽，但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坚持下来了。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毛泽东是用这种办法来锻炼儿女们的意志。

一天，毛泽东游到兴头上，忽然朝保健医生徐涛喊：“小徐，你不是游得好吗？我们比一比。”“行啊，我们比速度。”徐涛于是朝毛泽东靠近。毛泽东说：“你聪明，我也不傻。我不跟你比速度，我跟你比耐力，比持久。”徐涛说：“那不行，比赛都是比速度。”

徐涛知道毛泽东下了水就不愿上岸，就那么不停地游，可是自己不行，时间一长非抽筋不可。毛泽东说：“你别骗我，有比速度的就有比耐力的。要达到胜利的彼岸，首先必须有耐力。要坚持时间长，要游得远才行。”

毛泽东不慌不忙只管向远处游。半小时后，徐涛坚持不住了，气喘吁吁爬上船，乘船随毛泽东遨游大海。毛泽东指指徐涛挖苦道：“他很进化么，很有办法，游不过岸就划船划过岸。”在水中游泳的陈长江等警卫们都笑了。

毛泽东每次游泳只下一次水，下去就要游个够。不够不上岸，上了岸便不再下水。无论走路游泳，他都是那句话：“我这个人不喜欢干回头事。”像往常那样，毛泽东这次游了一个多小时，经大家一再劝说才上岸。

陈长江替毛泽东擦干身体。毛泽东在沙滩上漫步，嘴里念念有词。听多了，陈长江等身边人员也记住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



1960年8月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游泳后与陈长江（前左一）等人合影。

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毛泽东对陈长江讲：“这首诗的作者是曹孟德——曹操。”陈长江有些惊讶：“曹操也来过这里？他会写诗？”

“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较深的修养，他的诗朴实无华，但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毛泽东笑了笑，“他当然来过，上过碣石山。汉献帝建安十二年，时任大将军的曹操为清除边患，巩固后方，率大军北征乌桓。大破乌桓后凯旋回师，途经渤海口附近的碣石山，乘兴登临，观看沧海壮丽景色。这个时候，曹操踌躇满志，意气昂扬，挥笔写下了这首诗。不过，他写的是一首无题诗，后人取名为‘观沧海’。这首诗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大海图景，抒发了他统一中国的宏愿和叱咤风云的豪情。”

陈长江说：“曹操可是一个大奸臣呀，没想到他会写诗。”毛泽东连连摆手，说：“《三国演义》中将曹操描写为一个汉朝的篡逆者，其实并不公平。曹操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大诗人。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他精于兵法，统一了北方，为创建魏国打下了基础，同时大胆改革，革除东汉弊政，使当时受到很大破坏的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陪同在毛泽东身边的保健医生徐涛听到这些，也感到主席的观点的确新颖，听入了迷，感觉耳目一新。

据李敏回忆，当时她和李讷在学校放暑假后，由江青带着提前来到北戴河。几天以后，还没见到说好要来的毛泽东，李敏、李讷遂给爸爸写了封信，催他快来。很快，不仅盼来了爸爸的来信，还有爸爸亲手用毛笔抄写的曹操的《观沧海》。因此，在北戴河这段日子，李敏、李讷就多了一项学习《观沧海》的作业。以后，李讷深受父亲影响，酷爱历史和古典文学。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毛泽东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李敏、李讷，我亲爱的女儿：你们的来信都收到了，很喜欢。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我好，勿念。亲你们！

爸爸

1954年7月23日

在大海中游泳，毛泽东体会到与风浪搏击的乐趣。只要有空，他就

带警卫战士到海里去，他的“游兴”与日俱增，有时到了夕阳西下还舍不得上岸。

一天下午，天气闷热，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文件，感到有些困倦，伸了个懒腰，对陈长江说：“走，游泳去！”周恩来、朱德也跟了去。

孙勇说：“主席，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毛泽东笑了笑：“有风雨更好，更适合在大海中游泳！”

警卫们于是簇拥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向海边走去。毛泽东穿着白绸衬衫、灰色裤子、棕色皮鞋，迈着坚实有力的步伐，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向5号浴场的海滩走去。

果然，走到海边时突然狂风大作，紧接着是大雨倾盆，刚才还安静温驯的大海，瞬间就咆哮肆虐起来，波浪汹涌，惊涛拍岸，原先清澈澄明的碧波，渐渐变成泛黄的汪洋。

毛泽东见到呼啸翻腾的大海，顿时激动起来，萌生出强烈的征服欲望。四处雷声不断，暴雨劈头盖脸地打来，早就成了“落汤鸡”的周恩来和朱德大喊：“主席，不要下了，不要下了……”但风浪早把他们的声音淹没了。

陈长江说：“主席，风大了，雨也在不住地下，我们回去吧。”毛泽东说：“不，不能回，我们下海去！”他的眼里闪出兴奋的光彩。

毛泽东注视了一下海面，默默地脱去了衬衫、长裤，只穿一条短裤，很认真地做了两个扩胸动作，看了看紧随他的警卫：“你们害怕吗？”眼见浪涛翻涌，喜好游泳的毛泽东却不顾劝阻，要下海游泳，与风浪搏斗，警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报告主席，不怕！”

“好嘛！”毛泽东说，“你们可以跟我下去，也可以不跟我下去，可以在岸上看，也可以回去。”警卫们昂首挺胸回答：“主席到哪里，

我们也到哪里！”

于是，孙勇和陈长江率先跃进大海，在海波浪谷中起伏。毛泽东习惯地吮了吮下唇，转身扑向大海，一起一伏地向大海深处游去，在风雨中前行。陈长江和孙勇、韩庆余等十几名警卫战士围在毛泽东的左右，聚精会神地游着。他们时而被波浪掩盖，时而又飞快地冲出浪尖，波涛一会儿把他们冲散，一会儿他们又聚拢在一起，唯恐出现闪失。他们想不到61岁的毛泽东游兴大发，不断变换着泳姿，一直游在前头。

游了很久，看见一条破渔船，毛泽东担心地说：“刚才我看见几个渔民，不知道他们出事了没有？”一位警卫说：“渔民刚上了岸，这条船刚才靠在岸上，是空的，被水卷到这里来的。”毛泽东说：“这就好。”

游了一会儿，毛泽东大概累了，放慢了游速，他用较为轻松的仰泳姿势，对围在周围的警卫战士们说：“你们放心，要沉住气，不要慌张，大海正在考验你们的胆量呢！”

陈长江知道，大家的胆量无疑是可以接受考验的，不过担心的是主席的安全，大海隐藏的凶险是不认人的。

海上的风更大了，大雨如注，一排排的浊浪像一座座山峰向毛泽东涌来，警卫战士们紧张起来，更加紧紧地围住他。毛泽东一边在浪尖波谷与大海搏斗，一边鼓励战士们说：“不要怕，大不了呛两口水，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知游了多长时间，直到云散雨停雷声息，他们才游回来。毛泽东身上已被海里的贝壳划出了血迹。但他仍然那样兴致勃勃，毫不疲倦，尽情地发挥着高超的泳技。他上岸后，甩打着身上的水，说：“今天游得真畅快！”

到这时，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才如释重负，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毛泽东说：“征服急难险恶，你强他就弱！大凡世界上凶恶的东西就是这样，你表现得怯懦，你就会遭到凌辱，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看起来样子虽是可怕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周恩来说：“今天总算可以了吧，我们叫都叫不回来。”毛泽东笑道：“我一门心思斗海浪，思想高度集中，哪里听见你们在叫。”

次日，毛泽东纵笔挥毫，写下了不朽的名篇《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上阙写景，景中含情，而下阙抒情，情中有景，以一句“往事越千年”倒转时空展现历史的画面。全诗生动描绘了北戴河海滨夏秋之交的壮丽景色，展示了一代伟人前无古人的雄伟气魄和犹如汪洋浩瀚的博大胸怀。在陈长江看来，这首诗比《观沧海》有更鲜明的时代感、更深邃的历史感、更辽阔的宇宙感和更丰富的美学容量。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致黄炎培的信的末尾还特意提到：“去年

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这里的“去年”应为“前年”，即1954年。这一年填的一首词是《浪淘沙·北戴河》，另一首词则是《水调歌头·游泳》。

当年，臧克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后来又出任《诗刊》杂志的主编。毛泽东听到《诗刊》将创刊，邀臧克家去谈诗。随后就说：“最近写了一些东西，《文汇报》向我要，正在考虑。”臧克家一听，觉得如能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岂不是一件大美事？于是，他便恳切地对毛泽东说：“主席，就给《诗刊》发表吧。”毛泽东一时未作回答，只是抬头仰望了一下，似乎在作决定，然后才说：“好吧，就给你们。”这一下，臧克家可真乐坏了。

与毛泽东谈话后，臧克家即向文艺界负责人作了汇报，并与《诗刊》的同仁进行商量，于是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附上一些传抄的诗词，请毛泽东订正。

毛泽东接到信后，于1957年1月12日致信臧克家等，开首即言：“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8首，一共18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他对《诗刊》来信所附的诗词改正了几个错字。毛泽东在信上还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毛泽东所提及的这18首诗词就包括《浪淘沙·北戴河》。后来这封信连同毛泽东的诗词作品一并在《诗刊》创刊号发表。25日《诗刊》创刊号出版的当天，读者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排着长队购买《诗刊》。一时间，外电纷纷向全世界作了报道。几天后，《人民日报》分两次给

予转载，陈长江等警卫也争相阅读。

关于写这首词的缘由，后来毛泽东在1962年4月曾说，因为南唐后主李煜写的《浪淘沙》都是婉约的、情绪伤感、风格柔靡，没有豪放的，所以他特意用《浪淘沙》的词牌反其道而行之，写一首奔放豪迈的词。并说，他很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豪迈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出了自己的一大心愿：“如有可能，我就游黄河、游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一天走60里，骑马30里，走路30里，骑骑走走，一路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从长江上游，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国内国际的形势，我还可以搞，带个电台，比如，从黄河入海口走到郑州，走了一个半月，要开会了我就开会，开了会我又从郑州出发，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我很想学明朝的徐霞客。”

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中央警卫局特意在北京西山一带秘密组建了一支护卫他考察的骑兵大队，准备了200匹马进行训练。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练习骑马、查资料，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1964年夏天，毛泽东还拟定了考察黄河的出发日期。为他训练的那匹白马坐骑，也从北京调到了北戴河，在警卫员的搀扶下，71岁的毛泽东骑了上去，侯波还为他照了相，陈长江正在马的后面紧跟着毛泽东前行。

据陈长江讲，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骑马。毛泽东骑马考察黄河的计划本已确定下来，准备1965年春成行。但是，1964年8月5日，突发“北部湾事件”，美国入侵越南。6日晨，毛泽东遗憾地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黄河这次是去不成了。”正因为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毛泽东被迫取消了计划。



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骑马（马后者为陈长江）。

据陈长江讲，自1954年至1964年这11年，毛泽东年年夏季都到北戴河游泳，每次一般游四五十分钟到一个小时，每次他都在毛泽东身边。

1960年8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来到中国，下榻在中共中央在北戴河的别墅中，毛泽东会见了胡志明。

当时，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签订的有关合同，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带走图纸，使中国40多个部门的250多个建设项目被迫中断，在经济上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1960年6月，苏共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从而使中苏分歧公开化并逐步扩大。对此，胡志明非常焦虑，他希望中苏两党两国尽快对话，消除隔阂，恢复团结，于是怀着这个目的来到中国。

8月10日，胡志明起得很早。他昨晚没有睡好，总想着中苏关系问题，很想和毛泽东谈谈。他见毛泽东的房间静悄悄的，为了不影响毛泽东的

休息，便独自去海滨散步。

毛泽东也整整一夜没怎么睡。早起后，想去看看胡志明，同他聊聊，听工作人员说胡志明去海滨散步了，便也来到海边。毛泽东对胡志明为中苏两国劝和给予充分肯定，称赞他是和平的使者。

这时，太阳已跳出地平线，把浩瀚的大海照得璀璨夺目，金星万点。毛泽东、胡志明脱去外衣，在陈长江等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并肩走下大海，挥臂劈水，遨游在万顷碧波之中。

上岸后，胡志明热情地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去越南参加越南国庆纪念活动和代表大会，并风趣地对毛泽东说：“明年春天刘少奇同志一定要去，他欠的债明年春天还。你找个时间也一定去，这笔债也要还，时间你自己定。”

“你们那里冬天怎么样，最低气温几度？”毛泽东问。“12摄氏度。”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越南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秘书长阮春水在旁回答道。

“不冷。可以偷偷地去，游一下红河。”毛泽东幽默地说。

“不公开，也不秘密，用你曾说过的方式，非正式访问。”胡志明笑着说，“至于红河嘛，水可能太混浊，不好游呀！这要到时再说。”

据陈长江回忆，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经常到中国来访问、休假、治病，同毛泽东一起在北戴河游泳。

1960年，毛泽东和来访的尼泊尔首相柯腊拉伊谈起过到尼泊尔游泳的设想。这一年，毛泽东还和来访的老朋友斯诺谈起过游泳。斯诺说：“1936年在保安，您曾说过想到美国的江河去游泳，不知您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兴趣。”毛泽东笑了笑回答：“我希望在不太老之前，到密西西比河去畅游一番。如果华盛顿政府同意，我可以在几天之内就去，完全只作为一个游泳者，不谈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一下。”

## 六 伟人的平民情怀

陈长江到毛泽东身边后，发现毛泽东非常注意锻炼身体。“主要是这几种——一种是淋浴，就是每天卫士给他擦澡；第二种是太阳浴，有时候太阳很好，他就穿个短裤在院子里晒一晒；第三种，他出来散步的时候，每次这样晃荡晃荡，全身运动运动，这是几次锻炼。”

“毛主席喜欢爬山，更爱好游泳。有的文章披露，毛主席在长江游泳有16次。我虽没有这方面的精确统计，但粗略算来，实际上比这个数还要多。他喜欢在波涛滚滚的大江大海里游泳，他也常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到江河湖海里去游泳，去锻炼，在与自然的搏斗中认识自然，积累经验，增长才干。”陈长江记得，毛泽东曾说过：“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为了确保安全，毛泽东每次游泳，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陈长江都要与一些警卫人员先下水试水，察看那里的水情，包括水的温度、清洁程度，下水和登岸的地点及水的流速等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教我们学游泳算起，直到他老人家晚年最后一次游泳，少说也不下百八十回。”陈长江说，毛主席游泳时，他因事没能参加的仅有屈指可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长江游泳。钱嗣杰 摄

数的几回。

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一直不在北京。他先后在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等地调查研究，视察工作。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下长江在滚滚激流中畅游15公里，历时75分钟。7月2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这一消息，并配发了题为《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社论、照片和毛泽东与记者的谈话。陈长江回忆说：“最令我遗憾的是毛主席这次畅游长江，我因在北京抓部队的军事训练而未能随同前往。

毛主席回到北京，在丰泽园里住了两三天，觉得刚修过的房子住起来总是不舒服，便到中南海游泳池的更衣间里住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他在这里一住就是10年。”当时，陈长江随两个警卫分队的战士搬到游泳池院北侧的几间小平房里居住。

毛泽东回京之后，中共中央紧锣密鼓地连续开会，政治口号接连不断地刷新，陈长江等感觉到政治气氛也愈来愈浓。这年8月上旬的

**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简表**

次数	日期	天气	乘坐轮船	入水地点	起水地点	历时	游程
1	1956.5.31	晴天 二、三级东南风	武康轮	长江大桥8号桥墩	汉口王家墩	2小时4分钟	约26华里
2	1956.6.2	晴天 二、三级东北风	武康轮	汉阳鹦鹉洲江面	武昌八大家	2小时	约28华里
3	1956.6.3	晴天 三、四级北风	武康轮	武昌平铺口江面	青山任家路	1小时	20余华里
4	1957.9.5	江面四级 北风，浪大	航川轮	长江大桥5号桥墩	汉口四维路	约30分钟	约15华里
5	1958.9.10	晴天 二、三级东南风	航川轮	汉口小河口江面	汉口四维路	约50分钟	约10华里
6	1958.9.11	晴转多云	航川轮	湖北省银行仓库	汉口四维路	约40分钟	约10华里
7	1958.9.12	晴天	航川轮	长江大桥附近	汉口四维路	约40分钟	约30华里
8	1958.9.13	晴天	航川轮	长江大桥江面	汉口四维路	30分钟	10余华里
9	1958.9.14	阴转雨	航川轮	汉口小河口江面	旱军码头	32分钟	10余华里
10	1959.6.23	多云转阴 二、级南风	航川轮	不 详	不 详	不 详	不 详
11	1959.6.29	中阵雨 三、四级东风	航川轮	不 详	不 详	不 详	不 详
12	1961.9.24 (中秋节)	晴天	航川轮	武昌造船厂码头	滨江公园附近	40多分钟	约24华里
13	1962.6.19	多云 三级东南风	航川轮	武昌造船厂码头	汉口军用码头	不 详	不 详
14	1962.6.21	多云 三级东南风	航川轮	武昌造船厂码头	汉口军用码头	不 详	不 详
15	1962.6.24	晴转多云 三、四级北风	航川轮	长江大桥江面	武船码头	30多分钟	不 详
16	1963.8.18	多云转阴 三级东南风	航川轮	武昌造船厂码头	滨江公园	不 详	不 详
17	1966.7.16	晴天	W306号	武昌大堤口码头江面	武钢附近	1小时5分钟	约30华里

注：表中10、11次游泳资料以前未曾公开，现从武汉市轮渡公司档案资料中发现。

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简表。

一天，陈长江吃完午饭回游泳池路过食堂外边，只见许多人在看什么，便也凑上前去。原来是一张标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黑字红纸贴在那里，文末署名是“毛泽东”。看完，陈长江吃惊不小，不由暗想，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尽管陈长江并不知道中央开会的内容，对那些惊动全国的背景材料一无所知，但是他这时已经意识到一定是中央领导层中有了分歧，发生了矛盾。

过了很久，陈长江才知道这个所谓的大字报早已印发给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全体同志了，他所看到的不过是大字报的一个抄件而已。可是，陈长江又有些想不通了，既然是中央文件，为什么不按组织系统往下发呢？偏偏要手抄下来贴到墙上去呢？

陈长江渐渐注意到，在那些日子里，住在更衣间里的毛泽东也没时间或者没有心思游泳了，整天不是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就是接连不断地找人谈话，显得异常忙碌。陈长江虽然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那么紧张，却预感到党中央又要搞什么大的政治运动了。

果然不出所料，在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出不久，北京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位置通栏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陈长江记得：“当天，北京掀起了庆祝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发表的热潮。所谓群众，绝大多数是机关干部，有组织地走上街头游行。中央办公厅因势利导，在中南海西门外一侧搭起个报喜台，并组织所属单位人员在那里值班，代表党中央接受群众的祝贺和致意，且维持秩序。”

一时间，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上人声鼎沸，欢呼阵阵，游行报喜的队伍接连不断。8月10日傍晚，陈长江接到一个消息，说毛主席在中南海西门被群众包围，想回也回不来了。原来，毛泽东出来散步时，只跟着警卫老王和护士小吴。不觉信步向西，步行出中南海，没想到恰与一前来报喜的游行队伍相遇……陈长江知道，主席在外边多停留一分钟，就多一分不安全因素。于是，一声招呼，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一下子集合起数十人，他们紧跟在陈长江的身后，自动排成两行，飞快地向西门跑去。

陈长江一行一出西门，就见报喜台围着数不清的人，毛主席就被围在里面，后边的人看不到就硬往前挤，远处的人还在喊着、跑着，向这边涌来，场面十分混乱。陈长江一挥手：“跟我来！”他找了一处人群比较薄弱的部位，以自己为头，上前分开群众，身后的战士一个紧跟一

个像排人字形的雁队一样楔入人群之中，终于来到了主席的面前。

毛泽东被围在那里，陈长江等十分着急，可是毛泽东自己却兴致勃勃，坦然自若地与一双双伸过来的手相握，与凑上来的群众亲切地交谈。在陈长江的面前能看到的是攒动的人头和伸出来的千百双手，他想让主席赶快离开这里往回走，可是主席不愿意，还想向涌来的群众问些什么……

这时，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见挤得够呛，便请毛泽东上了临时搭建的报喜台。这样，毛泽东站得高了，能看到他的人就更多了，突然间出现短暂的沉寂，继而惊喜之声四起，欢呼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陈长江看到毛泽东在欢呼的群众面前微笑着，向他们挥手，向他们致意，大声地说：“同志们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陈长江做警卫工作的经历中，不论毛泽东在哪里，对那里的群众都有巨大的吸引力，那里就会出现激动欢呼的高潮，也就会出现拥挤，有时甚至是可怕的拥挤。陈长江认为，这往往给安全警卫工作带来难以应付的困难。

恰在此时，接应的后续部队赶到了，他们在人群中开出一条窄窄的过道，陈长江等便抓住机会，簇拥着毛泽东走下台来，奋力冲出人群。

离开了沸腾的人群，进了中南海，陈长江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有了着落。再看随自己去的那些战士，他们个个汗流浹背，衣衫湿透，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毛泽东看着他们这副尊容，笑了笑：“要不是你们来解围，我回来就不容易喽。”毛泽东的话带着常有的风趣和幽默，可是这一次陈长江他们怎么也笑不起来。

过去，毛泽东总嫌警卫工作妨碍自己有更多的机会接近群众，为此还曾发过火，批评过人。陈长江记得，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在讲话中批评说：“警卫制度照抄苏联的，害死人了，前呼后拥，

几部车子，不许参观，不许游泳，不许上街买鞋子，不许下馆子。”

经历了这次意外，毛泽东不无感慨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比我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却不能。我现在哪也不能去，苦啊！”他的话流露出对平常人生活的羡慕之情。

## 七 被“罚站”的领袖

1966年，毛泽东曾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时间分别是在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日，11月25日、26日——其中，11月10日、11日，11月25日、26日的检阅由于间隔时间很短，均被算作1次。陈长江回忆说：“由于新闻的报道，广泛传播了毛泽东起初两次接见红卫兵的情景，一下子就使得全国的青少年组织起来，或乘火车，或坐汽车，还有的步行，长途跋涉赶到北京。一时间，北京城人满为患，家家有客、店店住满，仍无法容纳陆续赶来的众多学生（其实，不只是学生）。因为来京的人数过多，有关部门动员他们离京返回当地‘闹革命’，他们却说没有看到毛主席就不走。红卫兵的要求，一下子成了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他们的要求，就被很快地答应下来了。”

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可是在广场上看起来离城楼太远，有人说没有看见，于是后来几次接见红卫兵改在东西长安街上。

“每次组织数十万红卫兵分别坐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大路中间留出8米宽的通道。在车队的编排上，我们用12辆敞篷吉普车，分

3路行进，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乘坐在中间那一行4辆车上，两边各4辆由警卫人员乘坐——首长们都是站着，警卫人员都是坐着，这样不会遮挡群众视线。”陈长江说，为了接见那些红卫兵，在开动的车上毛泽东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尽管他身体一向很好，精神也不错，但他毕竟是老人了，其中的辛苦和劳累难以想象。

这年11月，很多人集中在北京，天气却越来越冷，白天要吃，晚上要住，有的人也没有御寒的衣服和被褥，吃住行都成了问题。组织动员他们离开北京回原地，他们说没有看见毛主席，坚决不回去。有一天，是毛泽东预定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出发前，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我又要罚站去了……”陈长江知道毛主席是指会见红卫兵时要站很长时间，也认为接见红卫兵并不轻松，是一种负担，有“罚站”的感觉。陈长江说：“主席，你可以坐下么，何必一定要站着呢？”毛泽东认真地说：“我哪里能像你们有那样多的自由，想坐就坐在那里。不行，每次我还得站着，不然人家大都是从外地来却看不到我，就不高兴，我就过不了关！”

接受采访时，陈长江说，有人认为他们警卫人员坐在吉普车上，行驶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所乘汽车两侧，看似很神气，其实也是有严格要求的。“比如，必须得坐下，不许站起来，以免妨碍红卫兵看领导人的视线。不许我们左顾右盼，又必须能看清车队前后左右发生的任何事情，并做出准确的判断，要有随时采取适当措施的精神准备。这就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毛主席先后8次接见了1100万人次的红卫兵，每次都是周总理亲自安排与布置。”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至深夜12时才回到游泳池。凌晨2点，周恩来从大会堂打来电话说，清华园武斗告急，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会，解决制止武斗问题，请毛主席马上去大会堂。

陈长江等迅速进行准备，调动大小车辆，登车待发。不大工夫，毛泽东出来了，匆匆上了车，陈长江注意到他显得有些疲劳，而且神情显得不太高兴——大概刚睡下，又被叫了起来，睡意还未消，很不精神。

车队直奔大会堂，等候在 118 厅门前的周恩来迎了上来：“主席，这么晚了，又把你惊动了。”毛泽东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轻声说：“不来又不行，别的办法又没有呀！”

随后陆续到达的有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德等，还有几位工人、农民宣传队的代表。毛泽东仔细地听了几个方面的情况汇报之后，立即决定召见北京大专院校的几位红卫兵头头。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找到陈长江等，简要介绍了清华大学武斗的情况后说：“毛主席决定召见蒯大富、聂元梓、



1966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刊发“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



1967年3月2日《光明日报》刊发“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的消息。

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 5 人，你们明白吗，是召见，不是接见！”并说：“你们要加强门卫检查，不准他们把武器等危险物品带进来，还要找几个女服务员检查女的，你们要提高警惕。”

陈长江迅速在原有警戒的基础上，又选派几名精壮的干部，并从大会堂挑选几名老练、精干的女服务员到门口配合执行检查任务，向他们交待和布置了具体的做法和检查要点、处理原则、应急措施等。

大约 6 点左右，蒯大富在几辆小卧车的护卫下首先到达大会堂西门，大模大样地下车，踌躇满志地向大门走来，向哨兵炫耀道：“毛主席叫我来开会的，我要见他……”说着就要往里走。

“不是叫你开会，是召见，你听清了没有？！”哨兵把他拦下，说：“请接受检查！”蒯大富一脸蛮横，猖狂地嚷道：“毛主席找我研究问题……”说着，便甩手往里闯。

见他这样，陈长江火了，大声喝道：“老实些！”并安排两名警卫战士把蒯大富挟在中间进行危险品检查。一下子，这个称霸北京的“蒯司令”变得老实多了。

随后，聂元梓等几位到达，陈长江等对他们分别进行了例行安全检查，送他们进入会场。

召见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对红卫兵头头们说：“今天我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现在是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他们的大多数……”毛泽东越讲越气愤，把手举起来，又重重地落下去，提高声音说：“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蒯大富一看这形势，慌忙表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无条件向宣传队投降。聂元梓等也做了类似表示。周恩来随后向他们提出要求……

## 八 这也是“红灯记”

1968年国庆节后不久，即10月18日，毛泽东即乘车从北京出发，沿京广线南下，到武汉住进了东湖宾馆。到达武汉的第二天，在北京的林彪以电话记录的方式向毛泽东作工作报告，说为了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而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即“林副主席一号命令”。显然，林彪采取这种先下达后报告，先斩后奏的目的，在于形成既成事实，逼毛主席同意。

汪东兴在向陈长江等警卫干部传达时说：“有人要调动军队，想干什么呢？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要求警卫部队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陈长江不知谁要调动部队，不知毛主席为什么不高兴，尽管百思不得一解，认为唯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全面布置，处处设防，时时警惕。

往日随毛泽东外出，主要是值勤站哨，没有搞过军事训练，这回陈长江要求战士提高警惕，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并在驻地一些重要部位构筑了简易工事。陈长江回忆说：“在这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机要通信员从北京飞来给主席送文件，也把北京备战的最新情况带来告诉大家，比如北京的大疏散、大搬家等——北京一片打仗的气氛，让千里

之外的我们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感染。”

一天下午，汪东兴把陈长江等几人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毛主席对一些人搞的‘一号命令’很生气，说这是捕风捉影，小题大作。仗不会马上打起来，不要惊惶失措，不过打仗的准备要有，警惕也是要的。”

据陈长江回忆，这段时间，外出分队除正常的执勤、训练之外，还常利用业余时间与武汉军区警卫营打篮球。“毛主席有空闲时，也常搬个椅子，坐在球场边的竹林里，高兴地看大家打球，有时还情不自禁地为大家鼓掌。”

1970年8月，毛泽东乘火车到南方视察。到底去哪里，上面没人向陈长江他们交底。陈长江回忆说：“毛主席乘坐的专列经石家庄、郑州到武汉，在那里住了几天，又乘车继续南行，到达湖南长沙又住了几天。不论走到哪里，只要车一停下来，毛主席便立即找当地的党、政、军领导了解情况，或者开会谈话，重点是九大之后怎么样、怎么办？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毛主席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是为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作准备的。”

这年8月19日下午，专列到达南昌。毛泽东准备在这里稍作停留，然后再上庐山，陈长江等10多人先行上庐山，为毛泽东打前站。行前，毛泽东对陈长江说：“长江，我们到了庐山的第一件事就是游泳……”

陈长江清楚毛主席一向喜欢游泳，江河湖海不论什么地方，只要有水，他就想游泳。于是他高兴地重复说：“是啊，是啊，第一件事就是游泳。”毛泽东开心地笑了。

到庐山后，在庐山管理局人员的引导下，陈长江等检查了为毛泽东安排的住处，布置了警戒，便去察看准备让主席游泳的建在山顶上的庐山水库。因为水来自山涧，很少受到污染，实在是个游泳的好地方。陈

长江等对游泳的水域、场地及其设施做了认真的检查，并下去试水，游了一圈之后，陈长江感觉水温比较低，担心毛主席这位 77 岁的老人难以适应，尽管主席曾多次在这里游过。

毛泽东一到庐山，就直奔水库，连为他安排的住处也没有去。陈长江立即上前报告说：“山下很热，山上很凉，温差太大了，简直相差一个季节。”毛泽东迫不及待地伸伸腰腿，做起了下水的准备，并以和蔼的口吻说：“水凉？那怕什么！凉点，游起来舒服。”

毛泽东下水后，陈长江几个人紧紧跟随在他的前后左右。这一游，就游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太阳落山。

8月23日上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小礼堂开幕。毛泽东住地到礼堂还有一段距离，警卫分队跟随他的车子向礼堂开去。陈长江等随毛泽东刚步入会场，全场起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不到1个小时，这次会议就完成了预定的议程。

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看了看全场，大声问道：“还有什么意见？”坐在主席台一侧的陈长江只见会场静寂无声，没有一个人说要讲话。正在毛泽东要宣布散会时，林彪从衣袋里掏出一沓纸，表示要发言。对于他讲话，毛泽东毫无准备，林彪用大量的篇幅歌颂毛主席的才智和丰功伟绩，说毛主席是“天才，大家都不要否认”，“国家要设国家主席”等等。陈长江注意到大家都在鼓掌，只有毛泽东端坐在主席台上，没有鼓掌，还一脸的不高兴。陈长江回忆说：“后来，毛主席谈起这次会议的开幕式时，他向我们说，副统帅在全体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他讲话的内容事先也不与我商量，讲稿也没给我看过，不顾事先安排好的议程，也不顾我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以歌颂为名，大讲天才，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在讲这些时总是显得很生气。”

8月24日，预先的安排是讨论经济计划问题。可是这一天，在林彪的统一指挥下，他的死党分别在各组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林彪审定的“马恩列斯论天才”的材料，大肆鼓吹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毛泽东对林彪的做法感到痛心与失望，下令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有关简报，说“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这几天，毛泽东操心党内这场斗争，他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常出去散步。这时候，陈长江往往陪他走一走。有一次，毛泽东边走边对陈长江说：“有好几年不写文章了，现在不写不行了，要写文章反击。”陈长江还听到毛泽东自言自语“……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早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此后毛泽东一直专事党的工作。一次，陈长江谈及为什么不当国家主席，毛泽东笑着说：“当国家主席外事活动很多，有些纯粹是礼仪性的，还要到国外访问……这要占去许多时间。我呢，不愿意应付这些礼节性的事情。不当国家主席，我就可以集中精力专做党的工作。”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没想到现在又旧话重提，敏锐地看出林彪等人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随着庐山会议的进程，汪东兴及时向警卫分队传达了会议的主要情况，要求陈长江等提高警惕，值班干部和哨兵都要加强责任心，部队要加强应变能力的训练。

那段时间，毛泽东差不多每天中午都到水库边新建的那幢房子里去办公、开会或找人谈话。因为工作太多，毛泽东常常到凌晨两三点才回到住处。可是，庐山晚间大雾迷茫，上不见星斗，下不见山路，山上路面很窄，车子稍微开偏了就有掉下深谷的危险。陈长江认为，做警卫工作，



1969年8月，毛泽东赴南方途中和同行警卫等工作人员合影（左二为陈长江）。

不仅要防止敌特的阴谋破坏，还要防止包括车祸在内的各种事故带来的危害。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他们想了一个土办法：用防风煤油灯为汽车引路——每逢雨、雾夜行车时，陈长江就穿一件雨衣，手提一盏油灯在车前引路。一次，毛泽东见此情景，笑着说：“这办法不错，提着红灯引路，我们这也是‘红灯记’嘛。”

## 九 在意哨兵是否带武器弹药

1971年8月中旬，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向陈长江布置了毛泽东外出南方期间随行警卫的任务，要他们迅速做好准备。专列行至武汉，毛泽东主持了4次会议，8月28日到达湖南长沙。陈长江说，毛主席这次到长沙，也顾不得像往常那样，出去走一走，而是一住下便召集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党、政、军负责人来开会，来谈话，很是忙碌。

8月31日，专列开进南昌。住下之后，毛泽东便分别找江西、福建、江苏等省的有关负责人谈话。陈长江说，当时，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化名肖力在距南昌50多公里的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毛主席十分关心她的情况，常向了解情况的人问起她的表现。由于毛泽东要处理的事情太多，看望女儿的日程一直没能排上，最后带着遗憾离开南昌。

9月3日，专列到达杭州，主席住在西湖边上的刘庄1号楼内。陈长江还是老习惯，布置警戒，查看周围环境。不久，陈长江觉察到，毛主席这次在杭州的情绪越来越不安，常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见主席这样，陈长江他们也觉得很不安，尽管并不理解为什么。

杭州，是毛泽东常来的地方。每次在杭州小住，他对浙江省委、省公

安厅的同志不仅很尊重、很爱护，也很有好感。这次，那些他熟悉的干部都靠边了，整个杭州的外围警备系统都是由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负责，而毛泽东对陈励耘表现出厌恶。有一次，陈励耘到毛泽东住处看望，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当面问他：“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广州的顾同舟，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把个陈励耘弄得狼狈不堪，支支吾吾。

9月8日午夜，大家刚吃过晚餐，毛泽东突然通知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铁路专运线上的3辆专列，趁夜转移至杭州和上海之间嘉兴近旁的一个叉道上，离杭州足有百余里。

9月10日中午刚过，毛泽东忽然对陈长江说：“现在把火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往哪里走？没有说，只是交代说：“不要告诉陈励耘他们，也不要他们送行。”

考虑到复杂的情况和并不明了真正的敌人是谁、在哪里，为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陈长江安排前卫车和后卫车分队人员提前进入车站，因为前卫车需提前几分钟开行，后卫车要控制车站进出口和登车地点。同时，陈长江留下30余人随自己跟主席一起行动。一经布置，人员很快均已就位，做好了开行的准备。下午3时，专列离开杭州车站，向上海方向急驶。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下令提前离开杭州，汪东兴曾回忆：毛主席在刘庄的工作人员中，有人将陈励耘布置的向他汇报毛主席活动情况的特殊任务，报告给了毛主席。在杭州的一位与毛主席交往甚多、友情很深的领导干部，托人给毛主席捎去口信说，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停在笕桥机场支线上的毛主席专列“碍事”，妨碍他人走路，暗示毛主席“请速离开”。毛主席起初听到，还有些纳闷：这会妨碍谁呀？但这些异常情况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当机立断，下令离开杭州，虽然他这时还不知道林彪的政变

阴谋计划。

当日下午6时许，专列顺利驶抵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往常，毛泽东每到这里都要下去住几天，这已是20多年来的习惯了。因此，陈长江按惯例做了主席下车的准备。列车停下来了，毛泽东却没有下车，而是立即把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找到火车上来，或开会，或谈话。陈长江记得到车上的有马天水、王洪文等，毛主席与他们谈了约一个多小时，这几位就下车回去了。陈长江回忆说：“我们在火车上吃晚饭，并安排过夜。汪东兴在晚上八九点钟时，把我们几个找到一起，包括秘书、警卫在内，要求我们严密部署列车周围警戒，重点部位要加设双哨，干部要加强值班。我们一下加了五六个哨，还增设了一个由3人组成的巡逻哨，并让配上冲锋枪。”

11日中午，专列从上海火车站开出，晚6时许到达南京下关车站。专列在这里完成加煤、加水 and 检修任务之后，仅用了15分钟，便又启动了，向北疾驶。按往日习惯，通常要在蚌埠、徐州等车站停顿，这次却不同于往常，一路不停，跨过黄河，直奔天津。在这里，既没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仅停了15分钟加煤、加水、检修机车，便出发了。

12日13时许，专车驶进北京丰台火车站，停在这里。毛泽东往常外出，从来没有在这里停过，这是为什么？正在陈长江纳闷时，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治委员纪登奎和北京市委书记兼卫戍区政治委员吴德、司令员吴忠登车进到主席的车厢。原来，一直在路上思考同林彪一伙斗争的毛泽东早就安排好了在这里同李德生等几个谈话，意在首先了解北京的情况，同时也给他们谈一些防止林彪一伙搞极端行动所进行的种种必要部署。很多年后，陈长江才知道这些真实的情况。

两个多小时后，李德生一行才离开，陈长江送走了他们。李德生立

即部署了一个师的调动。当晚7时，专列才接到向北京站开进的命令。不久，陈长江随毛泽东顺利回到了中南海。返回后，陈长江安排好哨兵及值班人员，交待完注意事项后，已是晚上10点多了。

由于好几天没有休息好，陈长江回到家躺下就呼呼地睡着了。可是，才睡着不久他就被警卫中队游泳池值班室派人来叫醒了。有些疲乏且有些不高兴的陈长江赶到游泳池值班室，见汪东兴和中办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已提前到达，看到他们神情庄重而严肃，陈长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汪东兴说：“林彪逃跑了，是乘飞机跑的。”

陈长江一听，受惊不小，急躁地问：“他怎么逃了？逃到哪里去了？”那情绪，似乎恨不得立即带队把林彪追回来。汪东兴说：“林彪反对毛主席，他乘飞机逃跑了，别人也不好拦呀，也拦不住呀，逃到哪里了，还得等一等才知道。”

通过不断接收的情报，陈长江逐渐了解到：林彪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向西北方向飞去。沿途雷达站开机跟踪，不断地把最新情况报到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处，他又不断地把汇合分析的情况告诉游泳池值班室。刚刚睡下的毛泽东也被叫了起来……

9月13日凌晨1时许，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乘汽车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听说总理要来，陈长江急忙去门口迎接。汽车刚停稳，陈长江就急忙上前拉开车门，周恩来匆匆下车后，与前来迎接他的汪东兴简单低语几句，便一起进了毛泽东的卧室。

这时，陈长江已通知警卫中队指战员迅速起床待命，常用的几辆汽车也已调来，做好了充分的应急准备。

20多分钟后，周恩来、汪东兴从毛泽东的卧室出来了。周恩来的心

情很沉重，但眉宇间已开朗了很多。他对张耀祠和陈长江等说：“主席说了，林彪逃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东兴向周恩来请示说：“主席怎么办？他的安全问题……”周恩来略加思索后说：“先转移到大会堂，那里条件好一些，以后看情况再定。”

送走周恩来后，陈长江开始做转移到大会堂的准备工作。据陈长江回忆说：“毛主席行动一向轻车简从，除几只书箱之外，没有多少特别的东西，再加上我们刚外出回来，有的行李还没有打开，转移起来有一定的基础。”

准备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到凌晨3时许，毛泽东便起程往大会堂转移。陈长江注意到，毛泽东从卧室出来后脸色不好，有些生气，也显得精疲力竭。很快，毛泽东住进了大会堂118厅。周恩来没有休息，他不时过来与毛泽东交谈，报告最近、最新的情况。

14日下午，陈长江只见一向注意仪表的周恩来穿着睡衣和拖鞋，疾步走向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周恩来见陈长江等人在门口，掩饰不了喜色，说：“终于有了结果，终于有了结果。”说着，便进了118厅。原来，林彪等人乘坐的飞机在13日凌晨2时许飞出国界，进入蒙古境内，机影便在我军雷达屏幕上消失了。从此，大家开始经历那段极为令人不安的时间。现在，我国驻蒙使馆发回消息判明，在蒙古东部的温都尔汗附近坠毁一架三叉戟民航客机，机上人员8男1女全部死亡，机号是256。

1个多小时后，周恩来从118厅出来，高兴地对陈长江等人说：“林彪摔死了，折戟沉沙，机毁人亡，坏人是没有好下场的。我们取得了胜利。毛主席说，这是处理林彪事件最理想的结果。”说着，周恩来同在场的每一个人握手，表示“有些事情还要继续查清”。

陈长江记得，当天晚餐时，大会堂还给大家加了菜，他理解这是表

示欢欣和庆祝的一种方式。

陈长江回忆道，“九一三”事件后的一天，天将破晓，毛泽东睡不着，出去散步。陈长江像往常一样，急忙跟在毛泽东的身后往前走。到了门口，毛泽东看到门卫哨兵，便问：“长江，你们哨兵带枪和子弹没有？”

听主席这么问，陈长江不由一惊，以往的毛主席可不是这个样子啊！陈长江清楚，毛主席一向不喜欢警卫布置上那种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摆架子、抖威风的做法——为使警卫结构合理，一般来说警卫分队不仅人数尽可能要少，哨兵大都身着便装，不带明枪，当然短枪是有的。

毛泽东面前的这个便衣哨兵，两手空空，就像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一般。熟悉情况的毛泽东一眼望去，就知道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警卫战士。在陈长江印象中，毛泽东对于执行警卫任务的哨兵带不带武器弹药这方面的问题，很少在意，更没有问过，因为主席对自己的安全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什么担心，他对警卫战士的忠诚和能力也是完全信任的。

对于主席的提问，陈长江回答说：“带了。不仅带了手枪，还带了冲锋枪和机关枪呢，子弹也带了很多，敌人来一百两百，能对付得了！”毛泽东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说：“有坏人，要提高警惕……”

陈长江注意到，毛泽东没有再往下说，也再没有问任何事情，只是沿着院里的林荫小道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

## 十 身体状况与日俱“衰”

1972年1月的北京，气温很低，寒冷异常。这个时期以来，毛泽东外出活动也多了起来。由于连续外出，过分劳累，心情欠佳，大大地超过了他的承受力。1月13日，由于肺心病的作怪，毛泽东高烧不止，产生了严重的缺氧，突然休克了。护士长吴旭君有些措手不及，大声喊道：“快来人呀！快来人呀！……”

陈长江等应声赶到毛泽东的卧室，只见主席躺在床上，像平日常看到的那样，他似乎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一动也不动。陈长江目睹这一切，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著名心血管专家胡旭东赶来了，他赶忙上前把毛泽东扶起来，有节奏地在他的背部捶打，进行人工呼吸，还不停地大声呼唤着：“毛主席，毛主席……”陈长江和在场的人都随着呼唤起来，好像要把毛泽东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呼唤回来似的。

周恩来得悉毛泽东发病的消息后，甚为着急，他立即从西花厅驱车赶来。陈长江急忙出去在门口迎接。当他打开车门请总理下车时，只见周恩来脸色煞白，没有一点血色，两手微微颤抖，腿脚也不听使唤，许

久下不了车。见总理如此，陈长江既着急，又使不上劲，只是不安地想到，主席还没有抢救过来，总理又这样了！

周恩来被搀扶着走下汽车，来到抢救毛泽东的现场，恰在此时，毛泽东经过一阵紧张的救治，终于有了微弱的呼吸，慢慢地苏醒过来。毛泽东看到面前那些医疗器械，看到周恩来那张因过分紧张而显得苍白的脸和紧锁的眉头，看到他所熟悉的一张张面容，看到面前这一切既熟悉而又陌生，他显得愕然而不解，望着大家，似乎在问：“这是怎么了？这里发生过什么？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周恩来见毛泽东的状况有所缓和，他却显得非常疲乏，几乎力不能支，陈长江见他挣扎着，俯下身去在毛泽东耳边轻言细语些什么，安慰他。毛泽东连连点头，几乎是一语一应。

周恩来一再嘱咐，让毛主席好好休息，便退了出去，向有关人员做了交待才离去。陈长江回忆说：“林彪出逃之后，毛主席一连几天没合过眼，很少说话。1972年1月，陈毅去世，毛主席再次受到打击。一连串的挫折，太多太多的刺激，给他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损害。从那以后，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甚至也不想见任何人。”

第一次休克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又犯过一次休克。根据毛泽东前后两次休克的严重情况，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4人组成的主席医疗领导小组，后来又增加了邓小平、华国锋，并在原来医护人员小组的基础上，增加了几位医生和护士，以进行具体的医疗值班和护理操作。陈长江说：“当年，外界只知道毛主席‘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根本没有谁会想到，那时的毛主席已是重病缠身了。”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虽然与日俱衰，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的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主席。

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对此，这位八旬老人面对着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能拒绝吗？犹如人不能拒绝空气一样，他也不能拒绝这个热忱的世界。

1973年春，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外交活动达到了巅峰。而此时，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越来越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周恩来非常着急，他除了及时了解病情和指导眼科专家为主席会诊外，还告诉摄影记者拍摄毛泽东和



1974年，陈长江（前左二）与周恩来等在杭州。

外宾会见的照相时间，必须严格限制在3分钟以内，多1分钟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另外，周恩来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镜送给了毛泽东。他在写给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封信里说：“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请告诉我，给主席重配。”陈长江在接受采访时感慨道：“周总理对毛主席的爱护和关心真可谓入丝入毫，点滴不漏。”

1973年11月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决定马上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陈长江回忆说：“当时，周总理同惠特拉姆总理从大会堂出发，同乘一辆红旗轿车，来到中南海。在门口值班的我，见车一停稳便上前迎接。周总理请惠特拉姆先下车，然后两位总理兴致勃勃地一起走进毛主席的书房。王洪文作为党的副主席，也陪同会见。在我看来，这是毛主席有意要培养他，让他有机会接触外交事务。”

这次会见，在照完相、拍完见面电视镜头之后，记者都退了出去，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喝着茶，告诉客人说：“我今年80岁了，腿脚不便，走路有些困难，听力也不好……”听到一向自信的毛主席今日在外国人面前讲出这样的话来，陈长江吃惊不小。

惠特拉姆见毛泽东精神状态不错，握手也有力，不由得赞赏说：“使人感到你不到80岁……”毛泽东和周恩来笑了。很快，宾主双方在欢快的笑声中切入正题。看到正式会谈开始，陈长江等工作人员退了出来。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说：“跟我一起走出门吧。”陈长江注意到，尽管毛泽东走路困难，还是坚持把澳大利亚总理送到客厅门口。

进入1974年以后，毛泽东的身体一直就不大好，往往是旧疾未除，又添新病，日子过得很艰难。陈长江说：“当时，毛主席病到什么程度，连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许多人都不知道，只有少数政治局有关领



1975年4月18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后和警卫干部（左二为陈长江）等合影。这时，毛泽东因患白内障，双目几乎失明。

导人和他们领导的医疗组专家们知道。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当然知道，但谁也不准对外讲，因为毛主席不想让外界知道，他还是顽强地一次又一次地坚持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

1976年5月27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毛泽东有生之年最后一次会见外宾。陈长江记得，当时任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陪同客人到游泳池时，毛泽东就没有站起来，只是坐在沙发上

对这位友好邻邦的政府首脑表示欢迎。陈长江说：“毛主席尽管对他们很热情，很友好，可是他的身体实在坚持不了，这次会见只进行了15分钟。这可以说是毛主席会见外宾最短的一次。”此后，中央决定毛泽东不再会见外宾。

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在1974年和1975年每年都要接见外宾20余次，1976年的前5个月会见了6次。陈长江说：“在这些会见中，我常看到毛主席会见外宾时看不清人家的相貌，与人家握手时连人家伸过来的手都看不清，不能准确地握住，而是慢慢地摸着握。他那个困难劲啊，叫人看了，真心酸。”

## 十一 难忘的最后岁月

1975年底，周恩来的病情恶化。他已进行了6次大手术，却未能出现人们期待的那种术后病除的喜人奇迹，恰恰相反，他的病情日益严重起来。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担心，连讲话都困难，工作人员有时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他所要表达的意思，行动更是困难，如果没有人搀扶，他连一步都走不动。

两位伟人同时处于重病之中，他们的病榻相距不远，然而却被一堵红墙和西安门大街的柏油马路无情地隔开了。一个在北海西岸305医院内，一个在中南海西岸的游泳池旁，他们情有所往，不忍相见，无力相见，也永远不能相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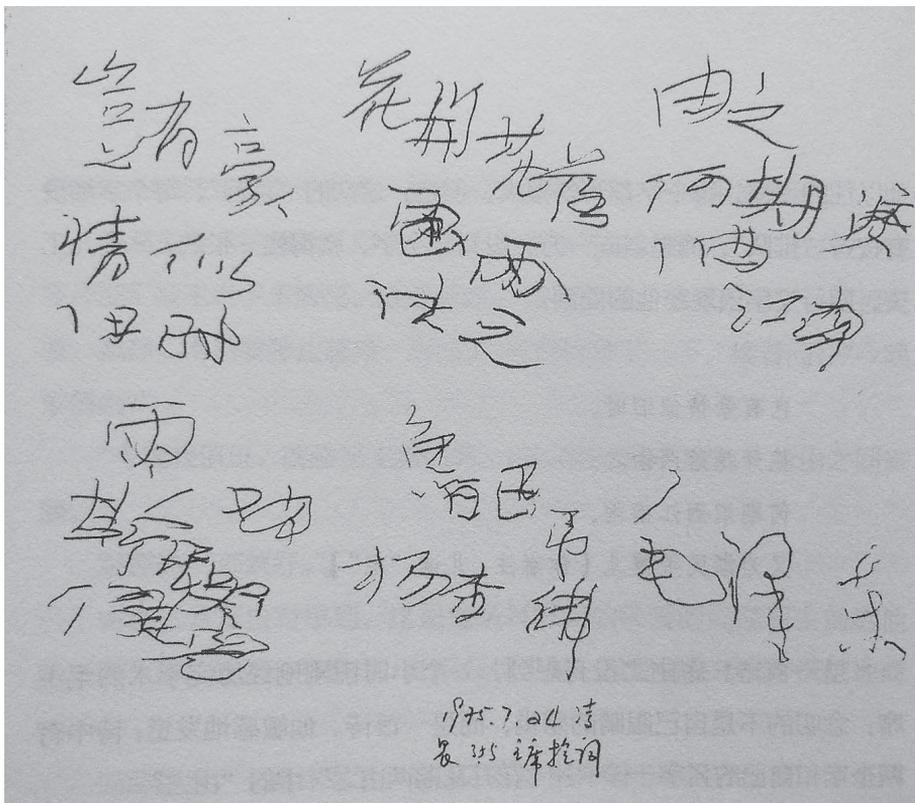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上午10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听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晚他几乎彻夜未眠。

在中南海的值班室里，张耀祠偷偷地向陈长江等讲起令他心酸、不愿启齿的周恩来逝世的噩耗时，所有人的眼眶里都汪着泪水。当张耀祠到游泳池向毛泽东报告这一噩耗时，毛泽东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对于周恩来的逝世，毛泽东显然早已预料到了。周总理的病情在近几年的医生报告中早有体现，长期的伤感使毛主席的眼泪枯竭了。此时，他已无法向这位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表露自己内心的悲伤和痛苦。

这年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毛泽东嘱咐要办好后事。老战友接连离去，对毛泽东一次次予以打击，他的健康进一步恶化起来。

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的强烈



1975年7月24日凌晨3:55分，刚做完手术仍蒙着眼睛的毛泽东盲写下鲁迅悼念杨杏佛的诗，签名后送给唐由之。

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陈长江回忆说：“当时，强烈的地震使我从酣睡中惊醒，大家都十分惊恐，余震不断，我的妻儿也被那罕见的天象吓得不知如何是好。”陈长江也顾不上什么，骑上自行车，顺着摇晃震颤不止的小胡同，不顾一切地直奔中南海游泳池，因为他明白自己有更为紧迫的任务要处理。

游泳池更衣室建筑太陈旧，在余震之中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连警卫值班室的电灯都在晃动。陈长江心想，建筑一旦被震塌了，伤了人，怎么向国人交待？可是这时的毛泽东，事实上早已进入特护阶段，整日不能离开医护人员。医疗组不断发出警告，根据主席的病情，任何的移动都会对他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

随后赶到的华国锋、王洪文等，对转移与否一时也定不下来，后经中央领导几次研究决定：将毛泽东转到不久前新建的一处平房“202”（工程代号）。于是，陈长江着手组织人，从值班人员里挑选了6名精干、细致的干部，由自己带队搬迁，医护人员配合，汪东兴等跟随。

7月29日，陈长江进入毛泽东的卧室，见他苍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显然已处于昏迷或者半昏迷状态，谁进去了他已不能觉察。看到毛泽东鼻子上还插着一根鼻饲管，随着缓慢的呼吸，那根管子一动一动的，陈长江有些心酸，不忍多看。

这天上午10时许，陈长江等6人用布单做成的软担架，把毛泽东小心翼翼地抬进了新房子……

8月18日，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毛泽东十分难过。随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上留下了自己的手迹。这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9月2日，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陈长江回忆说，医疗组和身边

工作人员，还有在那里值班的中央领导都很紧张。可是，作为主席夫人的江青对毛主席的病情漠不关心，关心的是主席百年之后自己所谓的“事业”。这一天，江青来请示毛泽东说，她要去大寨，半昏迷状态的毛泽东表示不同意。于是，江青再次报告，硬要毛泽东同意她去。“江青到了大寨后，做了一通报告，胡乱自我吹嘘了一番，无所顾忌地打击不同意见者。9月5日晚上9点半，毛主席突然丧失神志，江青接到电话后很不情愿地回到北京。”

毛泽东病重期间，在以前医疗护理小组的基础上，中央设立领导人值班制度，中央常委每两人一班，保持主席身边昼夜都有人。陈长江记得“王洪文、汪东兴是一班，张春桥和华国锋是排在一起的。当时，许多人的心情都很压抑，精神负担很重，寸步不离，可是王洪文与众不同，他常到中南海那里钓鱼，用小口径步枪打树上的斑鸠，我还得派一名值班干部为他端小杌子、拿鱼饵、提鸟枪。张春桥对毛主席的健康、医护等不闻不问，坐在沙发上边抽烟边看自己带来的好多书。”

9月7日，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陈长江记得，这天下午，中央领导都到齐了，聚集在202南大厅开会，中心议题是主席的后事。“9月8日，毛主席已进入弥留状态。这天，江青蹿到毛主席的卧室，不顾毛主席的病情，也不听医护人员的劝阻，以给毛主席翻身为由，寻找可能留下的遗嘱和文件柜上的钥匙。这么一折腾，致使毛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医护人员不得不实施抢救，但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江青则像没有事似的，到别处荡去了。”

从9月7日到8日下午，已在病危中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根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可以看出：“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





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8日下午4时37分。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30分钟,这离他去世只有8个多小时了。这天下午六七点钟,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他的生命。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他已完全无法说话。当晚,他的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他说

1975年9月2日,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后,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右一为陈长江)。这时,毛泽东恢复了部分视力,非常高兴。

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翕着，但很难听到他的声音。叶剑英拉着毛泽东的手，紧紧地握住，不停地向他点头。

此时，叶剑英虽能拉住毛泽东的手，但无论如何也拉不住毛泽东的生命……

## 十二 站好最后一班岗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经连续4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陈长江说：“毛主席去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待过遗言。对他个人身后事的处理，他没有作任何交待，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想法，怎么处理请后人定夺，他并不在意。”

当天晚上，大家都没有睡。中南海202室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在那里开会，从深夜1时许一直开到黎明时分，讨论的问题仍然没有定论。陈长江回忆说：“在会议室门口值班的我们，不时往里面送些开水。从断断续续听到的议论，主要争议还是毛主席身后事的安排，遗体的处理，发丧的形式、规模，是否邀请或者允许外国代表团前来吊唁。会议的气氛与其说是讨论，倒不如说是争议，说话声音很高，观点明显对立，情绪也很激动。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毛主席所倡导的，中央也早有规定的，中央领导人的遗体应实行火化；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毛主席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的遗体应当永久保留。几个小时过去了，讨论仍然没有结果，连医疗组的专家和我们这些做警卫工作的都很着急。当然，医疗组的专家知道在当时时间很重要。”

最后，还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提出分两步走：先做遗体的保护，这是必需的，以利于进行发表、吊唁；然后再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进行研究决定，或火化、或保存，都是可以的。时下当务之急是对遗体实施防腐处理，否则连发丧期的几天都难以维持下去。就这样，统一了与会者的认识。于是，布置各项工作，分头抓紧落实。陈长江记得很清楚：

“汪东兴从会议室出来，行色匆匆地到我们值班室打电话到卫生部，找专家来研究下一步工作。因为时间紧迫，他说话很急，对方大概也缺乏思想准备，他讲的那些话对方怎么也听不清，不得不反复问答了几次，才算是传达下去。”

当天，汪东兴把张耀祠和陈长江找去，交待说：“毛主席在世时，他的警卫工作一直是你们一中队负责的，现在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毛主席遗体的警卫任务仍由你们一中队担任。”汪东兴还特别对陈长江强调说：“你们要和毛主席在世时一样，要严肃认真地做好这项工作，这也是非常光荣的……”

很快，陈长江从一中队挑选了20多人，召集大家进行了研究，着重让大家明确配合卫生部专家的工作，做好遗体的住地警卫和护送工作。陈长江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含着泪水，忍着悲痛，完成领导交付的每一项任务，做好交办的每一件事情，哪怕是非常细小的工作。”

9月11日夜里，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出中南海了，毛泽东就要永远离开这个他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

毛泽东的卧室里灯火通明。壁灯、吊灯都打开了，照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这里从来没有聚集过这么多人。毛泽东生前，他的卧室里没有特殊准许从不让别人进来。此时，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等都来了……

陈长江说：“毛主席遗体的转移，车队的组成几乎和毛主席生前外出时一样的编排。前卫车6个人主要负责安全，保证顺利通行，后卫车也是6个人，不同的只是中间的主车不是往日的轿车了，而是一辆灵车——车体宽大、顶部较高。我组织8个人用担架将毛主席的遗体从202室抬出，上了灵车，并与卫生部的专家们配合，守护在遗体的两侧，防止在行车中对遗体造成任何的损害。在后卫车之后，是华国锋等护送毛主席遗体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车。”

灵车从中南海西门缓缓开出，由几辆小车护送着。在仲秋的深夜里，在府右街的路上，车队缓缓前行，向着人民大会堂驶去。府右街、长安街，这样的宁静，两旁的树木，沐浴在清冷的银色月光下，一动不动，那一夜，街道两旁是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的战士们，显得格外严肃。

灵车前的黑色纱幔在秋风里飘动，没有哀乐，没有哭声，只有沉寂，只有凝重，车队缓缓向前流动。灵车队终于到达人民大会堂北门。按治丧委员会的安排，将在大会堂北大厅举行群众性的吊唁。

大会堂北大厅里，此时已是灯火通明，毛泽东的遗体被抬下来放在大厅中央早已摆放好的平台上，一面党旗覆盖了伟人的身躯。接着，又盖上了水晶玻璃棺罩，在水晶棺的四周摆放了鲜花翠柏。

从当天上午起，一周内，各界群众代表和党政机关干部到大会堂吊唁、瞻仰。在那些为毛主席去世而举国哀痛的日日夜夜，陈长江没有离开过毛泽东的遗体，护灵、守灵，还完成了许许多多临时安排的具体任务。陈长江注意到，不少人走过毛主席遗体旁边时失声痛哭。

9月18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活动结束后，毛主席的大女儿李敏因为过分悲痛而晕厥了。张耀祠要我调车并亲自把她送回家。”



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9月20日凌晨4时，毛泽东的遗体再次转移，暂时安置在一个叫做“769”的地下室进行保存。“在这次行动之前，汪东兴和张耀祠找我们开会说，根据中央的决定要建毛主席纪念堂，在那里存放毛主席的遗体，供后人纪念瞻仰。纪念堂的建设可能要1年时间，这之前保护毛主席遗体仍由一中队负责，并指定由我负责，还强调要保密，这里的情况不能向任何人讲。”

这个代号为“769”的遗体保护室原来是某医院的地下手术室，设施完善，医疗条件齐全。按照遗体保护的要求，又对每个房间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一个密封、隔氧、低温的环境。在保护室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

盛放遗体的钛金属容器。容器里盛满了药液，遗体就浸泡在药液中。遗体保护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问题，最重要的当然还是防腐。不仅仅要遗体不腐坏，还要注意遗容的颜色、神态。要长期保存，遗容就不能进行化妆，任何化妆品对遗体都是一种损害。陈长江说：“毛主席的遗体在这个地下室安置好以后，在这里生活的连卫生部的专家在内共有三十多人，大家的吃、住等一系列问题也很快得到妥善的安排。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国锋、叶剑英等几次来‘769’询问卫生部专家遗体是否有变化，同时也安慰和鼓励大家做好工作。”

毛泽东主席就静静地躺在这里，没有谁再打扰他的安宁。一直到这年10月6日深夜，一队匆匆而来的人站在了他的面前。他们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张耀祠……

没有任何信息和通报，首长们如此密集地出现，一定意味着什么重大情况的发生。守卫在毛泽东灵前的陈长江有些紧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不能询问，只能注意观察。他所看到的来人的表情，似乎与这地下室里的庄重与肃穆有些微的差异，因为他看到首长们的神情有一种压抑着的兴奋与紧张。

没有人说话，也没有安排站位，而这在平时是很严肃的大事儿。只见首长们站在毛泽东的遗体前，鞠躬、默哀。随后，陈长江只听到华国锋喃喃有词，像是向主席报告重大事情：“主席，我们执行了您的遗愿，一举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请主席您安息吧！”

首长们再鞠躬后，匆匆离去。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地下室口那幽暗的灯光处。

望着首长们的背影，陈长江如坠五里云中。他自进入“769”后，所接到的指令就是“保密，不要向任何人说起这里的事”。由于与外界的隔



毛泽东生前穿过的布鞋。



毛泽东游泳时用过的水温计与草拖鞋。

绝，自然“地上”的事他也全然不知。“四人帮”这个词所指何人他也知道，却不知是什么“问题”，更不知是怎样“解决”的和“解决”了什么。

离去后的华国锋等人，立即驱车上了玉泉山。华国锋到达9号楼时，已经接到电话的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政治局成员，已经在会议室大厅里等候。

政治局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叶剑英向与会人员报告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会议进入议事程序后，全体人员一致同意：一、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二、通过（1976）第16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通报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

当天晚上，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如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都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表示赞成。这样，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是完全一致通过的。鉴于政治形势的复杂，为安全起见，当天晚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住在玉泉山。

直到后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开了，陈长江才慢慢懂得了华国锋、叶剑英等那天深夜来“769”的原委。就这样，日复一日，陈长江等在毛泽东身边过了1年。“在卫生部专家进行有关遗体保存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具体技术操作时，我们则根据他们发来的指令对停灵房间的温度、湿度进行监测和控制，还有那些消毒、杀菌一类的工作，不管是在脏的、累的，还是在呛人的、对健康有害的环境里，我们的同志都知难而进，心甘情愿，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件事，就像毛主席在世的时候那样。”

经过近1年的紧张施工，毛主席纪念堂建成并交付使用。1977年8月20日，是决定把毛泽东遗体转交纪念堂的日子。这天凌晨1时20分，陈长江等4人穿上防毒衣，戴上防毒面具，直入“769”室内，把毛泽东



1978年9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广州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右二为陈长江）。

遗体抬上灵车。

运载遗体的车辆从“769”出发，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驶向毛主席纪念馆。陈长江回忆说：“到了纪念馆，依然是我们4个人，穿戴好防毒装，把新做的水晶棺抬到密封的消毒室，在徐静等卫生部专家的指导与密切配合下把毛主席遗体安置好。当天上午，遗体移入水晶棺内，我们换了衣服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过来与我们一一握手、问好，说：‘……代表政治局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多年来保卫毛主席，也感谢你们这1年保护毛主席的遗体……’”

护送毛主席的遗体前往纪念馆，让他老人家在那里安息后，陈长江和警卫分队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我从1950年来到中央警卫团，到这时，



2013年4月，李讷夫妇、陈长江夫妇及毛小青等在河南洛阳。

在毛主席身边已有27个年头。离开他时，我真想放声大哭一场。”

自1962年毛泽东取消了卫士和卫士长后，由陈长江所带领的一中队接替了保卫任务，“我全权负责毛主席的警卫、日常生活工作。尤其是‘文革’10年期间，毛主席每次外出巡视和接见国内外友人，都是由我负责警卫工作。”

1958年，因多年警卫工作无事故，成绩突出，陈长江出席了公安军模大会，被授予三等功。1968年，陈长江出席总参学习毛主席著作表彰大会，被评为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在毛泽东身边的20多年里，陈长江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和毛泽东的称赞，在毛泽东眼里，他“忠诚、老实，反映情况可靠”。



毛泽东原警卫队长陈长江。

毛泽东逝世后，陈长江在1977年负责保卫过华国锋参加大庆会议和出访朝鲜的警卫工作，1978年负责保卫邓小平南巡和出席军委（广州）扩大会议的工作。1985年起，陈长江任中央警卫局办公室副师职参谋，并兼任毛泽东故居开放办副主任，于1987年底离休。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个历史底蕴极其深厚的人。他喜欢研读历史，尤其是《二十四史》。毛泽东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毛泽东对《二十四史》中的一些重要篇章反复研读，并写下了大量评注。读史可以明智，评史更可知兴替。在陈长江看来，毛泽东跟所有人一样在读书，又跟别人不一样，他是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政治家、实干家在读书——毛主席跟所有人一样，读《二十四史》是想要了解历史，又跟别人不一样，是想着如何从对历史的了解来在行动上变革现实。

在晚年，陈长江每有空闲常读一读《二十四史》，尽管由于文化水

平不高，读起来挺费劲儿，他还是坚持往下读。因为毛泽东曾经对他说，他应该读一读《二十四史》。陈长江说：“毛主席读史最主要的是想为现实服务，古为今用。”

## 第四章

# 行摄红墙的“红色新闻兵”

中南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所在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居住和办公。1964年7月的一天，钱嗣杰接到通知，被告知自己将进驻中南海给毛泽东主席当专职摄影师。那时，他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一年，他36岁。

笔者是在多年前，一次次走近红墙摄影家钱嗣杰。接触中，才知钱嗣杰步入摄影界是阴差阳错。上世纪40年代，本想报考空军、当一名飞行员的钱嗣杰，被组织上安排学习摄影，成了一名战地记者。深入战场一线，意味着以身涉险。当年，战士们都说：“钱嗣杰一来，就要打大仗了。”大仗，就是苦仗、硬仗，别人双手拿枪，他则是一手提枪，一手提着照相机奔走在枪林弹雨中，拍摄下一个个带血的瞬间。因为他深谙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这样一句名言：“如果你的作品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为了拍出优秀的战地新闻图片，钱嗣杰不怕牺牲，走得离现场近些、更近些。“东北人民解放军三下江南”、“围困长春、吉林”、“辽沈、平津战役”等一个个精彩瞬间，都是钱嗣杰用生命与忠诚换来的珍贵镜头。

在朝鲜战场上，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驱车往返于平壤与开城之间，抓拍血与火的镜头。尤其在板门店谈判期间，他作为中外记者代表团里唯一一名自

始至终的摄影记者，见证了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全过程。

逃过“克什米尔公主号”一劫、受命拍摄“空中禁区”的首航、加纳政变之时随周恩来出访……历史学家用笔书写着历史，而钱嗣杰则亲历着传奇，用相机真实记录着历史，那一张张新闻老照片承载着诸多特殊年月的风云变幻。

走进中南海那高高的红墙内，一部小小的相机成就了钱嗣杰辉煌的人生。毛主席畅游长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科学的春天……一个个经典的瞬间，一段段珍贵的回忆。千千万万个瞬间汇集成一条壮观的历史长河，记载了共和国前进的足迹。在这一张张照片后面，连着同一个名字——著名新闻摄影家钱嗣杰。然而，钱嗣杰只说自己是新闻摄影界的普通一兵，笔者笑言他是“红色新闻兵”。

眼前这位原中央新闻组组长兼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副组长给世人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永恒瞬间。似乎他那只稳健有力的手与常人并不相同，不然，为什么同样的相机，甚至他用的是更加简陋的摄影器材，然而在他的手中，拍摄出来的照片总是比常人高超得多？

## 一 红色摄影家早期的苦难与辉煌

民国十六年（1927年），山东平阴全境被划为战区，各地均驻满军队。由于连年遭受旱、雹灾害，曾经闻名遐迩的“玫瑰之乡”平阴的玫瑰花大片枯死，产量大减。钱乐恩眼见民不聊生，在当地生活十分拮据，于是做通父辈和兄长的思想，表示要到外地闯闯，寻一条活路。恰在这时，他接到东北黑河一位朋友的信函，动议他到那里谋生。

行前，钱乐恩一一拜谢亲朋好友及左邻右舍这些年来对自己的关照，并一再嘱咐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照顾好年长的父母，自己一定在外面努力闯荡，混出个人样。老母亲泪水涟涟，从屋子里拿出几瓶家乡产的“玫瑰酱”和当地酿造的“玫瑰酒”，对钱乐恩说：“三儿呀，在外面也很不容易的呀！你们一家人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特别是你的媳妇马上就要生产了，更需要你的关照……”说着，老母亲拉着儿媳的手，恋恋不舍。

故土难离，手拿母亲给的家乡特产，钱乐恩也十分激动。他不由得含泪吟诵起当地流传的《平阴竹枝词》：“隙地生来千万枝，恰似红豆寄相思。玫瑰花放香如海，正是家家酒熟时。”尽管平阴玫瑰栽培历史悠久，始于汉朝，而此时因灾产量锐减，花农难以度日。

上路了，为生计所迫的钱乐恩挑着担子，一头挑着五六岁的女儿钱麟瑞，一头挑着家什，有身孕的妻子钱李氏则在后面紧跟着，踏上了上背井离乡“闯关东”的路途。

千辛万苦，数经辗转，钱乐恩一家三口终于来到了地处中国东北边陲的黑河，这里以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隔江相望。到了黑河，已是冬季，相对平阴的宜人气候而言，这里寒冷干燥，钱乐恩不由得有些失落，然而眼下生计问题要紧。好在朋友已给自己找了房子，很快就安顿了下来，并找好了一家金矿，在那里当采矿工人，生活总算有了着落。

1928年1月11日（民国十七年农历腊月十九），刺骨的寒风裹挟着鹅毛大雪无情地袭扰着黑河这片同样贫瘠的土地。这天清早，贤惠勤劳的钱李氏和往日一样，天刚亮就起床，在灶前忙碌着给丈夫做早饭。她正要弯腰下蹲往灶门添柴时，只觉得腹部一阵剧痛，额头直冒冷汗。正在这时，钱乐恩走了进来，一看妻子的情形，心里已明白七八分。当即，钱乐恩把妻子扶进房内，让她躺在床上，并把附近的一位大夫请过来……

哇、哇、哇……一个幼小的生命伴随着一声声啼哭，降临到人间。他，就是后来的著名新闻摄影家钱嗣杰。

钱家“添喜”了！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很快传开了。邻里相好的朋友都过来看，带上给小宝宝的小衣服、小褥子，有的拿着鸡蛋、红糖之类的礼物前来道喜。作为主家的钱乐恩按老家平阴的习俗向他们一一回赠红鸡蛋，以示同喜。

尽管作为金矿采矿工十分辛苦，钱乐恩也能吃苦耐劳，可是收入并不高。一年多后，钱乐恩到一支帆船队当舵手，运输木材、粮食等。在多数人看来，驾驭帆船乘风破浪是浪漫的，其实船工特别是舵手的工作

是非常艰苦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钱乐恩十分清楚自己其实是船上的“首脑”——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掌舵时，有时动作幅度要非常大，使船帆受风，然后迅速再把帆推正；有时推舵的动作又要很细微，才能使船的航行保持平稳。如果舵推过了或者不到位，船帆会因为受到风力而不被推动，船速会减慢且只能凭着水流的力量漂行。舵手需要知道浪在哪里，如何平稳地驾驶帆船越过大浪，而不是和它们进行对撞。

尽管钱乐恩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只念过一两年私塾，但是他精明能干，加上特别勤劳，为人善良，船工们都与他相处得极好，还经常得到船主的好评。老实忠厚的钱乐恩，很乐于帮助他人，每有老乡到东北找他，他总是主动为他们找工作，给他们路费。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命令时任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日本侵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吉两省，继而进逼黑龙江。这一年，钱李氏病故。钱嗣杰和姐姐嚎啕大哭，向钱乐恩哭喊着要妈妈，钱乐恩十分心痛。

尽管家庭比较贫苦，但是童年的钱嗣杰没有得过什么病，相反却磨练出一副健壮的体魄。幼小的钱嗣杰，就像东北那些葱绿、充满生机的小白桦树一样，迎着阳光，茁壮成长。因为自己在船上工作，好几天才回一次家，无法照顾小孩，于是钱乐恩把钱嗣杰姐弟俩寄养在老朋友赵连璧家里，每月给他们送一些面粉、食物油。赵连璧夫妇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小孩，自钱嗣杰姐弟俩过来后，赵氏夫妇十分关爱他们，视为亲生。

1933年1月，日本侵略者占领黑河，成立伪黑河省。日本鬼子的“三光”暴行，钱嗣杰司空见惯，心底里萌生出一种信念：长大后，我要上战场，打敌人，保卫祖国。



1939年，钱嗣杰在黑龙江黑河留影。

钱嗣杰8岁那年，跑航行的钱乐恩发现三江平原腹地富锦相对比黑河生活条件更好些，于是打算移居富锦，考虑到赵连壁夫妇没有子女，便同意把女儿钱麟瑞作为他们的义女。离开黑河时，钱乐恩对女儿钱麟瑞说：“我在外奔波，居无定所，你也长大了，带着你不方便，我和你弟弟到另一个地方去，你就暂时留在这里，我们以后会来看你的。”钱乐恩的声音有些哽咽，懂事的钱麟瑞默默点头，钱嗣杰听说要到一个新地方去，少年不知愁

滋味的他还天真地对姐姐说：“姐姐，我们先走一步，不多久你也过去。”谁也没有想到，父亲所说的“暂时”亦成了“长久”，这一别就是十多年后的传奇寻亲。

由于世代贫困，钱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人，饱受着没有文化的痛苦。钱嗣杰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他要好好念书，只有有了文化，才可能真正有出息，才能出人头地。到了松花江下游南岸富锦不久后，钱乐恩领着钱嗣杰走进一家私塾，在孔老夫子的牌位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就此便取得了入私塾的资格。在塾师先生的教导下，钱嗣杰首先由《百家姓》学起，严厉的塾师规定他每日学5个字，

而且不仅要会读，还要用毛笔一笔一画地写“方块字”。《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学完之后，就是读“四书”、“五经”，兼读《古文观止》等，并开始学习“八股文”的写作，学规极严。讲课时，塾师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随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品评，然后学生听命复述。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一律须背诵。另外，私塾中体罚盛行，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和耳朵、打手心等。尽管钱嗣杰勤奋好学、记忆力甚强，也免不了遭受打手心等体罚。

日本侵略者自“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战争，陆续运兵入关。到1936年，日本已经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也全面爆发。钱嗣杰通过各种渠道听到“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等一个个响亮的口号，自己也热血沸腾。



20世纪40年代，钱嗣杰在黑龙江佳木斯留影。

念了两年私塾后，钱嗣杰考入富锦县立小学。学校开设有国文、算术、音乐、体育、公民（政治）等课程。接着，钱嗣杰考入富锦县立初级中学。中学国文老师说：“钱嗣杰，你的名字取得好，长大了要当‘豪杰’。”

20世纪40年代初，钱乐

恩带着儿子又一次迁居。他们迈着沉重的脚步，冒着飘落的雨雪，顶着凛冽的寒风，在泥泞的小道上前行，最终来到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汇流而成的三江平原腹地佳木斯。这里隔乌苏里江、黑龙江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比罗比詹相望，是中国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被誉为“华夏东极”。

佳木斯资源丰富，以黑土地为主，土质肥沃，可谓“鱼米之乡”，盛产东北大米、大豆、鲟鲤鱼、黑木耳、蕨菜、刺嫩芽等。精明能干的钱乐恩在这里安家不久就经营起了“蔬菜商店”。每天清晨四五点，钱嗣杰就随父亲到菜市场批发蔬菜，再去佳木斯国民高等学校（后与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及地方师范合并为合江省立佳木斯联合中学）上学。如何保障自己的货新鲜，顾客什么季节需要什么样的蔬菜，如何打价格差才有竞争力等，钱乐恩经营有道，尽管人累点，也能维持父子俩的生活。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钱乐恩与一位孙姓女子结为夫妻。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前创办的最早的几所学校之一，合江省立佳木斯联合中学有段红色的历史。中共三江地区的建党先驱唐瑶圃，曾经以教师的身份在这里秘密播撒革命火种；张耕野、董仙桥、冷云和陈雷等一大批抗日英雄、仁人志士，在这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后，义无反顾地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佳木斯联合中学学习期间，学校经常教唱一些自编的革命歌曲，钱嗣杰在进步青年教师的帮助引导下，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并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此时，他的视野渐渐扩大，思想逐渐进步，开始追求革命。

1945年8月8日下午5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下达苏联对日宣战通告，并当面宣布：从8月9日起

苏联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8月9日零点钟声过后，苏联红军兵分4路，越过中苏边界，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攻击。第1路苏军会同蒙古军队，取道满洲里，越过大兴安岭，突入东北中部平原，直插长春、沈阳，切断关东军与华北日军的联系；第2路苏蒙联军向承德、张家口和锦州方向进军；第3路苏军从东面突入东北中部平原，进击牡丹江、敦化地区，随后进攻吉林、长春、哈尔滨；第4路苏军从北部强渡黑龙江、乌苏里江后向齐齐哈尔、哈尔滨进军。

钱嗣杰通过广播听到苏军对侵略中国的日军宣战、并发起全线进攻的消息十分激动，心想好日子就要到来了，今后可以不必再四处漂泊了。每每想到胜利在即，他就想起心爱的母亲，感叹母亲没有坚持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这年8月12日，钱嗣杰决定到黑河去给母亲扫墓，祭奠至爱的亲人。途经北安车站时，火车停下不走了，所有乘客被勒令下车。大家都在候车室里等消息，都纳闷：“为什么不走了？发生了什么事？”无意间，钱嗣杰听到有人悄悄地说：苏联对日宣战后，苏联的部队打进来了，这里的日本鬼子投降了，要让他们先走。钱嗣杰将信将疑，没想到战事进展这么快。果然，到了晚上10点多钟，日本兵及其家属开始上火车，往回撤退。心想可能还要等几天，于是钱嗣杰放弃了扫墓，身着学生服的他走出候车室，趁人不注意爬上一辆货车，到达哈尔滨，之后辗转到南叉车站，再坐货车回到佳木斯。

在几路苏军迅猛的攻势下，日本关东军措手不及，仓促应战，不到一周，便被轻易击溃。8月14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关东军全线抵抗顷刻瓦解。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命令东北日军停止作战、向

苏军投降。8月19日，苏军占领齐齐哈尔。8月20日，苏军开进长春、沈阳、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这年11月，李范伍、李延禄等带领八路军进驻佳木斯，建立起人民政权。这一天，钱嗣杰一家十分高兴，好好做了几个菜，以示庆祝。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全面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早就把目光投向了东北。而这时，国民党为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确定了占领并独霸东北的战略，并在美国帮助下加紧从大西南往东北调兵。

1946年春，遵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些重要文化机关、大专院校迁来佳木斯市，大批文化、教育、艺术界的知名人士也随之而来。佳木斯一时成了“革命文化的摇篮”，被人们誉为“东北的延安”。从延安来的经济学家于光远、新华社特派记者刘白羽、著名作家萧军和周而复等人，都曾经来学校做过激动人心的报告，热情地宣讲革命道理。通过这些“延安干部”的言传身教，延安的精神、延安的革命传统深深地在这所学校里扎了根。这时，正在念高二的钱嗣杰更是向往革命。

在佳木斯联合中学读书的一天，语文老师路夫讲到革命形势的发展时，高兴地对学生讲到：“今年年初，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了航空总队，并创办了航空学校，校长是刘亚楼。这个学校利用从日本鬼子手中缴获过来的飞机，经改造后训练。我想，这批学员、这批骨干，今后应当是我们空军建设的中坚力量。”听到这里，钱嗣杰站起来，大声说：“老师，我立志要当一名空军飞行员。战机是祖国领空的守护神，当空军飞行员我感觉很神圣、很光荣，我渴望自己真的有一天能够与飞机一起翱翔在祖国广阔无垠的蓝天上。”路夫听了，十分高兴地鼓励钱嗣杰说：“有志气，当‘蓝天卫士’，好！不过，你现在要在学习上、思想上和身体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才有机会接受今后的挑选和考验。”钱嗣杰点了点头，

坐了下来……

到1946年6月，蒋介石运到东北的兵力已达15个军，计51万人。中国共产党就和平已尽最大努力，忍耐已到最后限度，于是解放战争的大幕拉开了。6月16日，中共中央调整东北局的领导班子，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5人组成东北局常委。

这年6月底的一天，东北民主联军因扩军而在佳木斯招兵。很多适龄的青年学生、工人、农民踊跃报名，钱乐恩想到部队管吃管喝，并按儿子钱嗣杰的愿望，送还没有高中毕业的他报了名，并顺利入伍。部队开拔的那一天，锣鼓喧天，披戴大红花的钱嗣杰频频向父亲和继母挥别。钱嗣杰没有想到，这次别后同样是在10年之后才得以与父亲重聚。

钱嗣杰当兵后，被分配在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当摄影员。当时，陈光任司令员（后为洪学智、黄永胜），赖传珠任政治委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刘其人任副政治委员，阎捷三任参谋长。当时中央指示，东北解放战争要记录，要用文字、摄影、电影等各种方式记录下来，并以此鼓舞民心。部队考虑到钱嗣杰有文化基础，于是把原本没有一点摄影技术底子的他引入到光影世界里。部队里当摄影员，就相当于当今的战地记者，主要是通过影像来记录部队的行动和战况。为此，曾想在蓝天白云中穿行、做空军飞行员的钱嗣杰阴差阳错与摄影结下不解之缘，无意间让他日后见证了一个个重大的历史瞬间，成为重大事件的记录者。

不久，组织上安排他到东北大学文艺研究班学习。可是这里没有摄影课，学的多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科目。两个月后，钱嗣杰等10多人被派到东北画报社学习摄影。

东北画报社是在原冀热辽画报社基础上建立的，直属中共中央东北

局领导。历任社长有罗光达、朱丹、施展，总编辑张仃，8开彩色胶印的画报于1945年10月创刊于沈阳，由于东北形势与战局的变化，先后迁往本溪、通化、佳木斯，1946年5月迁至哈尔滨，起初在道里经纬街13号办公。

东北画报社集中了摄影与美术人才，除出版以摄影为主的8开本综合性画报外，还编辑出版4开的《东北画报增刊》，以及摄影与绘画并重的《东北画报漫画专号》，并出版过《木刻选集》等。部队为了广泛建立部队摄影网和美术工作者的队伍，委托画报社从部队选调干部，在哈尔滨举办美术、摄影训练班。钱嗣杰在东北画报社摄影训练班学习了近3个月，主要是学习新闻摄影的理论、照相机的结构与使用及维护、摄影构图的基本知识、摄影采访的步骤、照片的暗房冲洗、军事摄影的实战经验等，内容十分丰富。

当时，原冀热辽画报社的摄影记者张学进、齐观山、张醒生、王纯德、刘庆瑞等，晋察冀画报社的郑景康、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陈正青等，还有一些著名的美术工作者从延安等地陆续调到东北画报社。一时间，东北画报社成为美术、摄影人才济济的大本营。画报社还特邀王家乙、李松涛、吴印咸等为特约摄影记者。尽管训练班的时间不长，但每天的学习安排得很紧凑，授课的是齐观山、陈正青、郑景康等抗日战争中涌现出的摄影名记。学习尽管是“满堂灌”，学员们却十分认真。钱嗣杰很看重这难得的学习培训机会，很快记满了一本本笔记：“摄影术传入我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因中国战败，国门被打开，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大量闯入，也带来了摄影术之类的新鲜玩意儿……1906年以后，国央日报上开始刊登时事照片。李少穆是我国报纸上有姓名可考的第一位职业摄影记者……新闻摄影具有新闻性、真实性、形象性这3个基本特性……”

在摄影训练班学习期间，钱嗣杰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摄影业得到很大发展，让他感动的是不少摄影工作者深入战场，提出了“只要人活着，就不让底片遗失”的口号——战争中有的摄影工作人员牺牲前，还不忘把相机和所拍的底片托人交给组织。摄影专家在台上绘声绘色地讲述，钱嗣杰听着听着，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同时也为自己即将从事的军事新闻摄影工作而自豪。晚年的他如此说：“摄影让我有幸目睹了很多重要的历史场面，当然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拍摄高手，而是因为我沾了当年照相机的‘稀’与‘贵’的光。”这位红色摄影家十分感谢照相机，感谢照相机这种特别的器械让他通过它观察历史、记录历史。

《东北画报》在哈尔滨出版期间，正值东北解放战争。国民党飞机经常来轰炸，大家一面防空，一面坚持学习、工作。画报的办报方针，主要是为战争服务，为士兵服务。画报以照片为主，并适当地发表一些美术和艺术作品，具有综合性刊物的特点。钱嗣杰在学习期间爱上了《东北画报》，天天翻阅，盼望有一天也能在这份图文并茂的画报上发表自己的摄影作品。其实，自他在这里参与训练学习之日起，就开始与《东北画报》结缘。

从训练班毕业的学员，大都回部队担任摄影工作，钱嗣杰和梁枫、田原、臧德宽等则留在了画报社。刚开始工作时，钱嗣杰就跟师傅打下手，师傅手把手将照相业务全都教给他，装胶卷、上镁粉、拍照、配药水、印照片、放大、修花边、修底片……师傅耐心严格，钱嗣杰踏实认真，进步很快。画报社继承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传统，除出版工作外，还举办摄影、绘画、木刻及年画的展览。除少数人留在社内工作外，大部分人不论新老一律到前线，一面进行美术创作和摄影采访，一面和士兵一起参加攻坚战、巷战。

开始上战场时，钱嗣杰什么也不懂，大炮一响，便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知道，跟突击连才能拍到东西。枪林弹雨中，连长说：“跟着我跑！我跑你就跑，我趴你就趴！”钱嗣杰这些在东北画报社成长起来、经过革命战争考验和锻炼的记者，为了形象地记录东北军民英勇解放东北的战斗，他们坚持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有的在战场上英勇牺牲。后来，摄影记者张振东在开原前线光荣牺牲，记者郭春瑞在锦州战斗中正在拍摄抓俘虏时，被暗藏的国民党军用刺刀刺穿右腹，抢救无效牺牲，第八纵队摄影记者任树云随大军参加锦州战役不幸殉职，东映新闻摄影师兼《东北画报》特约记者张绍柯、杨荫宣在锦州义县战斗中英勇牺牲……钱嗣杰日后总是说：“我能活到今天，不容易，多次死里逃生。我多活一天，就是多赚的一天。”

1946年冬，东北国民党军依仗其军事优势，为推行其“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计划，集中4个军的兵力，向南满我军仅有的临江、靖宇、抚松、长白4县展开了疯狂的进攻，企图歼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主力，独占南满，而后集中兵力进攻北满。为配合南满我军作战，粉碎敌人“南攻北守”的作战计划，迫使其南北两面作战，我东北民主联军从1947年1月5日至3月16日，3次南渡松花江作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史称“三下江南”。

作为摄影记者与文字记者不同，必须上前线，到实地拍摄，到阵地上去。钱嗣杰当时配发了一个现在看来很简陋的小“富士”相机，用的是120胶卷，每卷能照16张，并且每次只发两卷胶卷。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相机，钱嗣杰十分高兴。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还给他佩有一把手枪，他身上还携带有两枚美式手雷。

钱嗣杰作为军事摄影记者，随东北民主联军冒着-40℃左右的严寒，

踏着没膝的深雪，昼夜兼程，跨越冰封的松花江，在一门门山炮的掩护下向敌人发起攻击。战斗比较激烈，钱嗣杰拍摄有时很困难，特别是很多战斗是夜战或在拂晓进行，战斗前期如果拍摄还不让闪光，隐蔽时不能用镁粉闪光拍照，以防暴露目标。有时，由于我军伤亡过大，被迫停止进攻。

当时，六纵在新任司令员洪学智指挥下，决定以十七师主



1946年，钱嗣杰在东北双城县留影。

攻、十八师配合，消灭距九台县城 80 余里的城子街守敌，十六师配合一纵阻援。这里处在德惠、九台和其塔木中间，交通便利，从地形上看，东面有重叠的高山做依托，南、北、西也有一道大岭作屏障，地势十分险要。1947年2月5日，国民党新一军三十师八十九团奉命调往这里驻防。他们进城后立即在街的四周挖了一条外壕，并筑起一道鹿砦，还在全街修了 60 多个大小堡垒，作为巩固长春的一个据点。

2月21日，十七师到达城子街以西，十八师到达城子街以东，完成

对敌军包的围。23日8点45分，我炮兵进入阵地。9点50分，我军的大炮开始向城子街守敌猛轰。在战壕里的钱嗣杰只见把小小的城子街炸得浓烟四起，瓦砾横飞。于是，他用小“富士”相机接连拍摄战争场面，忘了自己是在战火纷飞的阵地。

看着前面的战斗场面，钱嗣杰忍不住跳出战壕去拍摄，心想只有这样才能拍到真实壮观的战场场景。刚拍几个镜头，敌人的机枪就扫了过来，子弹不断地在身边飞过，硝烟弥漫。几个战士大喊：快回来！快回来！就把他拽回战壕，刚退回就又有几梭子更凶猛的子弹打了过来，再晚一会儿，后果难料。旁边的指战员训道：“你的胆子真大，你在战场上不能单独行动！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钱嗣杰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战争。

不过，敌军没想到我军有如此强大的火力，他们的军心开始涣散。10点50分，六纵十七师四十九团及五十三团一部向敌人发起冲锋，一举攻占了敌人固守的太和堂阵地。敌人退入街里仍负隅顽抗。下午4点，四十九团以3个连的兵力攻入街里，与敌人展开巷战。六纵十八师一部也由东南角攻入，至晚上7时20分均进至城子街小学附近，将敌军全部赶到城子街东北角王家大店一带，600多名国民党官兵全部缴械投降，团长曾琦混在投降的敌兵中企图蒙混过关，被识破。至此，城子街歼灭战结束。这时，钱嗣杰拍摄了大量抓俘虏、庆祝胜利的场面。此后，我军又乘胜进占九台、卡伦、农安，进逼长春。钱嗣杰以特别的身份投入到新的战斗之中。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摄影器材奇缺，只有打大仗时，才会派出摄影记者，所以战士们都说，钱嗣杰一来，就要打大仗了。大仗，就是苦仗、硬仗，别人拿枪，他端照相机，在枪林弹雨里拍照片。在战场上，战友想的是如何多打倒几个敌人，而他则是在想如何再抢拍一些激烈战斗的



1949年2月2日,《东北日报》报道“解放北平”。 1949年,身着军装的钱嗣杰。

场面。在战场上最危险的时刻,作为战地记者的他根本感受不到危险,反而认为是最重要的拍摄瞬间。

那时胶卷很金贵,部队发得很少。一次,在拍摄中,钱嗣杰觉得战士们勇敢地冲向敌人阵地要拍,机枪阵地很漂亮也想拍,见了十个八个的俘虏也拍,三十二十的俘虏也拍,可是等到大批的俘虏下来便没胶卷了,钱嗣杰急得直想哭。等到第二次,还是一场战斗,同样是只发两卷胶卷,钱嗣杰吸取上次的教训,十个八个俘虏不拍,二十三十不拍,起码要等到五十一百时再拍,结果没有,只到30个。这一次,钱嗣杰被宣传科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因为当时懂摄影的人并不很多,相机是稀奇物,战争年代的摄影记者所拍照片还得自己冲洗、修整,有时发稿环节也是由自己承担。因此,

战地记者还是暗室工作者。为了及时将摄影图片洗印出来，充分发挥摄影的战斗作用，钱嗣杰他们经常把暗室建立在战斗第一线，建在地道里、战壕里，建在敌人据点的跟前，在枪林弹雨下、炮火硝烟中开展暗室工作。

钱嗣杰所拍摄的照片，不断地在《东北画报》登载。画报发到部队各班排，并在各班传阅，使所有战士都能看到画报，有些部队把画报作为奖品发给战士。战士们也把能得到画报当作一件光荣的事。有的部队在订立计划时，把“打个漂亮仗，争取上画报”作为战斗号召。钱嗣杰见战士爱看《东北画报》，特别是看到自己拍摄的照片极大地鼓舞了战士的士气，很有成就感，上前线拍摄的劲儿更足了。渐渐地，他有了一个体会：“要想拍出反映部队战斗生活的好照片，就要深入连队，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东北战场成了钱嗣杰磨炼胆量和提高摄影技艺的大学校。

整个三下江南作战，我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共毙俘伤敌 15250 余



1950年初，钱嗣杰与姐姐钱麟瑞全家合影。



20世纪60年代，新华社新闻摄影部职工横渡昆明湖前合影。

人，取得了巨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南满我军保卫临江，坚持南满的斗争。我南北满密切配合作战，胜利粉碎了敌人“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企图，使敌人不得不停止战略性进攻，由攻势转为守势，而我军则由被动转入了主动，从而扭转了整个东北战局，增强了东北人民斗争的胜利信心。

在解放战争中，为选择阵地拍摄角度，钱嗣杰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他一次次透过镜头见证战争的惨烈，战场上的尸体就像“秋天的稻谷捆”一样。他一方面要拍照，一方面也参与战斗。打胜仗，他很高兴，能在战斗中拍到好照片更是高兴。每次战斗后都举行2吋小照片展览，战士们看到自己在战斗中的情景上了展览十分兴奋。他骄傲，他曾亲历平津战役的烽火，见证了沸腾的北平入城仪式。

不久，钱嗣杰入党了，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用行动实践宣誓

是对党和人民所做出的庄严承诺和保证，不断坚定永远跟党走信念。

后来，他来到了北京，成了新华社的一名摄影记者。

从此，他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摄影组组长，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中央记者组记者，新华社驻开罗、阿尔及利亚、刚果分社摄影记者等。

## 二 菊香书屋的特殊“面试”

“速回国父病重”——1964年6月的一天，正在刚果采访的钱嗣杰接到夫人陈惠嫣自北京发来的电报，心底里打了一个冷颤：“什么病？有多严重？两次催我回国了。”

早在前几天，钱嗣杰就通过新华社外事部传过的话知道父亲身体不好，家属希望能回家看看病重的父亲。由于这时新华社总社已考虑他回国述职，准备过几天动身，没想到父亲的病更加严重，看来只有立即回国了。这时，钱嗣杰有一种预感：父亲可能早已离开人世了。

在竭力控制的平静中，钱嗣杰收拾好行李，赶往机场。钱嗣杰心想，这次回国述职很可能就要告别在这里的工作，等待总社安排新的任务。自己到非洲时没有几个国家独立，在这几年里，局势的发展比预料的快得多，大多数国家已获得了独立，很多国家还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华社分社比使馆还多。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呀！即使有些国家还没有独立，已经独立的国家也还有同殖民势力斗争和建设国家的问题，但是民族解放一旦开始，已是不可阻挡的了。

飞机起飞了。钱嗣杰有些激动，有些依依不舍，因为他清楚自己很

可能没有回来的机会了，在这块土地上，他与非洲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见证了这块神奇土地的变迁。

飞机取道阿尔及尔回国，在飞行途中，钱嗣杰的心已经飞到了父亲身边：自1956年4月，接父亲回到自己身边生活，由于自己工作的确太忙，父子俩聚少离多，难得有大块时间在一起交流。更遗憾的是，每天玩相机的自己同父亲留下的合影都没有几张。特别是自己在1959年就被新华社总社安排到非洲地区工作。那正是非洲国家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自己穿梭在一个又一个非洲大陆刚刚独立的国家之间，除了要完成新闻采访工作，还要用记者的身份和当地政府建立联系，实际上也是作为中国外交的铺路石。这期间，一直没有机会与家人见面，连电话也没打过一次。

坐在飞机上，钱嗣杰陷入了对父亲的无尽思念之中。他有思想准备，很可能父亲早就走了。透过舷窗，飞机在云团中穿行，千变万化，有的像白马，有的像绵羊，要在平时，钱嗣杰会用手中的相机拍下这变幻无穷的美丽彩云，可是现在压根没有心情欣赏，只是目光无神地呆呆地瞭望着不断翻腾的云团，一如自己的心境。此时，钱嗣杰感觉飞机似乎没有往常飞行得快，他的心早已飞到了父亲身边，眼前的云团似乎都含悲翻腾着……

终于到了北京机场，下着倾盆大雨，钱嗣杰心里又凉了一截……

远远地就看到父亲静静地卧在肃穆的灵堂的中央，钱嗣杰的心里防线被彻底击垮，泪水夺眶而出，冲过去，扑在父亲的遗体上痛哭起来。

原来，父亲钱乐恩是因为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的，离开人世时什么话也没有留下。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父亲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全都浮现在钱嗣杰眼前。父亲的勤劳善良、吃苦能干感动着钱嗣杰，也一直影响着钱

嗣杰。在他心里，生活和工作中的父亲是自己的楷模！父亲的神情很安详，让钱嗣杰感受到他历经了更完备的人生！

安排好父亲的后事，钱嗣杰回总社作了述职。随后，在国内休假一个星期。一天，钱嗣杰接到新华社电话，请他到社长吴冷西办公室去。这时，钱嗣杰心里有些不平静：看来，我要接受什么新的重大任务了，不然，怎么会是社长找我谈话呢？

钱嗣杰直奔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办公室。刚落座，吴冷西就开门见山地说：“钱嗣杰同志，你自进入新华社工作来，表现突出，我们对你表示祝贺，同时感谢你为新华社新闻事业所做的努力。如今，你有一项新的工作，就是调你进中南海，做毛主席的专职记者，到中南海工作。这是不一般的新闻任务，是政治任务，你有信心没有？”

“我有信心完成组织交给我的新闻采访任务，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与激励！”当被告知让自己进驻中南海给主席当专职摄影记者时，钱嗣杰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语言中显得有些激动。

事后，钱嗣杰才知道，调查人员已对他本人和家庭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以至于老家的乡亲们都在猜疑一向忠厚的小钱犯了什么错误。

早在1950年，时任中央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摄影记者的钱嗣杰在两位老记者的带领下，去北京饭店采访外事活动时，见过毛泽东主席。初次担纲，钱嗣杰既紧张又兴奋。神采奕奕的主席来了，那是钱嗣杰平生第一次见到伟人的容貌，忘情得直鼓掌。毛泽东并没有注意这个毛头小伙，很快走了过去。一旁的老记者低声问道：“刚才主席情绪很好，你拍了吗？”这一问，钱嗣杰才想起肩负的重任，脑袋里“嗡”的一声，于是慌慌张张地按下了快门。后来，这张照片是经过剪裁后才用上的，因为主席不在照片画面中央。

钱嗣杰记得，一次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拍摄足球赛，社里要求拍摄获胜队球员射门的精彩镜头。在最后一场倒计时里，足球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突然，一位球员一个吊脚、一个晃身，完成了一记漂亮的进球，随之场下一阵欢呼。钱嗣杰忘情地鼓掌，竟忘记拍摄。这时，在身边的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陈正青问：“拍得怎么样？”一听，钱嗣杰大喊：“糟了！忘记拍了，只顾鼓掌了。”陈正青表示遗憾，用胳膊肘顶了一下钱嗣杰：“你看，这么精彩的镜头叫你错过了。”随后陈正青也笑了。

随着终场哨声的响起，传入众人耳朵的是球员的欢呼声和观众的掌声。而此时，钱嗣杰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在他看来，足球之所以吸引那么多人的眼球，关键还是那种永不服输的拼搏精神。

1950年6月，西南少数民族访问团组团后，毛泽东接见了全体团员。钱嗣杰作为随团摄影记者有幸再次近距离见到了毛泽东。钱嗣杰记得，毛主席当时同全体团员合影留念，并题词送给少数民族地区。

“给主席当摄影记者，太光荣了！要知道新华社好几百人哪，能选到我，我是又高兴又紧张哪！”接受笔者采访时，钱嗣杰想起当年的事情，依然兴奋不已。“这个工作责任太重大，压力也挺大，是不能出一点问题的。比如说，今天主席活动，已通知各报，那天晚上版面都给你留着天窗呢，照片必须得补上去。所以在那一段工作确实也很紧张，也很高兴。但是，照片发出之前，我的心老是悬着。”

尽管钱嗣杰此前还曾同邹健东、齐观山到中南海勤政殿为毛泽东拍过照，但那时为主席拍照虽然紧张，却都是两个摄影记者一道去，压力小一些。特别是想到，当年在北京饭店第一次为主席拍照时，由于慌乱没有把主席的身影拍在镜头中间，心里总有点“阴影”，生怕在被调到主席身边当专职摄影师后再出现什么闪失。

到中南海的第一天，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带着忐忑不安的钱嗣杰去见毛泽东。正值夏季，一路上钱嗣杰紧张得汗水打湿了衣衫。不多久，就到了中南海瀛台北边的丰泽园。

钱嗣杰跟着汪东兴沿着颐年堂的前廊往东走到尽头，有两座小四合院，都是丰泽园的附属建筑。汪东兴介绍说，南面的称松寿斋，为主席的亲属、子女及警卫、工作人员居住，北面配房庭院是菊香书屋，是主席的书房，主席的全部活动几乎就全在菊香书屋。

很快，到了菊香书屋。汪东兴走进去，说：“主席，摄影师小钱来了，见见主席。”正在看书的毛泽东从沙发上起身，说：“欢迎，欢迎。”

钱嗣杰步入菊香书屋，满眼是书。很多两米多高的木质棕色书橱几乎摆满房间，简直是一个小型图书馆。钱嗣杰感慨，主席真是书读万卷，藏书浩繁。

毛泽东见初来乍到的钱嗣杰有些紧张，于是走过来，握着钱嗣杰的手并请他坐下，唠起家常来为他放松：“你多大了，么子地方人，叫么子名字啊？”

钱嗣杰激动地回答：“报告主席，我姓钱，叫钱嗣杰，是黑龙江黑河市人，祖籍山东平阴。”

毛泽东一听，笑了：“好嘛，你姓钱，你有钱啊，我可是无产阶级啊！”

毛泽东风趣的谈话让周围的人都笑了，也让钱嗣杰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下来，说话和动作也自然了。

毛泽东知道钱嗣杰从非洲回来不久，于是钱嗣杰简单地汇报了自己在非洲的工作情况和所见所闻。毛泽东听完后高兴地说：“将来我们要一起工作了，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半个小时的谈话完全改变了钱嗣杰对主席的印象：他并不是人们想

象中那么严肃，而是非常幽默、平易近人。

主席“面试”后的第二天，上级就通知钱嗣杰搬进中南海办公，成为继侯波、吕厚民之后的主席第3任专职摄影师。此前，摄影记者陈娟美短暂代替吕厚民，临时随毛泽东外出过。

当时，钱嗣杰和杜修贤、孟庆彪分别作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的专职摄影师，跟随在领导身边，同暗室工作人员兰芳共4人在中办警卫局摄影组，办公室设在中南海警卫局旁边，内设有一个暗房。

接受采访时，钱嗣杰回忆说：“在中南海就我们3个记者，是固定的。不像现在采访，只要是报道中央新闻的，都可以去，过去它限制的。”

那时，由于电视设备不过关，电影的成本又太高，因此记录国家领导人日常活动的手段主要是拍照。“那时不像现在有时还专门给摄影记者一个拍照机会，好像我们也不敢提出来，也没那个意识。那个年代，领导人接见外宾一般不做摆拍，他们的一举一动很难预判。”

对于时常在身边按动快门的摄影师，毛泽东的反应是“不干预”。“你什么时候照，你愿意照你就照，从来没拒绝过我。当然，有的时候、个别时候，下去参观的时候他说：你多照些群众。他希望多拍和群众在一起的那些场面。我在主席那里那么多年，他没有说看看照片，报纸登得好不好，没有。他不管这个事情”。钱嗣杰如是回忆。

作为专职摄影师的钱嗣杰，不仅要拍摄一些正式会见的场面，还要善于捕捉领袖生活的瞬间。“每次主席活动前，我都要认真检查相机的功能，检查胶卷是否上好，不敢有任何懈怠。我随时都背着两部相机——‘禄莱’和‘徕卡’，都是德国制造的，以防万一。虽然不如现在的相机功能齐全，但性能绝不差。”

起初，钱嗣杰住在宣武西街1号楼，后移居在皇亭子6号楼。办公

室 24 小时值班，随叫随到。到中南海上班，钱嗣杰每次都骑自行车。

当时所拍摄的照片除公开采用和部分留作历史资料、少部分送礼外，其余图片必须销毁。底片和那些多余的照片在销毁时，放在一具上锁的废片箱内，定期烧毁。烧毁时，有专人监督，烧后灰烬也要检查一下是否完全烧尽，任何人不得私自留底。于是，在那些年代里，钱嗣杰尽管拍摄了数万张照片，可是自己手上没有几张照片，仅有几张（共 5 张）与主席合影的纪念照片。汪东兴当时要求，摄影师不得私自与领导人合影，包括向主席索字、求诗。

据钱嗣杰晚年介绍，毛泽东习惯坐火车下去调研，每到一个地方，“往往请地方干部，省长、省委书记什么的到火车上来汇报——他就不下车了。主席怎么考虑呢？他说：“我到一個地方去，那个地方又要给我准备住的地方，又要好多干部陪，很多麻烦事，这样不给地方增加麻烦，见完了火车又开走了，到火车上来谈好。”不过，坐火车也有不方便的地方，“要是在夏天，我们就得围着火车转，上午太阳在哪边，就在哪边坐着，组织学习、看书什么的。下午又到火车的另一面，反正跟着太阳转，的确很热。”

“在主席身边工作的 6 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受益最多的时光，同时也是最紧张、压力最大的一段日子。”钱嗣杰接受采访时说，主席是“夜猫子”，喜欢熬夜，生活没有规律，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时刻准备着。“当时来访的外宾主要由外长和总理接见，一般情况主席是不接见的。不过，为了外交工作的需要，主席也接见一些外宾，但没有时间表，完全是按照他的习惯来决定的。外宾可能正在天安门或长城参观，如果这时主席说可以见，那就立即通知外交部安排接见。”

钱嗣杰回忆说，主席的行动是高度保密的，往往是上午见外宾，中

午突然通知要出发，工作人员就要紧急集合，直到上了火车才知道目的地。给大家的感觉是，随时都会有外事活动，随时都可能出差。此外，主席每年国庆节后就要南下，去上海、杭州、武汉、江西等地，一待就是几个月。到了春天，工作人员轮流回北京取换季衣服并休息一个星期。在钱嗣杰看来，在领袖身边工作，保密工作肯定是首要的，“比如跟随出去视察，家属都不知道我们到哪儿去，也不打电话，也不写信的。”

### 三 井冈山之行的跟拍

一提起“南巡”，人们都想起了1992年春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南方城市发表有关重要讲话的情景。其实，开国领袖毛泽东也多次巡视祖国的南方地区，在这里我们不妨也称之为“南巡”。钱嗣杰曾一次次跟随毛泽东“南巡”，记忆最为深刻的便是1965年的武汉、长沙、井冈山、杭州、上海之行。

1965年3月初，钱嗣杰接到通知：主席将到南方视察，立即做好有关准备。于是，钱嗣杰像往常一样，对将使用的摄影器材进行了一次认真、仔细的检查，以防止临场发生故障，或遗忘必需的附件和备件，造成工作时的困难，甚至贻误工作。

出行前，钱嗣杰认真清洁了几部相机的各部件，特别是光学和装片部分，并仔细检查了相机与闪光灯设备是否灵敏，接触是否良好，两者是否同步；还检查了闪光灯连接板、闪光灯连接线、遮光罩及必要的滤光片是否带全，检查120相机内（包括后背）是否带有空轴、闪光灯内是否带有电池、电瓶是否充足了电、胶卷是否带足和胶卷质量是否可靠等等。



1966年，毛泽东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闻电影摄影师舒世俊合影。钱嗣杰 摄

毛泽东专列沿着京广线风驰电掣般地向南方驶去，驶过河南郑州、许昌、信阳、鸡公山，向湖北省境内飞奔而去。这次随行摄影的除了钱嗣杰，还有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照明师贾秋和。

这时，妻子陈惠嫣已有身孕。为了不使丈夫为自己牵挂而耽误工作，陈惠嫣反过来安慰钱嗣杰安心工作，她自己会照顾好自已的。

3月16日下午，主席专列到达武昌，悄悄停靠在余家头一所战备物资仓库里。

这所仓库很大，当时叫102仓库。里面铺有军用铁轨，主席专列全部开进去，外面一点儿都看不出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早已在此恭候，看见毛泽东下车，大步迎了上去，说了声：“主席好！”毛泽东笑着和他们握了握手。

很快，钱嗣杰等随毛泽东乘车到达武汉东湖边上的梅岭1号。梅岭是一个被毛泽东称作“白云黄鹤的地方”。

毛泽东钟情于武汉，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到武汉来，少则1次，多则3次；居



1965年，毛泽东在湖北武汉东湖宾馆。钱嗣杰 摄

住时间短则1周，长则半年。这期间，毛泽东就住在梅岭1号，这里成为毛泽东晚年在中海之外居住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地方。因此，梅岭1号，被人称为“湖北的中海”。梅岭1号建筑一气呵成，完全是根据毛泽东的习惯以及安全保卫工作要求而建成的，内有十间大小不等的房间，空间比较大，内部装饰朴实无华。刘少奇、董必武到武汉，也都在此下榻过。

毛泽东到武汉后一连几天，都没有到外面视察，也没有请当地领导人来交谈工作。钱嗣杰注意到：每天晚上，梅岭1号办公室的灯光都亮到第二天清早。那些日子，毛泽东每天下午起床后散步，从梅岭1号出来，若有所思地走向南山甲所，从南山甲所慢慢转到东湖边上，步履沉重。钱嗣杰和医护人员等跟随主席散步，他眼里的毛泽东常常是背着手一个人静静地散步、静静地思考着什么。钱嗣杰担心打扰主席的思绪，于是很少拍照。在所拍不多的几张照片里，毛泽东多是默默行走着，或背着手低头思考着什么，或是轻轻地甩着手、抬起头缓缓散步。后来，钱嗣杰才知道毛泽东这期间正在思考走向紧张的中苏关系。

4月27日，毛泽东提出会见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张平化很快

自长沙赶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省农村社教运动的情况。期间，毛泽东说：“我年纪大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去看一看，你最近能不能抽出时间，带带路？”

张平化是湖南酃县人，而酃县是井冈山下的边陲小城。张平化自1959年9月到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曾回过两次井冈山。张平化一听说主席要上井冈山看看，有些激动，说：“跟主席上井冈山，我随时有时间，现在交通又方便。”毛泽东含笑点点头。这时，汪东兴表示先派人探探路。

4月29日下午，毛泽东离开了梅岭。消息很快传开了，梅岭工作人员都希望和主席照张相，于是把汪东兴给包围起来，纷纷表示合影的愿望。汪东兴感到有点儿为难，因为昨晚主席和前来武汉汇报工作的贺龙、罗瑞卿、杨成武等谈得太晚，现在临行前向主席提出这个要求，不知道主席有没有时间。工作人员一见汪部长这边行不通，很快转到主席的秘书徐业夫那里，请他向主席提一提，徐业夫笑着点了点头。

毛泽东欣然同意与大家合影。于是，梅岭1号门前空地站满了人，毛泽东站在了中间。刚刚站好，钱嗣杰大喊：“笑一笑。”这时，大家齐声喊：“茄子！”于是，一张五六十人的大合影完成了。

一位年轻的梅岭工作人员对大家都喊“茄子”有些纳闷，于是怯怯地走过来，问摄影师钱嗣杰：“师傅，照相就照相嘛，同‘茄子’有啥关系？”钱嗣杰一听，乐了，回答说：“意思就是笑一笑。人笑，眼睛弯弯就像茄子。也就是喊‘茄子’就有笑的效果，口型好看，使形象更加漂亮。”这位工作人员听后，也笑了，说：“为什么不喊‘黄瓜’呢？”钱嗣杰更乐了：“也行，不一定要喊茄子的，只要咀嚼肌收缩就行了嘛。因为‘茄子’的发音使嘴上翘，正好使嘴角撑起笑脸的样子，在拍照的

时候为了使笑容不那么僵硬，用这个办法能拍出自然的完美效果。现在大家都约定俗成了这么喊。”

在英语里，照相比较正式的讲法叫 take pictures。不过，帮忙照相的人在按下快门之前都会说“Cheese！”欧美人也认为在喊“Cheese”的时候像是笑得很开心。可以说，这个“Cheese”和我们的“茄子”有异曲同工之妙，更神奇与巧合的是“Cheese”与“茄子”谐音。在《英汉辞典》里，“Say Cheese”的解释就是“笑一笑”。不过，“Cheese”的本义是“奶酪”。为什么“说奶酪”能导致“笑一笑”，这事涉欧美俚语，钱嗣杰表示很难说清，但是直译成“说奶酪”绝对不行。当然，也有人在照相时说“Say C”，因为 C 和 Cheese 一样，能够让人露出美丽的牙齿。

4月29日晚，毛泽东一行从武昌到达长沙大托铺。湖南省委领导张平化、王延春、华国锋等人前往大托铺专线迎接，毛泽东下榻在办公厅招待所（九所宾馆）3号楼，钱嗣杰等随行工作人员分别下榻4号楼、5号楼。

4月30日晨，汪东兴、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及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等人，按照湖南省委新近的安排，一起前往井冈山，沿途为毛泽东上山做相关准备工作。

九所宾馆因为建在陈家山山坡下，有9簇别墅而得名。这里别具一格的建筑、古木参天的绿荫、戒备森严的警卫，无不显示着它与其他宾馆的不同，也使它蒙上了几分神秘的色彩。这9簇别墅坐西朝东，恰似一个巨大的手。每一簇别墅都有一个小天井，天井内或种奇花异草，或建亭台水榭，一进九所院内只闻鸟语花香，环境异常清幽。

毛泽东在长沙九所准备前往井冈山期间，突患重感冒，后又因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阑尾炎发作，因而在九所延住了共22天。这次重感冒期

间，一向质疑中国保健制度的毛泽东不主张吃药，让身边的医护人员很是着急。一次，在陈家山散步时，有人劝他吃药，他笑了笑，说自己已经吃过了。护士长吴旭君“揭露”主席压根就没有吃药。这时，毛泽东幽默地笑了起来，说：“我是吃了药啊，我是吃了饭，饭是最好的中药。我还要天天加强锻炼，天天爬山。要用自己的抵抗力来战胜疾病。”

每每毛泽东爬山，或在陈家山下散步，钱嗣杰与吴旭君及贴身警卫周福明等都会紧紧跟在前后。周福明有时见主席精力不足，就扶着主席行走。看到主席开心了，钱嗣杰便不时地用相机拍摄他悠闲自得的神情。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请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来过长沙，商谈为“马列”的6本原著写序。同时，他还找湖南省委负责人了解湖南的粮食生产，得知湖南的粮食生产在两三年时间内，便从灾荒年跃到了1957年丰年水平，他非常高兴。

5月中旬，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来长沙休假，住在九所7号楼，他得知毛泽东到了长沙，便常来看望。钱嗣杰用镜头记录了中越两党、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谊。

5月19日，是胡志明75岁生日。毛泽东特地请九所厨艺最好的师傅到7号楼操厨，精心为胡志明做些好菜。当天，毛泽东安排前来汇报的陶铸、王任重、张平化等，去看望胡志明并表示祝贺。陶铸等离开九所7号楼时，有人提议合个影，胡志明高兴地答应，并请服务员、炊事员一起合影。胡志明走出门口台阶，谦虚地坐在旁边，陶铸一不留神就坐到中间了。钱嗣杰用相机摄下了那开心的一瞬。这时，陶铸提出让胡主席坐在前排中间，胡志明连连摆手：“这样正是，你们来看我，你们是客人，我是主人，客随主便。”大家笑着散开了。

以往毛泽东每次来长沙九所留住，都会参加九所组织的舞会，但这

一次，毛泽东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舞会，也没有看过一次电影。

5月21日上午11时许，12辆小车整齐地排列在九所大院内，张平化夫妇和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副厅长高文礼等在3号楼前等待毛泽东上车。

第一辆车是前导车，全部是警卫人员，身背无线电发报机。第二辆是毛泽东所乘的浅灰色“吉姆”车，司机是驾驶技术精湛的赵毅雍，副驾驶坐的是毛泽东的卫士王宇清。毛泽东上车后，坐在后座，旁边坐的是护士长吴旭君。

自井冈山探路回来的汪东兴和张平化、李强等坐在第三辆车上，这是一辆黑色“吉姆”车。这12辆车包括两辆工作车（面包车），一辆专门装有毛泽东的书籍、木板和其他生活用品，一辆装的是通信器材之类。

临行前，毛泽东对于钱嗣杰等随从人员说：“这次行动，不要搞得复杂了，一切节约办事，吃的用的就地取材，有一间茅屋就能睡觉，尽量少用人用车，能合并坐车的尽量合并坐车，沿途不要事先通知布置，不要惊动面过大，不要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

车队从九所出发，直奔大托铺主席专列停靠处。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湖南省相关领导等登上专列。专列很快启动，沿着长株段铁路疾奔。当日下午2时，专列缓缓停在醴陵阳三石火车站。这时，湖南省委车队已整齐地排列在一边，小车从大托铺空车提速，早已提前10分钟到达阳三石车站。于是，大家纷纷上小车，毛泽东坐上了那辆浅灰色“吉姆”。

当日下午5时许，重上井冈山车队进入茶陵。钱嗣杰看到已是72岁高龄的毛泽东，尽管从长沙到茶陵颠簸了近一天，下车后依然昂首阔步，没有一点倦容。

稍事休息，吃过晚饭，汪东兴安排毛泽东在茶陵县委办公室住宿。

为不给当地增加麻烦，毛泽东生活所需物品，如窗帘、被褥、床及便桶等，都是事先按照毛泽东的生活习惯自己带来的。其中，毛泽东所睡的床是随车带来的一张木板床，床铺比较宽，很朴素——床的一边放铺盖，一边可以放书。

22日清晨，毛泽东来到茶陵的消息在县委大院不胫而走。一早，茶陵县委领导同志就找到汪东兴说：“毛主席来茶陵，您应该事先告诉我们，我们好作安排。”汪东兴说：“怕惊动群众和干扰你们的工作。我们这次是路过茶陵去井冈山的。”

茶陵领导同志心切地请求能见毛主席，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说：“当然要见嘛！路过一次茶陵也不易呀。38年前路过茶陵时很狼狈，那时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一部分被敌人追赶着，一部分被敌人阻截着，到茶陵吃、住都很困难。这一次来可完全不一样了！”

茶陵的同志知道是毛主席将接见，一个个高兴得坐立不安。张平化嘱咐：“为了主席的健康，见到主席时，不要同主席握手，只能鼓掌。不许喊口号、说话。”

不一会儿，茶陵县委大院里按钱嗣杰的指挥摆好了凳子，一个个都站在凳子背后。上午的太阳和煦地洒着金辉，钱嗣杰调好焦距，大家幸福地等待着。不大工夫，毛泽东从办公楼出来了，迈着大步走来，大家兴奋地鼓掌，毛泽东也微笑着鼓掌，朝凳子中间走去，张平化跟在他后面。毛泽东转过身，微笑着环视每一张脸，然后再坐下。这时，钱嗣杰叫声：“注意……”随之，一声“咔嚓”。

太阳迎面照来，钱嗣杰连拍了两张。毛泽东站起身来，说：“这次不能和大家多谈了，要赶路上井冈山，谢谢同志们。”

茶陵的同志看到主席这样精神焕发，兴高采烈，自己的愿望又得到

了满足，都使劲地鼓掌欢笑，目送毛泽东一行上车。

1个小时左右，车队进入湖南与江西交界的界化垅。界化垅一半属于湖南省茶陵县，一半属于江西省莲花县。司机认真地向毛泽东报告，现在已进入江西省的莲花县。

莲花也是井冈山根据地6县之一，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到达根据地的第2个县。毛泽东忍不住轻轻地掀开车帘，向外面看看，他看见江西省委派来的前导车已在前面带路，可能想到保密纪律，他无奈地放下手，深情地说：“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莲花桥头村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翻过一个山头，来到永新县地盘，这叫避实就虚。”毛泽东眼睛闪着微笑，嘴角挂着微笑，那是一段永远值得回味、值得骄傲的“红色经典”时期。

车行至茅坪的八角楼附近，毛泽东本想看看当年生活、办公的地方，突然八角楼对面步云山方向几十号人拿着铲子、锤子过来，汪东兴考虑到安全与保密就让司机开车离开。毛泽东隔着车窗久久看着八角楼，车离开了，老人家还转过头，恋恋不舍，痴情地看着茅坪的一草一木。钱嗣杰等不久后才知道，这些拿铲子、锤子的人都是附近修公路的工人，正收工回家。

车队沿着茅坪通往茨坪的山路蜿蜒而上，约半个小时就到了黄洋界。前导车按照事前的安排，停了下来。毛泽东等不及警卫人员开车门，自己便打开车门，走了出来，向大家一招手，大步向山顶走去，山上下来的几十号人，紧随跟了过去。远看无边无尽的云海，托起一个又一个的山峰，云海波浪起伏，山峰岿然不动。毛泽东自豪地说：“这就是黄洋界，当年五大哨口之首。”钱嗣杰注意到，毛泽东在哨口来回走了走，看了看。

毛泽东站在黄洋界上，极目远望。山风飒飒，护士长递来风衣，汪

东兴接过给主席披在肩上。他皱了皱眉头走了几步，来到一座木头做的纪念碑前。南面是朱德写的“黄洋界纪念碑”几个大字，北面写着印刷体《西江月·井冈山》，张平化仰视着碑文，激情地读了起来：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人宵遁。

当年的井冈山诗词，令毛泽东心潮澎湃，他大声地说：“这首词是1928年9月初写的。那时刚刚在黄洋界打退湖南、江西两路敌人的进攻，那一次我不在山上，井冈山的兵力不足一营人，好危险哦！”

随后，毛泽东笑着请钱嗣杰为他和张平化夫妇在黄洋界纪念碑前一起合影留念。因为毛泽东知道，张平化是小车队一行人中唯一的井冈山老战士，他全家有7人为革命献身。

车队依次继续前进。从黄洋界到茨坪仅17公里，毛泽东兴奋地拉开车帘，细览沿路井冈山那峰、那云、那松、那石，若有所思。下午6时30分左右，一行到达井冈山山顶之镇——茨坪。传说，古时这里长满柿树，称为“柿坪”。因当地人念“柿”为“茨”，后渐改为“茨坪”。

井冈山斗争时期，这里是红军后方、军事根据地中心。红四军机关和湘赣边界特委等党政军的机关后期都在茨坪办公，留下了许多革命遗址。此时的茨坪，俨然一座山中美城。宽宽的街道，沿山而筑，整齐的房屋，拔地新起。刚刚进入黄昏，街上已亮起路灯。

毛泽东一下车，便高兴地和井冈山管理局的同志握手，说：“茨坪变化真大！当年我们下山时，红四军由士兵委员会贴标语，‘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倒’少写了一笔，我笑着说他们，少了一条腿，敌人不打就倒了。怎么样，敌人不打不会倒，穷苦人团结起来一打，它就倒了，我们又上山了。”毛泽东的幽默风趣，让大家格外兴奋地笑起来。



1965年，毛泽东与汪东兴等身边部分工作人员在井冈山。钱嗣杰 摄

当晚，毛泽东下榻在茨坪宾馆一楼的115号房间。在房间内，宾馆的工作人员请毛泽东在一张宽大的沙发上坐下来，稍事休息。毛泽东环视四周，脸上流露着喜悦的神色，连连夸赞说：“这可和当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上山一千多里路走了半个月，这次坐汽车两天就到，还是机械化好……”钱嗣杰等都笑开了。

宾馆人员觉得毛泽东一路来到井冈山太辛苦、太劳累了，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及茅台酒、香烟、苹果。汪东兴深知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作风，更知道毛泽东的脾气，立刻吩咐工作人员将烟、酒、苹果和鸡、鸭、鱼、肉等菜肴统统撤了下去。

到了井冈山后，毛泽东吩咐汪东兴组织北京来的人去看一看井冈山

旧址和纪念馆，了解井冈山的革命历史。钱嗣杰想去看看，但不敢吱声，因为自己不在主席身边就没有人给主席拍照了，汪东兴看出了钱嗣杰的心思，就说：“小钱，你走吧，到四处看一看。机器给我。”钱嗣杰清楚，汪东兴会拍照，就将相机交给他。

当天，毛泽东没有出门，汪东兴也没有拍照。钱嗣杰参观回来后，毛泽东问：“小钱，怎么样？”钱嗣杰高兴地说：“很好，很受教育的，长了不少知识，真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一直在毛泽东身边拍摄的钱嗣杰发现：在茨坪的日子里，主席改变了他夜间工作、上午休息的习惯，而是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就去散步；在满目青翠的山林中，他大步流星地走着，常常把跟随他的工作人员落下很远，大家都赞叹主席的身体真是棒极了。有时，主席会用他手上拿着的那根竹拐棍当成“开路棍”，比比划划地在前趟路，就好像是回到了38年前似的，那样生动活泼、那样豪情满怀……

一天饭后，毛泽东在山间散步，望着叠翠的青山讲了起来：“井冈山是座好山哩！地形条件好，群众基础好。当年我们在井冈山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住的是破草房，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这时，钱嗣杰抢拍了一张毛泽东散步的照片。听到“咔嚓”一声，毛泽东抬起头，之后转过脸问陪同人员，“井冈山现在还产红米么？”

在场的汪东兴清楚，毛泽东在中南海一直吃红米饭，吃红薯、芋头、玉米、马齿菜等等，可来井冈山快两天了，还没见到他吃红米饭呢！便赶紧回答说：“有，有！”并补充说，“主席，去年你吃的红米，就是从江西买回去的。”“哦……”毛泽东不再讲话，继续散步。第二天，毛泽东的餐桌上增添了一碗红米饭。

5月25日，张平化因为必须启程赶回长沙主持一个重要会议，需要

提前下山。跟随毛泽东上山的小车除了赵毅雍驾驶的那辆外，大都跟随张平化回长沙。吃过早饭，张平化夫妇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可能知道湖南同志当天要走，起得特别早，并亲自送张平化夫妇到宾馆大门口。这时，张平化向湖南同志招手，吩咐赶紧站在毛主席身边一起照相。

张平化夫妇激动地站在毛泽东身旁，跟随上山的司机一个个站在后面，钱嗣杰等摄影记者按下快门。毛泽东站在原地未动，为了保险，钱嗣杰又按了一下。

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见主席还站在那里未动，大家见缝插针，走上前去说：我们也都作个纪念吧。于是，毛泽东一一与工作人员合影。对于钱嗣杰、舒世俊、贾秋和等摄影人员，毛泽东也一一满足大家的合影

要求。

照完相后，湖南小车队各就各位，准备下山。谁也想不到毛泽东此时走下宾馆台阶，随着发动的小车一步一步随车走起来，他要步送湖南同志下山。张平化赶紧下车，请主席回房休息，他清楚主席昨晚办公一整夜还没有睡觉。只听到毛泽东说：“你们这么多人



1965年，毛泽东在井冈山与钱嗣杰、舒世俊、贾秋和合影。

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步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张平化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含着激动的泪花，说了声：“请主席保重！”此时，钱嗣杰等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动了……

5月27日下午，毛泽东填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全词既表现了对井冈山的深切怀念，又赞美了井冈山的崭新面貌和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的革命精神，更是表现了他宽广博大的胸怀。

5月29日下午，井冈山广播站正反复播送着一条大会通知：“全山革命同志请注意！全山革命同志请注意！今天下午4点钟在茨坪宾馆门前召开大会，请相互转告。”

不多时，背着两部相机的钱嗣杰只见在茨坪宾馆餐厅门前，从山上和从山下接来的老赤卫队队员、暴动队队员、烈士遗孀，站了里三层外三层。井冈山管理局党委书记袁林用永新话激动地说，毛主席到井冈山来了，来看望大家，马上要接见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兴奋异常。

一会儿，毛泽东从宾馆大门走了出来，带着那么熟悉的笑容。“毛主席！”所有的人在那一瞬间都愣住了，主席真的来看大家了，真的站在大家面前，人们一个个激动地忘了说话，毛泽东依次握住当年对红军生死相助的一双双粗手。握完手后，管理局的同志请主席站在前排中央，井冈山各级领导站在了两边，毛泽东和井冈山老同志、烈士遗孀一起照了一张相。钱嗣杰冲洗出来后，才发现：照相时由于考虑不周，第一排两边站的几乎都是管理局干部，老赤卫队员和烈士家属倒站在了后面。

当天，钱嗣杰照的第二张相片是毛泽东和宁冈等县老同志、烈士遗孀的合影。当时，革命烈士袁文才的发妻谢梅香坐在第一排，井冈山管

理局局长、书记袁林刚准备介绍，毛泽东就认了出来：“袁嫂子！早就要来看你们了。革命难为你们啦！”还是当年在井冈山太仓村第一次见面一样的称呼。谢梅香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38年了，天翻地覆，毛委员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还是这样称呼她。谢梅香呆呆地仰望着毛泽东，过了好久才说：“毛委员……毛主席！谢……谢您来看我们，谢谢！”毛泽东又动情地问：“你身子骨还好吧？”谢梅香答：“好，好……”此时她已泣不成声。

此情此景，震撼着钱嗣杰的心，也感动着现场每一个人。招呼大家站好，钱嗣杰按下了快门。

20世纪60年代的保密工作依靠群众路线，做得比较好，毛泽东在井冈山住了多日，除了相关人员，住在茨坪的绝大多数群众都不知道，更不知道老人家就住在自己身旁。“毛主席？”“是毛主席！”广播后不久，许多群众过来了，人们都惊呆了，有的人揉揉眼睛，看是不是在梦境，有的人激动地举起右手，喊起口号，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毛泽东向大家招手，大步流星走了过来，红光满面地走在井冈山大道上，高举着右手和大家打着招呼。激动的人群沸腾起来了，“毛主席万岁！”口号声随着松涛久久地起伏，那是人们发自肺腑的欢呼。这一刻，钱嗣杰感动了，跑在主席的前面，连连按动快门。

这一天，毛泽东沿途接见群众3000多人，茨坪当时常住人口也只有几千人，老老少少倾巢而出。接受笔者采访时，钱嗣杰回忆说：“离开井冈山时，主席的心情非常激动，老人家在沙石路上走得很慢，频频地向两旁的群众挥手。这次主席上井冈山酝酿很久，考虑得比较深远。重上井冈山所有活动由我拍照，我照了100多张照片，新闻电影制片厂舒世俊、贾秋和也拍了短片。在我印象中，主席本来还要去延安的，‘文

化大革命’爆发后，就没有去成。过去的艰难岁月在老人家心目中印象很深，革命的使命在老人家的心目中地位很重。重上井冈山，主席的心情一直很振奋。”

毛泽东恋恋不舍地下山了，一行经拿山、泰和直达吉安地委招待所。由于毛泽东这一天比较劳累，吃过晚饭即休息了。

次日午餐后，毛泽东同吉安地委



1965年初夏，毛泽东在井冈山。钱嗣杰 摄

同志一起照了相。然后，乘汽车经峡口、分宜到达樟树机场的专列停靠处。当晚，在专列上宿营一夜。

5月31日清晨6时，主席专列正点发车，经向塘、鹰潭、上饶，一路呼啸向杭州进发。在樟树到杭州沿途，江西和浙江两省公安厅早已在所辖地段做了秘密警卫安排，在万无一失的一级警卫中，专列相继停靠鹰潭、上饶加水，毛泽东在这两站都下了车，在站台上缓缓散步，背着

两只手，静静地来回走动，钱嗣杰等工作人员都看得出主席的目光带着一分忧虑。

专列于当日下午6时许到达杭州。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等省委领导同志迎接毛泽东一行去了汪庄。

汪庄位于美丽的杭州西子湖畔，原是汪姓的富商在杭州的别墅，建于1927年。这里依山傍水，风景绮丽，是毛泽东多年常驻江南的首选之地。

6月13日，毛泽东到西子湖畔的谢家花园看望了刚至杭州休养的胡志明。两位老人沿着谢家花园九曲石径一边走，一边聊，胡志明感谢中共安排他上黄山疗养，毛泽东则向老友胡志明谈了谈他重上井冈山的某些思考。

6月15日中午，周恩来到达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他和陈毅准备前往阿尔及利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之事。下午至次日凌晨，毛泽东在汪庄听取了余秋里等人关于编制第3个五年计划相关事宜的汇报，周恩来、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等人参加了会议。

16日凌晨，罗瑞卿兴奋地向毛泽东汇报，一个访井冈山热正在全国兴起，其势与全国蓬勃兴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相互呼应。毛泽东不以为然。

汇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略微休息了一下，于16日晚到达上海。当时江青已在上海，华东区六省一市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正在上海热火朝天地举行。

毛泽东对上海正在演出的京剧现代戏是比较关注的，在与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和刘大杰漫谈京戏改革时，畅想了一个有关上层建筑改革的初步思路。毛泽东说：京剧改革的事要搞下去，目前先搞几个好的剧目

出来，到处去唱。唱来唱去逐渐使他们成为传统剧目，逐渐使现代剧占领舞台。

6月27日，毛泽东一行离开上海路过南京，在专列上接见了江渭清等江苏省主要负责人。

6月28日深夜，钱嗣杰等随毛泽东回到北京。此时，离开妻子陈惠嫣已100余天，一踏进家门，钱嗣杰就看到妻子已身孕明显了，一想到自己不久就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心里美滋滋的。

11月上旬，钱家又喜添一“千金”。军人情怀深厚的钱嗣杰再次给女儿取了一个男孩名字“钱军”。

## 四 韶山滴水洞的生活见证

1966年6月16日，毛泽东的专车抵达湖南长沙。第二天，他回到了故乡韶山，在“西方山洞”住了11天，直到6月28日，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个神秘的地方——韶山滴水洞。

7年前，即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来到了滴水洞口的韶山水库游泳，兴致所至，随口对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说：“小舟，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草房子，我老了来住一住。中南局有些小型会议……”于是，1960年湖南省委在韶山冲西南约5公里的一个三面环山的幽深狭谷之中修建了这山中别墅，代号为“二〇三工程”，即滴水洞别墅。

1966年6月17日下午，烈日炎炎，气温高达35℃，4辆汽车紧紧连成一线，奔驰在长韶公路上。这是毛泽东的车队。毛泽东坐在一辆灰色吉姆车上，为他开车的依旧是湖南省委接待处技术最好的司机赵毅雍。另一辆白色吉姆和一辆吉普车上，坐着湖南省公安厅长李强、副厅长高文礼和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钱嗣杰等。最后一辆大卡车，拖着毛泽东的8个大书箱和一些生活物资。

车队进入韶山冲，钱嗣杰只见毛泽东叫赵司机慢点开，并侧着身子往外看，车子过了一个S形的弯道，毛泽东回过头来看到了自家的祖居。此刻，一个在山脚下打柴的小女孩无意中朝行驶在中间的轿车瞥了一眼，恰巧毛泽东正拉开窗帘向外张望，小姑娘兴奋得差点喊出声来。她一溜烟跑回家，对父母说：“我看见毛主席了！毛主席住进滴水洞了。”很快，就有公安人员找到了小女孩，郑重地告诉她：“你看错人了，车里坐的不是毛主席，再不准你乱讲了。”

车进了滴水洞，在一号楼的大门口停下。毛泽东走下车，一股清风吹来，他深深地吸进一口清新的空气，顿觉心神舒畅。毛泽东高兴极了，连声说：“好地方！好地方！”紧接着他用手往左侧的山头一指，给第一次到韶山的钱嗣杰等当起了讲解员：“那是龙头山，龙头山过去叫黄田坳，从前以黄田坳为界，山那边是湘乡，山这边是韶山。韶山属湘潭，所以黄田坳又叫湘潭坳。”他又指着右边的山脉说：“那里是牛形山，山的形状像只水牛，小时候，我到外婆家去，就是走的这条山沟；东北边那个高山上有个大石鼓，过去常有老虎到石头上乘凉，所以叫虎歇坪。我的祖父母就葬在那块地方。”毛泽东用一口地地道道的韶山话给钱嗣杰等作介绍。

接受采访时，晚年钱嗣杰回忆说，毛泽东此次回故乡，是“绝对保密的”。他与韶山人之间，隔着戒备森严的警卫，看不到以前回故里那种热烈隆重的欢迎场面，看不到他与韶山人频频握手，看不到他和乡亲们亲切交谈……尽管毛泽东几次越过“禁区”警戒线。他想走向老乡的家里，都被随从人员挽扶回来；尽管韶山人想见见自己的领袖，但没有一个人能越雷池一步。甚至连毛泽东表兄，拄着拐杖前来会见表弟，也被拒之门外……

钱嗣杰及部分警卫住进了2号楼，毛泽东住进了1号楼。毛泽东在韶山的11天，新闻界没有作任何报道，后来报纸上刊登的消息，隐去了具体的地方。外国情报机关想尽各种办法，也一直未能探出中国的头号人物此时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当时的中央要员刘少奇等只知道毛泽东到了湖南，却不知道他住在何处，甚至连江青也摸不着方向。当然，知道真实情况的要算毛泽东最信得过的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每天从北京派专机为毛泽东传送文件，又从毛泽东处带回一些批阅文件。汪东兴的助手、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和专职摄影师钱嗣杰等陪同毛泽东南下，与他形影不离。

在晚年，钱嗣杰这样回忆：“去了以后没有对外报道，中央个别领导知道，地方很多都不知道。主席到滴水洞也是休息，在那儿也没什么活动，每天大半的时间在室内伏案工作，任何外人都看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累了便出来散步，一般是下午4点左右，从1号楼走到韶山水库大坝边。不过，散步少，比在北京和在外地少。那时候好像气氛不一样，他在屋里办公的时间比较多，出来得并不多。”钱嗣杰回忆到，住在滴水洞的毛泽东寡言少语，神情凝重，不像以往那样与工作人员交谈，工作人员也生怕打扰他的思绪，连运送东西都尽量绕道走。

住进了1号楼后，毛泽东望着葱绿的群山，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时值仲夏，气温较高，工作人员从长沙用卡车拉来冰块，分放在几个大木桶里，用电风扇把冰块吹融变成冷气，使室内温度降低。毛泽东幽默地说：“这种‘土冷气’不错嘛！”

毛泽东与水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是他意志和性格的流露。6月21日，晴空万里，烈日当空。下午2点左右，73岁高龄的毛泽东在几名水手的陪同下，来到了波光粼粼的韶山水库。毛泽东在水中游动，不时地表演“睡觉”、“坐凳子”、“立正”、“稍息”等动作。钱嗣杰坐在小木船上，摄下了一组珍贵的镜头，并感受到主席在游泳中的快乐。

游了近40分钟，陪同人员送上香皂，毛泽东把全身擦得都是泡沫，一头钻下水洗了个干干净净，这才换好衣服坐在藤椅上休息。看主席正打着二郎腿，微笑着看着自己，钱嗣杰立刻拍下了这一瞬间。因为滴水洞之行是保密的，钱嗣杰当年拍的那些照片当时一直都是“秘密资料”，没有对外公开。

次日上午，毛泽东从房间走出，看到大门口有一张轮椅，出于好奇，便坐了上去。于是，高文礼和主席卫士长曲琪玉推着就往外走，钱嗣杰和张耀祠跟在后面。坐在轮椅上，毛泽东左看看，右瞧瞧，都是青山和大沟、溪水。群山依旧，溪水如常，他没有多少兴味了，说：“哎，我们还是往回走吧！”这样，大家推着他从原路返回。回来后，毛泽东同每人照了一张相。

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居住的日子，正碰上湖南省在韶山宾馆召开省、地、县三级负责人会议。6月26日，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一些到会代表，并在滴水洞1号楼前与湖南省委、湘潭地委、湘潭县委、韶山公社等有关负责人合影留念。接见结束时，毛泽东对大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钱嗣杰当年所摄的那张照片现在还陈列在滴水洞1号楼的小厅里。

毛泽东原定6月28日下午离开韶山。28日清早，他突然通知张耀祠

上午8时离开滴水洞。

7点多钟，毛泽东从1号楼走出来，到坪里与大家合影留念。钱嗣杰一共拍了3张合影。第一张是主席和随行的中央领导、湖南省委负责同志的合影，约10余人。第二张是主席和随行人员、省地负责同志、全体工作人员的合影，十几名服务人员蹲在前排。第三张照片是张大合影，共二三十人。

照完相，毛泽东和人们寒暄。湖南省委代书记王延春问道：“主席，您回来了，是不是可以让电台、报纸发个消息报道一下？听说还拍了不少精彩的照片。”正在身边忙着拍摄的钱嗣杰只见毛泽东摇摇头：“回来没有接见他们（乡亲们），他们也不晓得我回来了，那还发什么消息、登什么照片？”

之后，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警卫员打开了毛泽东的车门。本来，主席应该上车了，可是他又从门楼的水泥斜坡走了回去，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坐了下来，东看看，西瞧瞧，一句话也没说，后来还喝了一杯“韶峰云雾茶”——他不慌不忙地喝完了最后一口，还把茶叶捋到嘴里。之后，毛泽东慢悠悠地站起身，一步一步地走出1号楼，钱嗣杰看出他的步伐显得很沉重。

这时，有人把廖时禹介绍给毛泽东：“主席，小廖是给您老人家看房子的。”毛泽东那双海绵般柔软的大手，一下握住了小廖，一字一板地说：“你要把我的房子看好啊，我还要回来的呀！”廖时禹激动地回答：“主席，请您以后多回来呀！”

9时许，汽车的马达响了，毛泽东离开滴水洞。车子驶出洞口，拐过一道弯，毛泽东朝他的祖籍地东茅塘深情地望了一眼。汽车开到毛氏宗祠门前，毛泽东叫赵师傅停了一会儿，他掀起窗帘，留恋地看着毛氏宗

祠的门庭。过了这段路，毛泽东再也没有左顾右盼。

毛泽东悄悄地离开韶山，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尽管他特别思恋故土，日后还多次谈到以后还要回韶山。他本人也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次却成了与故土的永诀，给韶山留下的是几多思念，几多遐想……

当天，毛泽东在张耀祠等人的陪同下，经长沙到武汉。

不久，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想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显然，他已经下决心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他说：“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焦了，烧焦了就不好吃了。”许多党史专家都认为，毛泽东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指导思想、需要发动的规模等就是在“滴水洞”的思考中形成的。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久了，两三年足矣！”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这场运动会失控。

## 五 快门外的魅力长者

1966年7月1日，风和日丽，钱嗣杰和护士长、卫士长等8人陪着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散步。散完步后毛泽东对大家说：“今天是党的生日，咱们不拍全体合影了，我和每个人都照一张，好不好？”大家一听直鼓掌，说太好了，就搬来一张椅子，让主席坐在那儿，一个接一个照合影。钱嗣杰给每个人拍了照片后，毛泽东就问：“小钱，向来都是你给别人照，今天谁给你照？”钱嗣杰十分激动，迟疑了一下，说：“那就卫士长吧。”

说着，钱嗣杰将照相机对好距离、光圈，随后递给卫士长曲琪玉，说：“你按快门就行了。”随即，钱嗣杰跑过去，幸福地站在了主席身边。曲琪玉按钱嗣杰的操作拍了一张，可是钱嗣杰担心效果不佳，就请他再按一张，说：“不行，你再按一张，不保险。”这时，一向公平的毛泽东笑开了，说：“小钱，你多照了一张哦！”钱嗣杰也偷偷地笑了。钱嗣杰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主席很爱说笑话，一般工作人员在他身边没有很拘束的，他像我们的长辈，很随和。

7月16日，毛泽东才公开露面，在武汉畅游了长江。当年家喻户晓的经典新闻照片《毛主席畅游长江》，很少人知道就是毛泽东的专职摄

影师钱嗣杰拍摄的。

这天上午，武汉市5000名游泳健儿正举行第11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大江两岸的扩音器，播送出悠扬的《东方红》，激荡着大家的心。

就在比赛刚刚开始时，一艘快艇乘风破浪驶在江面上。不多久，与逆向而来的游泳健儿相遇，一个学生认出了身着浴衣站在快艇上的毛泽东，便大声欢呼：“是毛主席！是毛主席！”于是，整个长江武汉段沸腾了，立即响起了高呼声：“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

紧接着，游泳大军高举百面红旗，朝着毛泽东的方向游了过去。在被旗帜映红的江面上，在两岸江堤上，无数人高喊：“万岁！万岁！！毛主席万岁！”与此同时，停港的船舶汽笛齐声长鸣，向毛泽东表示敬意。欢呼声、汽笛声汇成一片，震撼着武汉上空。



1966年，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左起：钱嗣杰、杨光、商来宝、张玉凤、吴连登、毛泽东、周福明、刘小燕、吴旭君、李连庆、李华）。舒世俊 摄

这时，钱嗣杰坐在一条木船上，准备为毛泽东拍照。只见毛泽东神采奕奕出现在甲板上检阅正在与江水搏斗的游泳大军。毛泽东看到游泳健儿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革命精神，十分高兴，一会儿走到快艇这一边，一会儿走到快艇那一边，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向大家频频招手，并高呼：“同志们好！同志们万岁！”

一时间，震天动地的欢呼声，淹没了滚滚长江的风浪声。钱嗣杰十分激动，趴在船头不断地拍摄毛泽东招手致意的镜头。

就在这人欢水笑、群情沸腾的时刻，毛泽东乘坐的快艇驶至武昌大堤口附近。他迈着稳健的步伐，从船舷的扶梯上走下来，先在水里浸了一下，然后便伸开双臂畅游起来。钱嗣杰一看手表，这时是上午 11 时整。

汛期的长江，水流湍急，浪涛滚滚，拍打着江岸。毛泽东在浩瀚的江面上，时而挥臂侧游，拨开层层波涛，破浪前进；时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陪同游泳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一群矫健的男女青年，紧跟在毛泽东前后。

钱嗣杰坐在一艘小木船上一直跟着毛泽东拍照。下水后的毛泽东高兴得像个孩子，不多时就喊钱嗣杰等工作人员也都下去游。钱嗣杰下水游一小会儿，又上小木船拍一会儿。期间，钱嗣杰看到毛泽东一会儿仰泳，一会儿侧泳，一会儿漂浮，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于是想向主席学仰游、漂浮的技术，可就是学不会，身子一下子就歪了，主席却纹丝不动地躺着，悠然自得。

毛泽东一面击浪前进，一面同周围的人谈笑风生。一位女青年告诉毛泽东：“我这是第二次在长江里游泳了。”毛泽东笑着对她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并说：“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后，在快艇甲板上向江中的数千武汉游泳健儿招手。  
钱嗣杰 摄。



1967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游泳》，并配上钱嗣杰所拍的相关照片。

钢铁公司附近，游程将近30华里。钱嗣杰看到毛泽东登上快艇的时候，精神焕发，毫无倦意。

这一天，因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各国代表来到武汉游览，乘船观看了武汉群众横渡长江比赛的盛况。他们看到毛泽东后热烈欢呼，放声高唱起革命歌曲。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得知钱嗣杰等拍摄了大量有关毛泽东畅游长江的照片后，十分高兴，通知钱嗣杰尽快将底片送回北京。

将近12时，辽阔的江面上刮起5级风，浩浩江面波涛滚滚。停候在江心的快艇向毛泽东开来，准备迎接他上船。王任重几次请他上去休息。毛泽东问：“游了多少时间？”周围的人说：“45分钟了。”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还不到1小时嘛！”接着又继续向东游去。游过65分钟，王任重再一次请毛泽东上船休息。毛泽东风趣地说：“你是这里的省委第一书记，我听你的命令。”

毛泽东从武昌大堤口顺流而下，一直游到武汉

7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毛主席畅游长江》的通讯和钱嗣杰所拍的毛泽东在快艇甲板上检阅游泳健儿、毛泽东乘风破浪畅游长江等照片。当天,国内各主要报刊都刊发了钱嗣杰所拍的经典新闻照片。毛泽东对钱嗣杰所拍的照片也很满意。

毛泽东畅游长江,是一次万众瞩目的富有象征意义的活动。《人民日报》在26日发表的社论中说:“我们一定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理论,也要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跟着党,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很快,“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在丰泽园内住了两三天后,毛泽东觉得当时趁他到南方巡视期间装修过的房子住起来总是不舒服,于是便到中南海游泳池的更衣间里住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他在这里一住就是10年,直至病逝。

红卫兵运动的高潮,始于“八一八”。1966年8月18日这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不寻常的日子。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文革”发动的大会,北京和外地的100万红卫兵参加了大会。这就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大会,钱嗣杰一同前往。

大会安排在18日上午7时半开始,由陈伯达主持,林彪、周恩来和红卫兵代表讲话。接着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和接见。

为了接见红卫兵,凌晨毛泽东说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适合主席的军装。中南海警卫一中队干部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毛泽东试穿了他的军装勉强合适。于是,



196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讲话。钱嗣杰 摄

毛泽东就表示身着这套军装接见红卫兵。当天5时许，身着军装的毛泽东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红卫兵看到主席后，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次日，《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都刊发了钱嗣杰所拍摄的毛泽东身着军装的大幅照片。

8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该报记者吕相友拍的一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招手、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的照片。这幅照片发表后，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没想到有一天，保定的一帮造反派硬说照片有问题，并表示要集中几百人找人民日报社算账。报社得知消息后很紧张，如临大敌，马上跟保定有关部门联系，进行劝阻，让他们派少数代表来京洽谈。代表来京后说：“照片有一只脚在踢毛主席的肚子。”报社解释说：“那不是一只脚，是毛主席手里拿的帽子。”代表说：“那就没事了，送我们一人一张照片吧。”

钱嗣杰当时不时地听到类似的红卫兵“兴师问罪”的轶事，他引以为戒，设法拍好领导人的照片，争取万无一失。选用照片时，细心精制，力求达到完美无缺，总怕出纰漏有损毛主席的形象。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这次，工作人员已给毛泽东定制了军装，并且钱嗣杰等身边工作人员都穿上了军装。毛泽东每一次接见红卫兵，钱嗣杰都跟随在主席身边拍摄资料照片与新闻照片。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的红卫兵有50万人。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真正走上街头，横扫‘四旧’。”钱嗣杰感受到了红卫兵狂热的欢呼。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钱嗣杰 摄

在1966年，毛泽东曾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每接见一次红卫兵，《人民日报》都要用大幅照片，并出整版画刊。据统计，4个月内《人民日报》刊发接见检阅的照片236幅，其中整版画刊42版，画刊有时只放两三幅照片，放大后很有视觉冲击力。钱嗣杰的照片经常被刊登在重要位置。钱嗣杰回忆说：

“毛主席乘敞篷汽车

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的场面，我拍了不少。当时共有三四辆吉普，我乘的是毛主席前面的一辆，使用‘徕卡’相机，因‘徕卡’按一次拍一张不方便，以后便换了装有马达的‘尼康’FM2。”

这年国庆节，钱嗣杰从上午开始就紧随毛泽东。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民主人士检阅游行的各民族、各界代表和红卫兵队伍。与往年不同的是，没有阅兵。参加游行的主要成员是红卫兵，到12点多游行才结束。钱嗣杰这样回忆：“当时每年国庆都组织群众游行，大的节日活动和重要的集会都在天安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时在中南海同工作人员合影（前右一为钱嗣杰）。

门广场举行，一般我都参与采访，而且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工作。我们要拍摄民主党派人士、外宾和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群众代表、英雄模范人物，但最主要的任务是拍好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毛、刘、周3位。”

无论是在栏杆前的检阅，还是在大厅里和民主人士握手寒暄，毛泽东的举手投足都被一一摄入钱嗣杰的镜头。拍毛泽东在城楼上挥手的正面照有一定难度，栏杆前可供记者回旋的余地很小，相机一举，镜头和领导人便近在咫尺，拍出的效果很容易失真。钱嗣杰不得不仰着身子，尽量拉开距离，姿势很难拿捏，也很危险。怕掉下城墙，一只脚的脚尖还要死死钩住下面的一根管子。每当这时，毛泽东、周恩来等总要关切地提醒钱嗣杰小心，有几次周恩来、陈毅等甚至亲自上前紧紧拉住了钱嗣杰的衣角，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除了拍好国庆照片外，钱嗣杰还有一个“秘密”工作要做——及时“扔”出照片。按规定，新华社上午就要收到记者拍摄的“国庆第一卷”，并赶在中午前抢发出去。上午10时20分左右，国庆第一卷胶卷须送出

天安门。钱嗣杰身处严密“封闭”的天安门城楼上，照片怎样发出去呢？方式很有趣，扔到城墙下即可。

隆重的庆祝仪式，沸腾的游行人群，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天安门广场，可谁曾注意到，站在城楼上的钱嗣杰正把胶卷用黑口袋包好，向城下扔去。扔点一般选在天安门城楼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城下早已有人焦急等候，送卷的汽车停在石碑胡同待发，司机（多数时间是董克旺）拿到胶卷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新华社。

其实，大会一宣布开始，新华社编辑部的同志就各就各位了。暗房师傅把药液、相纸早就准备停当了。照片放出来后，编辑马上选辑。他们分工也很细，有负责编选城楼上的领导人的，有负责编选城下的。游行队伍的照片，也分军队、工人、农民、学生。大家各司其职，忙而不乱；目的只有一个，保证及时发稿！

因此，中午，盛大恢宏的国庆新闻照片就已准时发往世界各地。钱嗣杰所拍摄的照片因为胶卷及时“扔”出，成了“国庆第一卷”。

据悉：这年国庆节当天，以“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被当做贵宾请上了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活动，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在城楼上，毛泽东热情地握住时传祥粗糙的手，询问他的工作情况，亲切问候了他。

这年国庆当晚9时左右，天安门广场上空绽放出朵朵绚丽的焰火，广场上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为了拍摄好焰火，钱嗣杰选择好角度，考虑好是否需要前景，认真分析焰火升起的高度后，把相机固定在三脚架上，等焰火升上夜空到达最高点。焰火刚开始散开的时候，钱嗣杰打开快门，用慢速度作较长时间的曝光，等到火花展开，像伞状悬挂在天空中时，他及时关闭快门。于是，一次曝光完成了焰火的拍摄。

同时，钱嗣杰也试着多次曝光拍摄。第一次曝光时，他先把地面上的群众拍摄在底片的下半部（根据地面灯光亮度曝光），然后再进行第二次曝光，在焰火形象最美的瞬间将它拍摄在底片的上半部。有时，钱嗣杰嫌所拍摄的焰火不理想，试着进行第三次或更多次曝光，当然一不小心，很可以就会造成焰火互相重叠，出现画面混乱。好在钱嗣杰拍摄技艺纯熟，冲洗出来后每张照片都十分精彩。

毛泽东生前警卫队长陈长江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当天晚上7点多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大会堂西门外登车出发。当主席的车到达南长安街南口时，被红卫兵拦住了，他们一窝蜂似地涌上来，争着要看毛主席。主席的车一停，后面的车队全堵住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人海之中，任凭周总理和中央警卫局的同志怎么疏导也不管用。

这时，林彪下车高喊：“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到天安门参加晚会。”可是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副统帅”竟然指挥不动眼前的这些“红小兵”。陈长江回忆说：要看毛主席的人流洪水般地涌过来了，毛主席被挤伤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这危急关头，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带领警卫团的部队赶到了，北京卫戍区的机动部队也赶到了。在周总理的统一指挥下，两支部队硬是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驶进天安门。

虽然参加了一天的活动，毛泽东依然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他凭栏远眺，人群中“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毛泽东情绪极佳，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转身离开了城楼向电梯间走去。钱嗣杰和警卫战士很纳闷，赶忙跟在后面。毛泽东到城楼上参加活动，很少坐电梯，经常背着手走楼梯。这一次毛泽东乘坐电梯下楼，看来心情挺急迫。电梯稳稳降到地面，毛泽东健步穿过中间的城门，向金水桥桥头走去。

广场上的群众看到伟大领袖正向自己走来，个个心潮澎湃，欢声雷动。来到桥头，毛泽东停住脚步，远方五彩缤纷的礼花映红了伟人慈祥的面容，高大的身躯显得更加伟岸。领袖与群众离得那么近，彼此看得那么真切，中间没有布防，没有警卫，没有隔阂。毛泽东非常兴奋，向群众频频点头，既像和大家打招呼，又像在示意人们安静下来观看焰火。毛泽东率先垂范，微笑着坐在地上，双腿就势一盘，亲民形象跃然而出。这个时候，周恩来也从天安门城楼上快步跟了下来，见毛泽东席地而坐，也高兴地坐在金水桥桥头，两位伟人完全融于人民群众欢乐的海洋里。

北京的秋天夜冷风寒，警卫员担心主席受凉，掉头往回跑，想去搬把椅子。毛泽东立即摆手制止。一直未离左右的钱嗣杰正好站在两位领导人的对面，身后的群众已经向他高喊：“那位同志快坐下来，快坐下来。”钱嗣杰意识到自己挡住了大家的视线，可不能马上坐下，职业敏感告诉他，这“突发”的一切太感人了，太难得了，两位领导人笑得那么开心，那么自然，完全是领袖和人民心相通、意相连的真情流露，其效果不是摆拍、作秀所能达到的，一定要记录下这千载难逢的瞬间。这时，人们向着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还有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这个镜头太珍贵了，钱嗣杰迅速调整焦距，按动快门，一张珍贵的摄影作品就这样诞生了。

主席和总理兴致很高，一边交谈一边欣赏礼花，幸福而动人的情景持续了20多分钟。这是毛泽东在多次国庆活动中唯一走下城楼的一次，凭借过硬的职业素养，钱嗣杰为后人留下了空前绝后的经典一刻。

国庆活动结束后，新华社记者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剪辑、合成天安门上领导人的大合影。钱嗣杰回忆道：“这个大合影画面，不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形象要好，其他人物也丝毫不能差，包括外宾、民

主人士等等。往往一次拍摄的底片不能保证所有人物都符合标准，而且大会进行中，城楼上的人有相互交谈的，有到里面休息的。但等着上头版的这幅大合影，一个人也不能缺，不能有歪头、扭身子的。为此，我们只有进行剪辑，组合。先把天安门背景选择好，这是一幅大长条照片，再按次序把人物一个个地贴上去。照片都是当天拍的，但人物是从不同的底片上选出的。搞好了，送周总理审查，通过了，我们才算完成任务。”笔者笑言这是“假照片”，钱嗣杰笑开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技术条件下，只有这么做了。”

在主席身边工作时，组织要求不准记日记，即使有会议记录也要及时处理。至今，钱嗣杰没有留下一点资料，包括所摄照片也全存放在新华社图片库里，当年所记的笔记本被新华社定期收回——每本笔记本都编号发放，上交后一本换一本。

当时，毛泽东出席群众性活动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新闻单位也派记者拍摄，于是有些记者发表出来的照片中会有拍摄原因造成主席口形问题、目光问题、袖子问题等引发社会问题。“文革”初期，为防止群众挑领导人的照片没有拍好而捣乱，照片发表时就不再署名，钱嗣杰所拍的大量照片便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发表。

在钱嗣杰的印象里，毛泽东出门一般不坐飞机，基本上是坐专列，且专车前还有一列前导车。说到主席为什么要坐火车视察，钱嗣杰这样解释：“坐火车出去很方便，什么都可以带上。主席在火车上办公、会客和休息。到地方上召集干部开会也方便，下去参观或者调查、调研都很方便。不然到一个地方，要找宾馆、要欢迎、要招待，很麻烦。主席这种做法我觉得很好，给老百姓带来了方便。所以，我们跟主席下去检查工作，到哪儿都是坐专列。到了这个省，可能停一天、两天、三天，

都没准。他感觉到这个地方需要停下来看一看，就多待几天，不需要的話一两天就走了。火车到了那里，就找一个工厂的支线，或者机场的支线停下。下边的干部上车来汇报，汇报完了我们就走了。要是主席想到基层看看，就派一辆汽车来，主席就坐车到农村、工厂走一走，详细了解地方的工业、农业等生产情况，以及人民的生活情况。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以车为家，吃住和学习都在车上，时间有长有短。在南方，车厢晒得像火炉一样，我们和主席共受炎热之苦。有一天晚上天气特别热，我们几个人睡在主席的会议车厢里，毛主席看见我们笑着说：‘欢迎来嘛！’主席的工作方法很简单，就是为了不给地方上添麻烦、不给老百姓添麻烦。他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办公，中央的文件就送到哪儿。”然而，钱嗣杰记得，毛泽东有一次例外乘坐了飞机，由武汉到上海。

原来，“文革”伊始，武汉大乱。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初，武汉地区冒出了一大批“造反派”组织，名气较大的有“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等。这些造反组织大多把矛头指向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王任重，他们不但在武汉游行、集会、贴标语，还派出“战斗队”到北京活动，声称要揪出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

此时，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策划下，陶铸、王任重一起被打倒，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武汉市委、市政府领导干部也“靠边站”，武汉地区的形势更乱，造反派甚至冲击了军区支左指挥部。

日益动荡的形势，使得群众中持不同观点的两派势力之间矛盾加深。1967年5月16日，一些群众组织借用“百万雄师过大江”成立了武汉地区“百万雄师”联络站，公开站在武汉军区一边。这样，武汉地区出现了观点相对立的两大派组织，局势更加复杂。

7月，武汉已持续十几天高温。政治形势似乎与自然气候成了正比。十几天来，两派斗争不断升级，各类矛盾日益激化。机关瘫痪、工厂停产、社会动乱、武斗频繁。特别是林彪江青一伙直接插手，操纵所谓“揪军内一小撮”致使武汉局势的中流砥柱——武汉军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武汉军区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责难，无法开展工作。

武汉地区日趋严重的形势，很快就反映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忧心忡忡，焦虑不安。7月13日，毛泽东在院里踱了片刻，对周恩来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当晚，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线南下。

这是“文革”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外出，汪东兴向随行的警卫部队说，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要有不惜流血牺牲的充分准备。在钱嗣杰的印象里，过去毛泽东外出，总是嫌去的人多，怕给地方添麻烦，而这次汪东兴特别提出多去些人。

14日早晨，周恩来到达武汉，随行的有海军司令员李作鹏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中午，到四川解决两派争端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立金带着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4个人，也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达武汉。

毛泽东抵汉后，住在东湖宾馆梅岭1号。周恩来住在百花1号，谢富治、王力住在百花2号。为了工作方便和安全方面不出意外，陈再道、钟汉华也搬到了东湖宾馆乙所。各路人马齐聚武汉，武汉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陈再道对此充满信心。

15日、16日连续两个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李作鹏等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等地的情况，并讨论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方法。对于如何处理武汉问题，毛泽东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

把其头头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让谢富治、王力派出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并让周恩来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央领导人多次做陈再道、钟汉华的工作。要他们公开支持造反派，并要主动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对于其他的，陈再道还容易接受，但要他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18日晚，周恩来带陈再道、钟汉华到梅岭1号见毛泽东。陈再道有点气呼呼地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笑着解释说：“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成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做他们的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毛泽东的一番话，使陈再道、钟汉华沉重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们觉得毛泽东对武汉军区还是信任的，决心忍辱负重，把工作做好，让武汉的局势尽快稳定下来。

毛泽东会见陈再道、钟汉华之后，周恩来因回京开会，离开了武汉。毛泽东指示谢富治、王力专门设一个接待站，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谢富治、王力却阳奉阴违、迫不急待地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戴上了造反派的袖标，又是观察据点、工事，又是慰问武斗负伤人员，并召开大会。王力在会上声称：“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19日，造反派以无数个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反复播出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及王力讲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

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谢富治、王力的讲话，把武汉三镇搅得一片混乱。广大军民怒不可遏。“百万雄师”更是怒火中烧。一时间，声讨谢富治、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的震天呐喊响彻江城。这天晚饭后，湖北省直机关的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汉某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来到军区大院门口，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接着，“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乘着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笛的消防车一起涌进军区大院。陈再道知道，如果不及时地控制住局面，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一面派人做群众的工作，一面将情况告诉谢富治、王力。但是，王力既不接见群众，也不采取具体措施控制事态扩大，似乎“浪头越大越好看”。

等候在军区大院的群众见王力拒不接见，不顾军区领导的劝阻，一齐涌向谢富治、王力的住所东湖宾馆，大有不见到王力誓不罢休之势。20日清晨，一夜未眠的陈再道赶到谢富治、王力的住处，想找他们研究一下如何控制当时的局势。他刚进谢富治的房间，“百万雄师”的200多名代表就愤然地冲进来，强烈要求王力出来回答问题。王力躲在隔壁房间不敢出来。陈再道急劝群众代表到外面去谈话。

陈再道和谢富治领着这200多人来到住所后的一片草坪上席地而坐，开始“谈判”。“谈判”的结果很好，气氛十分融洽，谢富治还答应下午接见他们。群众代表得到许诺，答应立即离开东湖宾馆。这时，躲在房间的王力一看这种气氛，也走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恰在此时，以独立师和二十九师战士为主的数百名群众冲了进来，喊着要抓王力。王力急忙跑回屋里，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坚持不走，

北航“红旗”的几个人开口骂人，激起了在场群众的更大义愤。他们强行将王力抓起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

接着，武汉三镇像炸了锅一样，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和驻军指战员，排成4路纵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一路张贴标语，高呼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这次游行示威行动一直持续到23日。

群众抓走王力以后，陈再道心急如焚，马上报告了住在梅岭1号的毛泽东，毛泽东指示：立即找回王力。陈再道和钟汉华商量，决定陈留在东湖宾馆，以保卫毛泽东的安全，钟汉华和军区副司令孔庆德负责找回王力。

钟汉华赶到军区大院，通过多方面做工作，才把王力悄悄地弄出来，转移到比较安全的二十九师师部6号楼。周恩来得知武汉发生的事后，感到事态严重，当日从北京赶到武汉。为了保证王力的安全，他指示武汉军区迅速将王力接到东湖宾馆。可是，当军区负责人赶到6号楼一看，王力却“失踪”了，周恩来立即命令孔庆德和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找回王力。

原来，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窥测形势，认为有机可乘，便编造谎言对刚转移到二十九师师部的王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在搞暴乱，已经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叫喊着要抓王力。于是，王力便跟着张昭剑躲到了6号楼南侧的小洪山上。

21日中午，武空副司令刘丰得知王力藏在小洪山上，立即蹿到那里，他一见张昭剑便破口大骂武汉军区，并问张昭剑：“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陈再道的？”张昭剑狡黠地说：“我是听空军的……”这样，王力被刘丰接到了武汉空军司令部。

武汉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林彪、江青一伙认为大有文章可做。林彪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危言耸听的信，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修改。戚本禹认为事关重大，又去找陈伯达、关锋商量。最后，将修改稿送林彪、江青审定签名，由邱会作乘专机送到武汉面呈毛泽东。信中说：“外面形势不好，主席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请及时转移……”毛泽东看完信后，将信将疑，决定转移上海。

因为司机是武汉人，不了解他的情况。考虑到钱嗣杰会开车，警卫部队一中队丁钧悄悄让钱嗣杰坐在大卡车司机的副驾驶座位上，丁钧在最外边，钱嗣杰在中间。一旦发生司机有什么意外动作，就可以立即干掉他，让钱嗣杰代理他驾驶。毛泽东所坐的车在这之前的一辆军用吉普上，车上有警卫战士及主席的物品等。

车子穿过沉睡的武汉街道，通过长江大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顺利通过各派关卡，到达王家墩机场，乘苏制伊尔-18型飞机飞抵上海。

22日，周恩来在王家墩机场召集军区负责人开会，并让李作鹏、刘丰参加。决定叶明、孔庆德暂时主持军区工作，并要陈再道、钟汉华赶快表态，争取主动，以利于稳定武汉局势，稳定武汉军区的领导班子。之后，周恩来因外事活动，匆匆离开了武汉。

周恩来走后，李作鹏有意扩大事态，给武汉军区施加压力，指使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汉单位发电报，声称：“七二〇”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还授意东海舰队发表《严正声明》，“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刘丰也从中作手脚，把从吴法宪那里得到的消息马上告诉张昭剑，并煽动说：“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七二〇’是林彪派邱会作来处理的，武汉军区有鬼！”于是，张昭剑公开宣布二十九师脱离武汉军区，扬言

要把军区领导“统统打倒”。

22日下午，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为了制造声势，林彪、江青组织了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这两位武汉归来的“英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由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谢富治的所谓汇报。会议决定：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七二〇”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看他们敢不敢来，如果不敢来，就证明他们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林彪的这一决定，把周恩来处理“七二〇”事件的设想全部推翻了。

23日清晨，中央文革小组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武汉“七二〇”事件。同时，武汉军区收到了中央召集主要负责人进京开会的电报。翌日清晨，陈再道、钟汉华等飞抵北京。陈、钟一行一住进京西宾馆，在林彪、江青操纵下，先是北京文艺口造反派冲击京西宾馆，后是“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他们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北京街头还贴满了“打倒陈再道！”、“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标语。江青、叶群、戚本禹、关锋在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下，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转悠，以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25日下午，按林彪的部署，中央文革小组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欢迎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为了制造声势，林彪亲自出席了大会，还邀请了在京汇报工作的黄永胜等人参加。

26日下午，中央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了常委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当陈再道等武汉军区领导进入会场，

即被安排在被告席前，不许就坐，只许站着。

会议一开始，谢富治就抢先放炮，定调子，急不可待地发言：“‘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暴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接着，吴法宪发言：“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叛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

27日，林彪主持会议，宣布改组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由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也坐上了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的交椅。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〇”事件。

1969年底，钱嗣杰被怀疑与“五一六”分子有关，虽然不久之后情况就被查清，但是钱嗣杰从此失去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机会。这时，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师杜修贤兼任毛泽东的摄影工作，因为“文革”后期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身体都不是很好，而有关国事活动相对减少，不再有必要分设专



1969年4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  
钱嗣杰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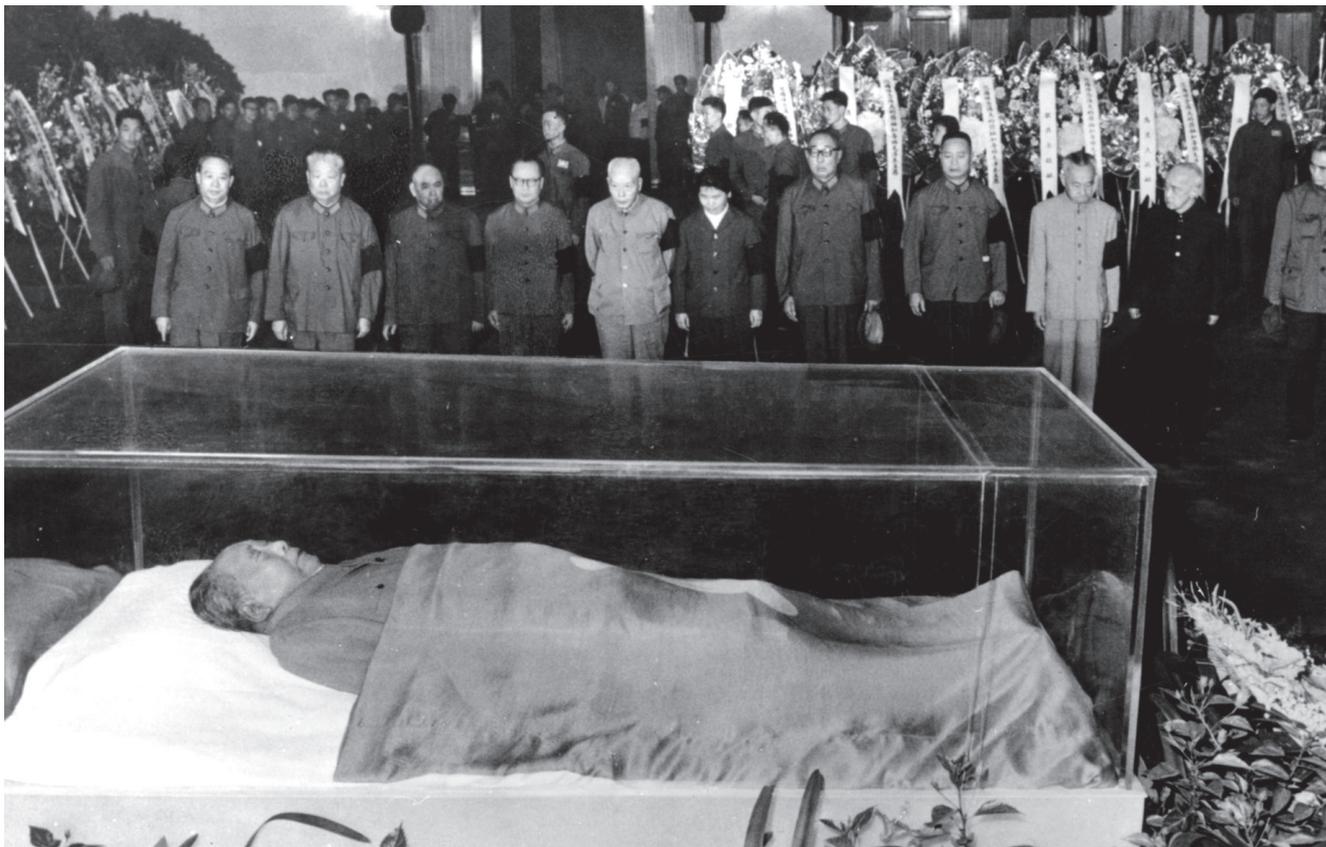
职摄影师。

1976年9月，毛泽东与世长辞。“布置灵堂时，我就在那儿了。这是最后一次近距离地看主席，他安祥地躺在鲜花丛中，身上盖着党旗，老人家头发稀疏，脸上的老年斑清晰可见，一下子，以往朝夕相处的一幕幕都涌现在脑海。”

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半夜，遗体移到中南海对面的人民大会堂，让人们吊唁。作为新闻采访组的工作人员，钱嗣杰每天都要拍摄追悼场面的新闻照片。那些天，钱嗣杰每天都守在灵堂里，整天吃不下饭，眼泡儿始终是肿的。他回忆说：“来吊唁的有工人、农民，还有学生，那种悲伤是一点也不带掺假的，学生们哭得最伤心，尤其是女学生。虽然是在工作，但是每每看到这些场面，我自己的泪水都沾湿了相机的取景框。”

这些年来，每年的9月9日、12月26日，钱嗣杰都会到毛泽东纪念堂，看一看他那熟悉的身影，追思他那光彩照人的一生。采访中，钱嗣杰说：“我们不要‘神化’他，也不要用完人的标准要求他，他并不是神，也不是完人，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富有人格魅力的长者，在中国的历史上，他永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我始终深深地记着他，缅怀着他。”他还回忆，毛主席日理万机，办公常至深夜，非常辛苦。为了调节身心，毛泽东有时会去游泳、散步、跳舞或打乒乓球。“这时，主席会和身边人员有说有笑，幽默健谈，我们一点也不拘谨。”

1998年和2001年，钱嗣杰被授予“中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004年，获得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的“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称号，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健康老人”。与此同时，1993年他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当选为第六次全国文化大会代表，1997年先后获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与中国摄影家协会颁发的荣誉证



为毛泽东主席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钱嗣杰 摄

书，2006年12月在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庆典大会上被授予“突出贡献摄影家”称号。有关新华社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先进个人等荣誉更是举不胜举……

钱嗣杰的晚年生活简单而丰富多彩。已是耄耋之年，但是他不服老，骑车、游泳、跳舞、旅行，样样都行，还经常玩玩手中的新“武器”——数码相机。他拥有两部“尼康”牌的数码相机，总是随身携带2G、4G的两块存储卡，随走随拍。不过，如今拍摄的不再是新闻照片，而是旅

游风光照及出席各种活动的现场照片。

当年，在新华社新闻摄影部工作期间，器材装备、技术手段、发稿方式等方面相对比较落后，采编人员使用的是胶片相机、灯泡式的闪光灯、显影罐、稿纸、剪裁尺、裁刀，通过车辆运送和邮寄等方式发稿，发稿时效滞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华社的新闻摄影工作方式悄然变化。过去那些落后的老相机、显影罐、剪裁尺等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高级数码相机、电脑发稿和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办公大楼。钱嗣杰十分高兴地看到，目前新华社正充分依靠迅猛发展的网络、信息和计算机技术，逐步建起了覆盖国内和世界主要地区的采、编、发和传输的通讯技术系统，从记者拍摄图片到发稿时效各个环节均发生



钱嗣杰夫妇及大女儿与父亲、继母、姐姐和两个外甥在北京合影。



2009年7月，钱嗣杰与夫人在黑河，重温过去的岁月。

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钱嗣杰是中国老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新闻摄影学会荣誉顾问、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顾问。因他是摄影界的老前辈，也因为他曾是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且在多个领导人身边工作过，在业界知名度很高。由于他的特殊经历，社会上有些团体和单位想利用他的名望搞经营或商业性活动赚钱，都被他婉言谢绝。但对于一些公益性活动，比如摄影界或党史界举办的有关新闻发布会、座谈会、展览会、评奖会及各种庆祝或纪念活动，邀请他出席，如果时间安排得过来，他总是积极参加。

2008年10月底，第三届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新馆开馆1周年庆典在井冈山举行。钱嗣杰作为嘉宾出席。自1965年初夏随毛泽东首次到“天下第一山”井冈山，钱嗣杰便深深爱上了这革命之山。晚年，他多次重上井冈山。



新闻摄影家钱嗣杰正在欣赏小朋友画画。

山因革命而高，地以人杰而灵。漫步井冈山，每一座山峰都是一部英雄史诗，每一条小径都凸现出一种沉着和坚毅的品格，似乎每一杆竹子都是中国革命的见证，每一阵风过都有先烈的呼唤和叮咛。走在井冈山上，俨然在读一部红色经典。烈士陵园、茨坪、黄洋界、大井、领袖峰、笔架山……钱嗣杰携夫人游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有新的感受，不时地用手中的数码相机拍下一个个值得回味的镜头。

在“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一块块展板、一件件文物、一个个场景、一张张图片，构成了一个个精彩专题，让井冈山精神鲜活呈现出来。在这座建筑内，通过文字、图片、视频、雕像、文物等各种方式展示了井冈山斗争的革命历史。在这里，可以看到燎原的星星之火；在这里，可以感受朱毛会师的振奋；在这里，可以聆听南



1965年10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钱嗣杰 摄

昌起义的枪声；在这里，可以体会英烈就义时的悲壮……钱嗣杰夫妇边走边品。

看到自己在43年前所拍的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一张珍贵照片，钱嗣杰的思绪又回到那年那月。解说员不失时机地提出：“下面，我们欢迎钱老亲自讲解他当年所拍的照片背后的故事。”掌声中，钱嗣杰“秀”了一回“讲解员”的角色，是那么亲切、真实。

何止井冈山，韶山、武汉、上海、广州、沈阳、长春、哈尔滨、天津……

一个个昨天战斗过、脚踏过的地方，一个个红色遗址，成为钱嗣杰丰富多彩的“晚年旅途”首选地。

晚年的钱嗣杰健康并快乐着，忙碌并享受着。他皓首谢顶，却脸色红润，精神矍铄的他耳聪目明，行步如风。如果他同我们一起挤地铁、公共汽车，一般人无法知道身边的这位老人曾经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华国锋等朝夕相处。

## 六 触及心灵的对话

历史学家用笔书写历史，而钱嗣杰亲历着传奇，用相机真实地记录着历史。钱嗣杰曾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军事摄影记者、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摄影组组长、毛泽东和华国锋随身专职摄影师、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兼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副组长等，见证共和国的纷飞战火，亲历共和国的国事风云，记录鲜为人知的外交内幕，定格伟人的红墙瞬间。走近这位新闻摄影大家，俨然回放一个个有关红色传奇的镜头。笔者曾多次与钱老对话，现摘要如下：

问：钱老，您是当之无愧著名的新闻摄影家，曾被授予过“突出贡献摄影家”称号。如果让您来给“新闻摄影”下定义，您如何下？

答：什么家不家的，那是你们媒体、作家戴给我的帽子，“突出贡献摄影家”称号倒是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的，我受之不起。至于给“新闻摄影”下定义，那不是我们这些新闻摄影人的事，搞新闻理论研究的人可能说得更准确。在我看来，“新闻摄影”就是指新闻记者拿着摄影器材到新闻现场真实记录新闻瞬间，并附上文字加以说明所摄新闻图片的报道形式或报道方式。它更多表现的是一种视觉新闻，传递



佩戴军功章的钱嗣杰。

有新闻信息，带纪实性。我认为，新闻摄影是一项需要精力、体力、耐心和悟性的工作，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干的。

问：是的，并不是人人都能吃这碗饭。搞新闻摄影，要讲求技巧技法，熟练运用镜头，通过镜头语言和新闻图片的画面内涵展现要表达的意图，很不容易。您在中央领导身边拍摄照片那么久，为了拍到更好的画面，摆拍过没有？比如说：毛主席，笑一笑；周总理，脸请稍稍转过来一点点……

答：那怎么行？我从来不摆拍，搞新闻摄影就要实事求是，你不应该去干扰或者干涉所摄影的对象。我认为，当神情、背景达到最理想状态的时候就按快门。

问：有时设计一下，也就是导演一下，让摄影对象的情态表现、所处环境的光线、所要拍摄的主题思想表达等方面更理想。适当干涉一下对方，让他配合您的拍摄行为，这样就可以让您拍摄的画面构图更完美，图片报道的效果更能鲜明地表达主题需要。这样不是更好吗？

答：新闻摄影不同于普通的人像摄影、广告摄影、照相馆肖像摄影，拒绝摆拍！

问：您认为摆拍有什么危害？

答：搞新闻摄影，最忌讳的是不实事求是。照片是真实的记录，作假就没有意义，违背了新闻规律，没有尊重被拍摄的对象，让他放弃了情感的自然流露，搞新闻拍摄就应该坚决反对。我认为摆布被摄对象，对他们指手划脚，有损新闻机构的声誉，也不利于新闻记者业务能力

的提高。当然，搞合影可以，比如有时主席、总理同地方领导合个影、照个相，我就“指挥”一下，摆摆位置，让所拍的画面更理想一些，有时还喊一下“一二三——注意”什么的。严格上讲，这不是新闻拍摄，是用来留用纪念的，用于新闻报道时一般都注明是“合影”。

问：但是，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如果真人真事的现场已经过去了，当时非常遗憾没有拍摄下来，而这个新闻事件很重要，能有图片表现出来就好了。怎么办？如果能找到当事人再到现场按照当时的情景重现一次，记者在旁边补拍这个场景，就没有遗憾了。按您的想法，肯定不主张这么做。

答：当然不行，补拍其实就是摆拍的一种方式。新闻摄影不能像拍电影、电视那样拍故事片，可以再现。我碰到过有人做这样的事，由于种种原因，有的新闻记者没有拍好现场照片，等照片冲洗出来才知道，错过了关键的瞬间，于是为了弥补过失，就去重拍，让当事人“表演”一次。

补拍和重拍，都是摆拍，既然不是新闻现场即时拍摄的，就违反新闻规律，就是作假，应当摒弃这些作法。

错过了那特定的瞬间，怎么办？我想还是可以补救的，但绝不是通过作假的方式补救。你想，每一个新闻事件的发生都有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拍这个事件的下一个场面，可以拍它在社会上产生的反响，等等。尽管这不是整个新闻事件中最佳的场面镜头，但是这个镜头真实。为了补上有关遗憾，你可以在图片说明中把有些情景通过文字还原出来，作些交代。

我们那个年代，摄影器材相当落后，不仅没有变焦镜头，连广角镜头都没有。为了保证拍摄的照片质量，我就想了很多办法。如准备

了两套设备，用 120 拍了，再用 135 补拍两张。当时都用闪光灯泡，照一张照片，先要摇片子，然后把灯泡拿下来，揣在兜里，再拿出来一个新的上好，这几秒钟就过去了。所以，动作要快，赶紧把握时机。我们那时拍照就提出“一张主义”，这一张必须绝对保证质量。否则，你再换一个灯泡，几秒钟过去了，握手已经完了，拍不上了。许多领导活动的接见、会见、握手、开会方面的镜头，你就是想补拍也是不可能的。

问：看得出，那个时候您的工作压力很大。

答：是的，不能有丝毫马虎，工作必须兢兢业业。我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对他的所有活动的采访丝毫不敢麻痹。你想，你是新华社的记者，全国各大媒体，乃至国外的新闻单位，都在等着用你的照片，有时明天的《人民日报》把头条位置的地方都预留出来了，就在等你的照片。你能在拍摄的时候马虎吗？（如果）照片拍坏了，责任就大了，第二天就没有东西见报，不仅我要检讨，新华社社长也得要检讨。新华社一直很重视对主席形象的报道，我的工作压力很大。

问：的确，（有关）主席的新闻报道、新闻拍摄在当年更是不能有半点疏忽。不然，技术问题可能会演变为政治问题。那个年代谁敢摆拍或补拍！

答：现在的记者就幸福多了，摄影设备那么好，不仅闪光灯安到相机上边了，还有很多好的功能，还是数码的，还可以连拍，一次可以接连拍几十张，这张没有拍好可以选那张，选择的余地很大。我们那个时候，领导人见面握手就那么短短几秒钟，说过去就过去了，不会等着让新闻记者不停地拍的。如今不同了，领导人很长时间地站在一起握手什么的，有意面向摄影记者让你们反复拍照，很配合摄影记者。



当年钱嗣杰所拍摄的大量照片，一次次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如本期报纸的下图）刊发。

问：好像你们那个年代也有补拍的镜头，我听说过不少这样的事……

答：是的，有不少这样的事。比如，今天经常在报纸或书刊上看到的“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在国民党总统府门楼上欢呼”的那张标志性照片，就不是抓拍的。你想，解放军占领总统府的时间是在1949年4月24日的凌晨，那个时候哪里有闪光照明的设备，能拍出那么清晰的照片吗？

问：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白天补拍的？

答：照片是“三野”随军摄影记者邹健东拍的，是他用一部德国产“蔡司”相机拍下的，拍摄时间不是在晚上，是在白天，是在事件发生3天之后上午10点钟左右。解放军占领总统府时，他并不在先遣部队里头，晚两天才进城的。你想，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升上红旗，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标志着蒋家王朝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邹健东想补拍这个历史性镜头，请示了部队领导，得到同意后就补拍。可是，占领总统府的那批官兵们当时已调防了，于是只得动用其他方面的官兵配合，这才拍下一组解放南京总统府的“珍贵历史照片”，其中就有那张解放军在总统府门楼上欢呼的照片，镜头还有冲进总统府、推开城门、降青天白日旗、升红旗、吹号等等好多。

问：啊，原来如此，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事。

答：像这样特定的照片，在图片说明中应该注明是补拍的，作些简要的拍摄背景方面的交代。不然，就是欺骗读者，也会对历史的真实造成错觉；加了说明，读者会理解的。

问：恕我直言，其实您也补拍过。

答：不可能吧？我不会做这样的事！

问：当然，您的确补拍过，您跟我讲过：您在1956年拍西藏试航、首航拉萨的照片中有一张就是补拍的。

答：你要说是补拍的，也说得，不过还是有区别的。当时，试航成功，突破了“空中禁区”，是一件很轰动的事。可是，起初飞机飞到的地方是在一个不知名的临时机场当雄机场，这个机场是在山谷里面。拍出来的照片谁也不知道是在拉萨，是在西藏。很可能人家认为中国人是在做假，根本就没有飞机飞到过那里。那里在当时可是地地道道的“空中禁区”呀，英国人、美国人，包括国民党都试过，结果机毁人亡，都以失败告终。而我们试航用的小飞机成功了，我作为摄影记者得想办法表明我们真的到了那里。于是，就策划飞机再飞一次，飞到人人皆知的布达拉宫上空，我在现场拍摄了一组照片，很有说服力，一看就是成功飞到了西藏。这样拍出来的照片就增加了新闻信息的可信度和权威性，有更好的传播功效，其实这还不能说是补拍。当年，摄影部的图片编辑都说拍得好，设计得好，没有违背新闻客观事实，照片有特点。

问：您的解释让我心服口服，您当时真的策划组织得好。这样拍摄的照片就不用补充说明如何补拍什么的了。

答：我不主张补拍或摆拍什么的，但是我这次设计出来的特别拍摄效果很好，一时间“西藏通航了”广为人知。我认为，这是新闻策划，而不是策划新闻，没有任何造假的成分。

问：近两年，在我印象里有出现过“华南虎”（陕西周某炮制假虎照“怪胎”，整个事件有政府部门参与其中）、“藏羚羊”（某记者获奖照片“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被质疑是“PS”的）、“广场鸽”（某记者所拍获奖照片“广场鸽接种禽流感疫苗”被揭露存在明显

的“PS”合成痕迹)等事件,图片造假的事频出不尽。其中大多是通过“PS”(Photoshop 图像软件)造假,使原本有“不会说谎”之称的照相机一下子似乎变成了造假工具。

答:这些事件我注意到了,新闻和新闻图片是不应该通过“加工”出来的。现在摄影技术和图片处理技术日益先进,为一些人在图片方面造假提供了便利。如果是新闻记者,应该珍惜自己的荣誉,新闻图片不应该进行艺术加工、修改、处理后再发表。这些事件的发生,伤害了民众对真实新闻的渴求,伤害的不仅是民众,还践踏了新闻媒体或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问:“文革”期间,“四人帮”一伙经常利用新闻摄影为政治阴谋服务。1975年9月,从不参加劳动、不深入群众的“文革旗手”江青一次在大寨想尽法子出风头,为自己树碑立传。一天,她上虎头山,提个篮子,在花椒树下或者在葡萄架下,装腔作势“劳动”一番,照一堆相。她还煞费苦心想出个鬼主意,在虎头山上挖什么“防空壕”,拿着铁锹摆了个样子,让记者给她拍了几张照片,写条消息。她照完相,扭头就走。她这完全是在自编自导自演。

答:当时,摄影记者给江青拍那些照片是被动的,不是自愿的。这是不能以记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她纯粹是摆样子,有政治阴谋在里面,当然就不真实了。历史终究是历史,真相最终还是会被揭露出来的。

问:您在主席身边偷拍过他的一些镜头吗?

答:偷拍,我还没有干过。不过,所拍的有些镜头可能他不知道。我认为抢拍或者抓拍还是可以的,偷拍其实是抓拍的一种,但是偷拍不能违反人家的肖像权,偷拍更多的是用在揭露社会阴暗面方面。抓拍,说简单一点,就是抢镜头,要不失时机。抓拍时,被摄对象不知情,

所拍的瞬间真切、自然。抓拍要求记者敏锐，能够迅速判断和迅速反应，在特定时间能果断按快门。抓拍的时候，也尽可能注意构图完美，比如将挡在镜头前面的物品移走，选择背景可能通过不同的角度取舍。只会当“导演”和“设计师”的人，当不了摄影记者，成不了器。从事新闻摄影的记者，要想拍出出众的照片来，先得自己不出众，自己尽可能不引起被摄对象的注意，要善于隐蔽自己，才能拍出真实、自然的瞬间。我们应该提倡抓拍，要不断培养摄影记者的抓拍能力。

问：看来，要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其实要下很多工夫。

答：解放前，我们摄影记者被人叫做“照相的”，现在还有人这么叫。其实，要拍好照片并不简单，不是只按一下快门就行了，要有思想，要用独特的眼光才能看到独特的典型形象，才能拍到独特的典型瞬间。

当年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办的一些画报，只有屈指可数的少数随军摄影记者，即使新中国建立时，全国报刊不多，新闻从业人员很少，专职新闻摄影记者更是少见。而今，摄影技术发展很快，摄影器材也很先进。当前，融文字、声音、图像为一体的网络媒体技术迅猛发展，它的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我们那个年代是不能比的。

问：战争年代，你们作为随军摄影记者使用的器材在今天看来当然很简陋，当年好些摄影器材是通过在敌占区的地下党组织购买的，有一些还是从敌方缴获的。然而，你们正是用这些简陋的摄影器材，为我们拍摄了许多十分珍贵的历史镜头。摄影是一种很重要的传播媒介和记录工具，摄影的纪实性使得它在新闻和纪实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难怪摄影史学家把新闻摄影报道誉为“是对人类最伟大的功勋。”真的，共和国不会忘记像您这样的老一辈新闻摄影家。

答：我很幸运，认为这一辈子——很值！历史机遇让我有机会走近重大的历史，有机会用镜头记录那个年代的历史片断。我很高兴自己能为历史留下一些很珍贵的镜头。听说，新华社图片库里有我当年所拍的照片不下18000张。

现在的记者条件好多了，令人高兴的是新闻摄影的队伍壮大了，现在几乎是全民摄影，我经常看到很小的孩子也很认真地拍照。现在的年轻摄影记者，作品有思想，质量不错，内容也新鲜，拍摄技巧有创意，图片很多有强烈的感染力，不愁后继无人，好作品很多。

汶川大地震是一场特大灾难，摄影记者反应快，深入到第一线，他们可以说是在抗震救灾战役中的一支特殊部队，不仅用镜头记录下这场历史性灾难，更记录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抗震救灾精神。好些优秀的新闻图片很有思想深度，也有艺术力量。

时下，很多人爱看图片新闻，往往是先被图片吸引住了，再看文字报道的详细内容。现在大众欣赏图片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很鼓舞人心。新华社很重视图片报道，一直强调“图文并茂，两翼齐飞”。

问：当然，今非昔比了。不过，你们当年在战争年代所拍的照片，每一张底片可以说是都带着血，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一个传奇。

答：我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多少年来我拒绝过很多人采访我、写我。感谢你花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写我。其实，我很普通的，只不过见证过、亲历过、目击过一些重大历史。我记录的历史，实际上只是共和国历史的一些个片断。

问：您的故事让我很感动，要感谢的倒是我，您为我讲述了那么多历史的细节，找出了那么多珍贵的历史老照片，您让我站在了历史的现场，我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

答：要说我有一点点成绩，这一切都是我的职业成就的。如果说得上财富，那么应当属于国家。

问：尽管你们所拍的照片是“职务作品”，可是现在有些老记者四处出售自己的照片，漫天要价，如果有媒体或出版物私自用了，动不动就与人打官司。对此，您怎么理解？

答：这是一个新问题。你的相机、你的拍摄机会都是公家给的，资源是国家的，不应当个人出售。摄影记者在工作期间所拍摄的“职务作品”，其著作权应属于所供职的单位，那些底片、照片、反转片什么的也应由所在单位统一管理、保存才是。现在市场经济了，许多人的眼光变了。

我们那个年代都没有留底片的观念，全部上交，还必须得交，照片除发表之外，还有一部分留资（留作资料）或送与领导合影的人作纪念，多余的都得处理干净。谁敢私人保存一张，你看我手上几乎没有什么照片，有的只是很少的几张与中央首长合影的照片或在特别年代的个人留影。你写的这本书里所用的照片，绝大部分是我去新华社图片库里调出来的，还有一些是密资（绝密资料），我也取不出来。你说有老记者卖钱的事，我也听说过，也不知道照片是怎么回到他们手上的。

问：要是您有几张原版的主席照片，现在就成了珍品，身价陡增。目前，听说每张原片市场价竟然高达百万元以上。

答：哈哈，那我就早发财了。

问：您在主席身边工作那么久，在您眼里，主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答：毛主席很有魅力，我们在他身边工作，都觉得他幽默风趣、平易近人，从来不感到紧张或者拘束，十分轻松愉快。跟主席一起散

步的时候，天南海北，什么都聊，一点都不感到陌生。身边工作的同志，如果谁生活上遇到了困难，主席总是主动提出用自己的稿费来帮助他们，接济一下。

在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觉到，主席的要求非常严格，绝对不允许搞一点特殊化。在陪主席出去视察的过程中，到地方也是这样。主席经常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我们下去视察，不管到什么地方，绝不要给地方添麻烦。为什么主席下去一般不坐飞机？一是中央考虑到安全因素，另一个就是他怕麻烦地方。当时，我们还按照主席的要求，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我总感到，主席既是国家领导人，也是我们的长者、我们的朋友。

所以，主席跟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有感情，身边这些人对主席总是念念不忘。这些年每年的9月9日（逝世日）和12月26日（诞辰纪念日），我们都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瞻仰主席的遗容，看望他老人家。

问：作为在中南海工作的专职摄影师，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答：既然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思想政治上首先得过硬，摄影技术也得要硬。

你想，中央首长的一举一动是高度保密的，思想政治不过关怎么行？我的出行，家属都不知道，他们也不过问，我也不能告诉他们。我总是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主动提出与主席合影，也不向主席索字什么的。如果要合影、请他题个字，其实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不能这么做，不能做这些与工作无关的事。

主席要出门，常常是临行前几分钟才通知我，我得随时作好准备，有关设备、器材什么的也得齐备，拿起来就得走。为了做到随叫随到，平时我总是机器不离身，就连散步也随身带着。当时的照相器材很落



1969年，毛泽东在出巡视察的专车上。钱嗣杰 摄

后，每拍一张都得有质量保证，容不得你反复拍，技术不行肯定是不行的。

脑勤、手勤、腿勤是新闻摄影的基本要求。到现场拍摄，免不了要爬高摸低找角度，创造与众不同的视觉

感。有些会议材料什么的还要研究，要求会挖掘和提炼新闻。真正要拍摄出有影响、有质量、能产生共鸣的作品，必须具有敏锐的新闻事件的选取能力，有深厚的生活积淀。当然，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更多的还是责任意识和政治意识。

问：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答：国力更强，社会更和谐。这样，记者镜头下的画面就更丰富了。

问：有遗憾吗？

答：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当上空军，当年服从组织安排当了名摄影记者，一干就是一辈子。欣慰的是，自己在新闻摄影方面还是有兴趣的，由一个门外汉变成了一个新闻摄影人，渐渐爱上了这个职业。我提着相机走遍了大半个世界，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真是——值！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镜头内外的红色传奇 / 吴志菲, 余玮著. -- 北京 :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179-0221-8

I . ① 镜… II . ① 吴… ② 余… III . ① 毛泽东  
(1893 ~ 1976) — 生平事迹 — 摄影集 ② 中国历史 — 现  
代史 — 史料 — 摄影集 IV . ① A752-64 ② K270.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5794 号

---

## 镜头内外的红色传奇

作 者: 吴志菲 余 玮

出 品 人: 赵迎新

策 划: 高 扬

责任编辑: 张 璞

装帧设计: 刘 铮

出 版: 中国摄影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 48 号 邮编: 100007

发行部: 010-65136125 65280977

网址: [www.cpph.com](http://www.cpph.com)

邮箱: [distribution@cpph.com](mailto:distribution@cpph.com)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印 张: 19

字 数: 35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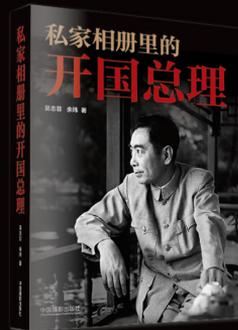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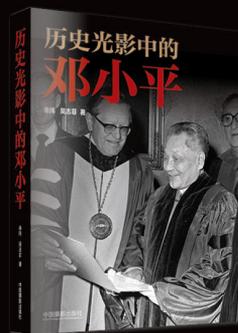
ISBN 978-7-5179-0221-8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私家珍藏照片定格开国总理的别样风采  
亲历者的回忆还原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历史光影记录峥嵘岁月伟人胸襟  
亲历者细述见证传奇人生英雄本色

## 追寻红墙摄影师的影像记忆 重现伟人传奇一生的精彩瞬间

作为红墙摄影师的杰出代表，徐肖冰、侯波、钱嗣杰等人拍摄的领袖照片最为人津津乐道。本书作者以他们的拍摄历程为创作线索，精选 100 多张最有影响力、最具历史拐点意义的照片，生动展现了毛泽东走过的光辉历程。难能可贵的是，除了少数人们耳熟能详、展现领袖伟岸风姿的影像外，更多的是真实记录一代伟人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照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首次公诸于众。通过这一幅幅珍贵的影像，毛泽东一生中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被呈现在读者面前：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要自己的儿子第一个参加“抗美援朝”？“九一三”发生后，毛泽东当晚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毛泽东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的两件事又是什么呢……细细品读完本书，你会对这位共和国缔造者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定价：49.00 元